陶磁路

三上次男 著
宋念慈 譯



藝術家叢刊⑬

中國陶磁器輸往西方和南洋的海上通路，是輻射中華文化光芒的大動脈之一，與陸路上的絲路前後媲美。

當代研究中國古陶磁的大家三上次男博士，是在德國偉大地理學者李希霍芬給絲路命名之後，又給這條海上輸送陶磁的大動脈，命名爲「陶磁路」的人，中國的文化永垂不朽，因三上博士的偉大發現和研究，而益爲發揚光大。

本書分章敘述中國古陶磁在北非、中東和南洋各國被發現暨珍藏的現狀。爲唯一介紹我國陶磁流落海外情況的專書，兼具考古價值。

陶磁路

藝術家叢刊⑬

陶磁路

三上次男著
宋念慈譯



藝術家叢刊⑭

陶磁路

三上次男著

宋念慈譯

發行人／何政廣

出版者／藝術家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118巷5號三樓

電話／3719693

總經銷／藝術圖書公司

地址／台北市溫州街129號四樓

電話／3210578

郵撥帳號／17620

定價新台幣120元

出版日期：一九八〇年二月一日

譯者序

我中華民族有幾項重大發明，在世界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輝紀錄，同時也給人類的精神和物質生活兩方面，都增進了幸福。第一是蠶絲的發明，據傳它起源於黃帝妃西陵氏嫘祖，它給上古人在衣着方面，提供了最舒適和最華貴的裝身之具。第二是指南針（羅盤針），據史書的記載，最初見之於黃帝驅逐蚩尤之戰，爲時最古，當今無論航空航海，都必須利賴。第三爲火藥，它是開山採礦的利器，亦爲國防上的必要物資。第四是造紙及印刷術的發明。造紙及印刷爲傳播文化的有力工具，今天教育的普及，大半都應歸功於它。第五是陶瓷器的發明與製造，它是與民生最爲密切的發明，不僅在實用方面爲人所必需，還逐漸在精神生活方面爲人所欣賞。

陶器的製作，我國與許多民族國家相同，起源甚早，依據發掘的資料，顯示新石器時代的中國人，已懂得製陶的技術，並且製作得非常精巧，從甘肅出土的有彩陶罐，河南澠池縣仰韶村曾出土彩陶器，河南秦王寨曾出土彩陶缽，山東歷城縣龍山鎮曾出土城子崖陶鼎和陶鬹等黑陶，這些在歷史考古上都可稱得起是極爲珍貴的史料。有釉的陶器可說是原始的瓷器，隨時代的進展，幾經蛻變，到隋朝終於出現了眞正的瓷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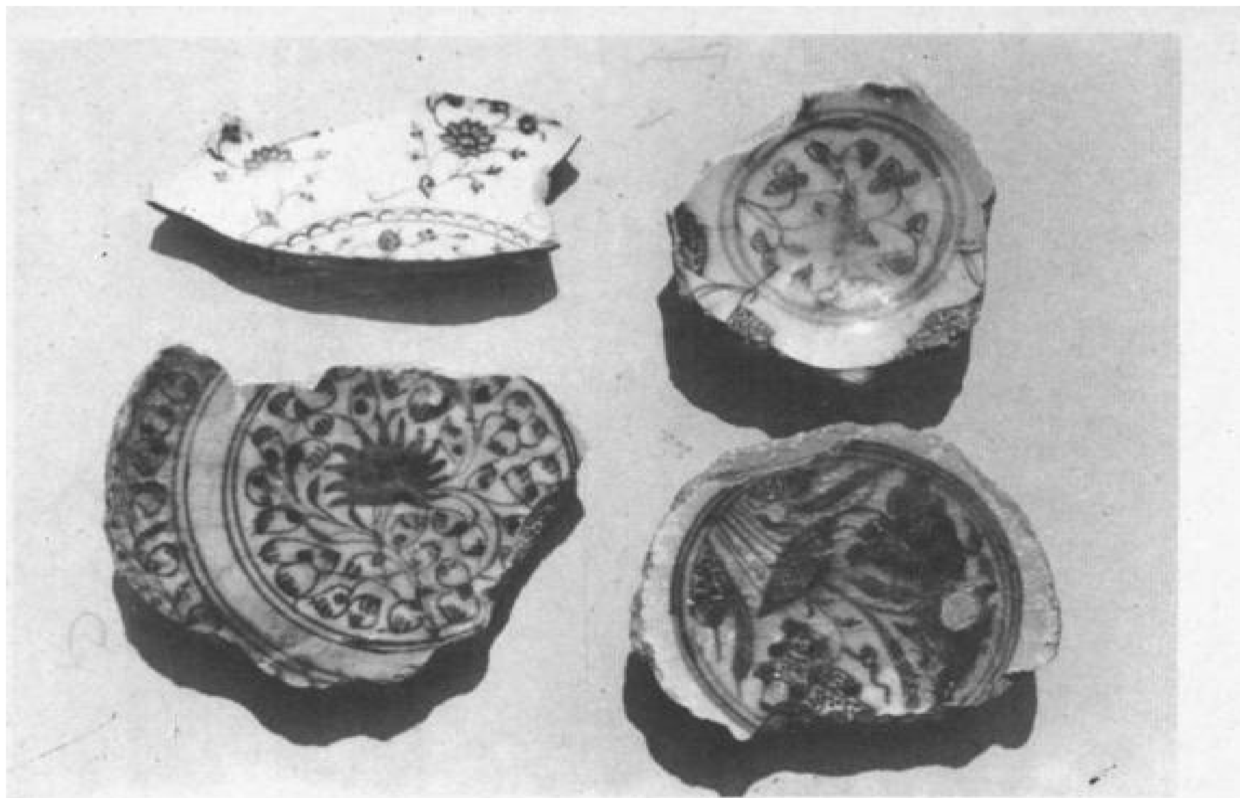
以上這左種偉大的發明，正反映着中華民族的精神和物質文明，日趨達到高度化與藝術化。這些文明的產物不僅能滿足人類生活上的需要，還引發了人們愛美的慾望，所以有些是經過戰爭的過程而外流，有時像絲綢綵緞之屬，竟成了遊牧民族掠奪的對象。至如與我漢代同一時代的波斯與東羅馬帝國，國勢強盛，正如日中天，生活豪華，官民競以奢妍相尚，對於中國之絲絹，異常珍視。惟以路遠難致，故有時竟不惜聯合友邦，採取遠交近攻政策，以期打通道路，而藉以取得蠶絲，東西交通在種種努力因素下，得以維持暢通，這條由西安及安西出發經新疆天山南北路，中亞而抵達大秦的陸上交通線，有時爲政治和軍事上所使用，後來竟演變成運輸絲絹的通道，十九世紀德國的大地質學家李希霍芬還把這條道路稱做「絲路」。

中國的陶瓷發明發展之後，同樣爲世界各國所喜愛。自六朝至唐代，爲佛教的極盛時代，故許多的優美作品之中，除了食器之外，如佛像、唐三彩罐、黃綠釉陶馬、車輿、杯、盤、家畜、駱駝、戰士、官員、歌舞女、樂工、盆、罐、碗等，應有盡有，反映着當時中國社會生活的富裕與浪漫氣息。此等陶磁如駿馬和駱駝、歌舞女、樂工等，大都模倣當時社會所最喜愛的大宛馬、波斯歌女樂工的形像，毫無疑義，這些作品之所以能流落外邦，一方面當然是出於中國商賈的販賣，另方面也是由於各國商賈所購求。這由埃及首都開羅附近所發現的驚人數量的中國陶瓷，令人想像中國的中世陶磁，當時該是怎樣的爲阿拉伯世界所喜愛。

不過由外國所發現的中國陶瓷，當然大部分係經由貿易而來，但有許多名貴之品，如現庋藏於伊朗、土耳其、埃及等地知名博物館的瓷器，內中自然也有由中國政府餽贈給外國君主貴人之禮品。許多珍貴陶瓷被君主貴人豪富之輩所收藏，有時是因爲它們具有高度的使用價值，所謂美味不如美器，但泰半也是因爲欣賞其美術價值，因而纔把它視如拱璧。

我們若從貿易觀點對陶瓷的傳播加以追踪，殆即可瞭解中國與亞洲諸地區及地中海世界的貿易狀況，這祇是所謂東西關係的一面。若更進一步看，便可發現中國陶瓷所給與各個接受它的國家在精神方面，諸如工藝技術上的刺激，以及在美術方面的影響，則較前者所受的影響爲尤深。這當然是有關東西文化交流的問題了。

關於東西文化交流的問題，本書著者並不完全同意十九世紀末，先由歐洲學者所提起，旋由日本學者所附和的說法。人們多以爲問題既首先由歐洲學者所提出，因此便必然是西方文化對東方具有壓倒性的影響，或可以說那也就是西洋文物之東漸，其實這無非是由於在近世東西世界政治力量的比較中，西方文化東流的程度，一時稍佔優勢而已。然而本書作者認爲文化主流決非經常祇「由西向東」，他認爲縱令因時代之變遷，文化流向有强弱之差，但雙方文化與物資的流動，也不會是片面流通，而是互相交錯的，從這裏便造出了普世都可通用的一種時代特徵。從古代到中世的中國絲織物貿易，和中世以後的陶



哈馬出土的中國元代磁器片

磁器貿易，即爲顯示文物自東向西流動的適切例證。兩者的西傳，在時間上雖有先後，然磁器；藝術價值，或竟凌絲絹而上之。

關於研究古代和中世的東西關係與貿易方面，若僅倚靠研究貿易路線和貿易品目，仍不能完全了解貿易問題的歷史意義，考古學上資料之活用，在這方面就比較方便而合適。可是在考古方面所得到的資料，假如在質量雙方尚無充分之發現，也很難達成目的。儘管中國古絲絹富有聲譽，然作爲遺物留給後世者極爲稀少，因之也無法派上用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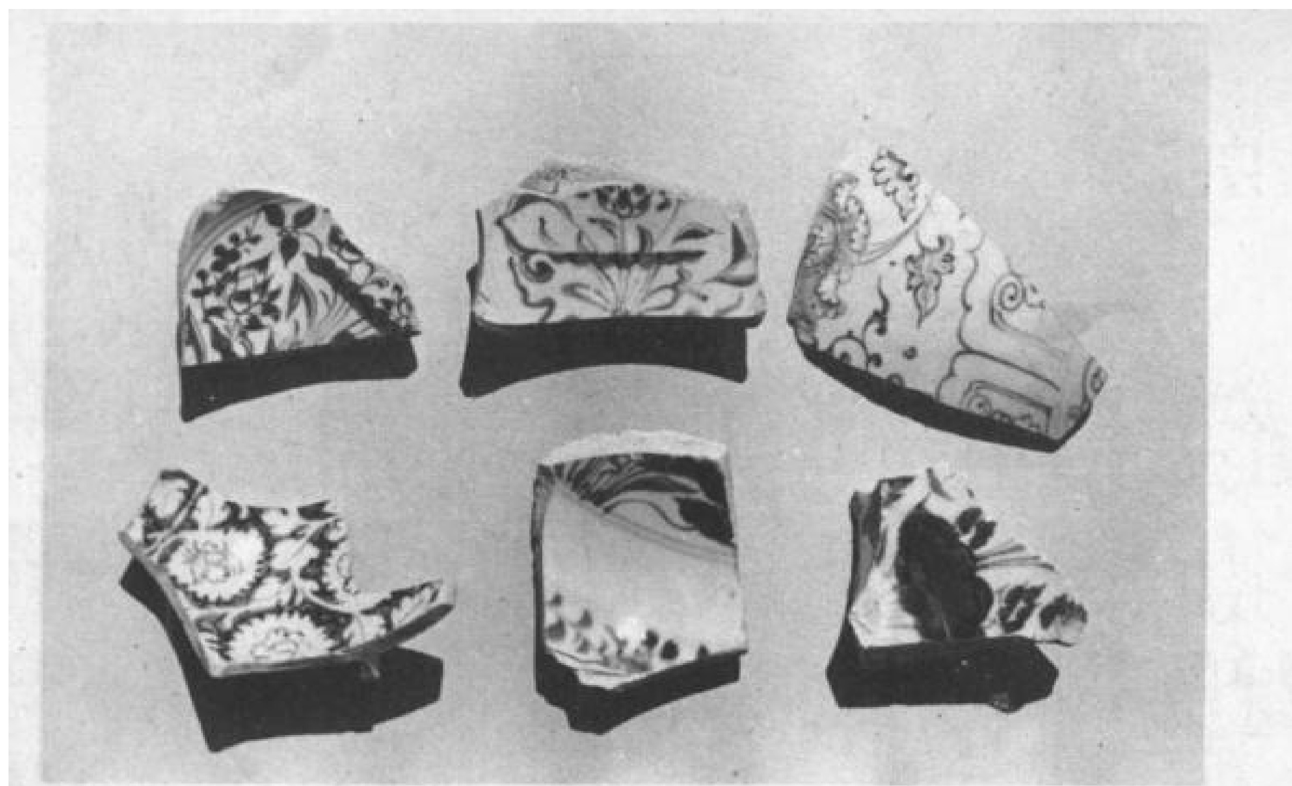
關於這一點，陶磁器雖壞而不朽，在遺跡中仍保持原形，故可成爲極可貴的資料，但如此種陶磁器資料發現的數量極少，則也無法掌握其全般的性質，因而稍形貶損其價值。本書即在闡述中國古代陶磁（完整的與不完整的）散播世界各地的情形。

三上先生爲了研究中國古陶磁的產銷種類，擴展情形，藝術價值，以及貿易年代之幅度，和它所給予輸出對象各國社會與文化的影響等項，曾在中東各國，東非北非和南洋各國，印度等地，作過廣泛的研究旅行，就中在開羅附近的福斯塔特地方所發現的中國古陶磁破片尤其是元代青花最爲豐富，這種質量兩方均屬卓越，而價值又極爲高昂的製品，何以竟能在這遠隔重洋之處發現，這證明着當時的開羅市民，如不是相當富有，便是愛好珍奇，不然便是愛好中國製品，或因中國陶磁的利用價值極高，方能有如此鉅量的輸入。以上各點必居其中之一，

或者竟係上列各種原因兼而有之的結果。

當人們在中東和埃及看到了驚人數量的中國古代陶磁，一定會聯想到先民究竟使用什麼方法，把它們運到遙遠的中東地帶。毫無疑義，一般都會說絲路是連結東西亞與地中海世界的貿易路線。因爲那是一條由中國經中央亞細亞沙漠、綠洲和草原地帶，以及高山峻嶺而抵達波斯，然後再通往地中海海岸的貿易通路。這條被人習稱爲絲路的交通路線，從歷史上看，可說是時斷時續，一方面是由於政治或軍事上的關係，另方面也是由於山川砂礦的險阻，困難較多，但說者總容易陷入唯有它纔是自古代到中世。東西貿易主要通道的錯覺。可是據三上先生的意見，實際上頻繁使用這條道路者，乃在七、八世紀之時，至八、九世紀以後，海上交通道路，勿寧已成爲東西貿易的中心路線。中國陶磁之輸出，俄然轉爲興盛，的確始自唐末。但連絡東西方的海上貿易路線，事實上在公元一世紀前後，即已爲航海者所經常使用了。這是可從紀錄和考古學上所得的資料加以證明，即海路與絲路一樣，早已爲東西方重要的貿易道路了。

我們再從東西交通史方面看，也可證明自九—十世紀時期起，海上貿易更呈現了爆發性的發展，來自阿拉伯和印度等地的大船，舳艫相接，大都以廣州、泉州、明州（寧波）、杭州等港爲目的地，收購物資西歸，中國可載千人的巨大艦隊還曾幾度遠征南洋各島和波斯灣沿岸港口。這類船舶的發展，對於在


福斯塔特遺跡發現的中國磁片

運輸上較易破損又屬笨重的陶磁器之裝運，極爲相宜而又容易。因爲海運較諸陸上運輸具有許多方便，故可說自九世紀之後，不獨我國輸往西方的磁器，絕大多數均改爲海運，即以往須遵循「絲路」運往西方之絲織品，恐均已改採運送陶磁器之海路矣。

這種負有連繫東西方文化橋樑任務的海上交通線，隨時代之進展，其重要性日益顯著。三上先生認爲繼絲路而負起運送陶磁前往兩方的海上交通線，實爲幅射中華文化光芒的海上大動脈。也是担負東西文化交流的橋樑，他把這條交通線命名爲「陶磁路」，實可當之無愧。

本書爲三上先生親歷各地發掘遺跡，實地考察研究之紀錄，內容翔實，議論精闢，讀者得此一篇，或可略窺中華文化西傳之深之廣，其影響人類之文明進步，實至深且鉅，即純從欣賞研究中華陶磁藝術或東西交通、文化交流而言，亦殊有其獨特之價值，譯述既畢，特爲之序。

本譯稿屢承留日研究之謝明良先生的鼓勵與慫恿，並承藝術家雜誌社發行人何政廣先生之協助，方得出版，在此順表衷心感激之忱。

宋念慈　民國六十九年元月五日

陶磁路

三上次男著
宋念慈譯

譯者序

我中華民族有幾項重大發明，在世界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輝紀錄，同時也給人類的精神和物質生活兩方面，都增進了幸福。第一是蠶絲的發明，據傳它起源於黃帝妃西陵氏嫘祖，它給上古人在衣着方面，提供了最舒適和最華貴的裝身之具。第二是指南針（羅盤針），據史書的記載，最初見之於黃帝驅逐蚩尤之戰，爲時最古，當今無論航空航海，都必須利賴。第三爲火藥，它是開山採礦的利器，亦爲國防上的必要物資。第四是造紙及印刷術的發明。造紙及印刷爲傳播文化的有力工具，今天教育的普及，大半都應歸功於它。第五是陶瓷器的發明與製造，它是與民生最爲密切的發明，不僅在實用方面爲人所必需，還逐漸在精神生活方面爲人所欣賞。

陶器的製作，我國與許多民族國家相同，起源甚早，依據發掘的資料，顯示新石器時代的中國人，已懂得製陶的技術，並且製作得非常精巧，從甘肅出土的有彩陶罐，河南澠池縣仰韶村曾出土彩陶器，河南秦王寨曾出土彩陶鉢，山東歷城縣龍山鎮曾出土城子崖陶鼎和陶鬶等黑陶，這些在歷史考古上都可稱得起是極爲珍貴的史料。有釉的陶器可說是原始的瓷器，隨時代的進展，幾經蛻變，到隋朝終於出現了眞正的瓷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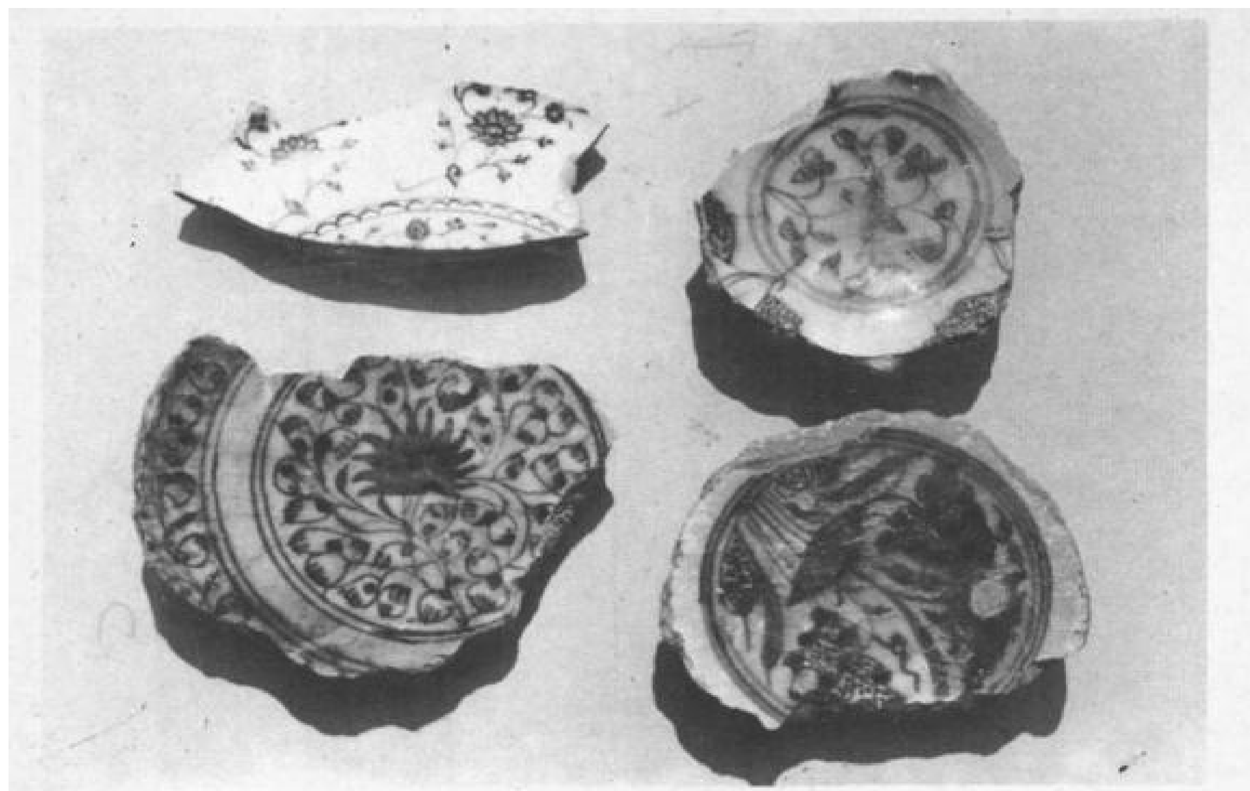
以上這五種偉大的發明，正反映着中華民族的精神和物質文明，日趨達到高度化與藝術化。這些文明的產物不僅能滿足人類生活上的需要，還引發了人們愛美的慾望，所以有些是經過戰爭的過程而外流，有時像絲綢綵緞之屬，竟成了遊牧民族掠奪的對象。至如與我漢代同一時代的波斯與東羅馬帝國，國勢強盛，正如日中天，生活豪華，官民競以奢妍相尚，對於中國之絲綢，異常珍視。惟以路遠難致，故有時竟不惜聯合友邦，採取遠交近攻政策，以期打通道路，而藉以取得蠶絲，東西交通在種種努力因素下，得以維持暢通，這條由西安及安西出發經新疆天山南北路，中亞而抵達大秦的陸上交通線，有時為政治和軍事上所使用，後來竟演變成運輸絲綢的通道，十九世紀德國的大地質學家李希霍芬還把這條道路稱做「絲路」。

中國的陶瓷發明發展之後，同樣為世界各國所喜愛。自六朝至唐代，為佛教的極盛時代，故許多的優美作品之中，除了食器之外，如佛像、唐三彩罐、黃綠釉陶馬、車輿、杯、盤、家畜、駱駝、戰士、官員、歌舞女、樂工、盆、罐、碗等，應有盡有，反映着當時中國社會生活的富裕與浪漫氣息。此等陶磁如駿馬和駱駝、歌舞女、樂工等，大都模倣當時社會所最喜愛的大宛馬、波斯歌女樂工的形像，毫無疑義，這些作品之所以能流落外邦，一方面當然是出於中國商賈的販賣，另方面也是由於各國商賈所購求。這由埃及首都開羅附近所發現的驚人數量的中國陶瓷，令人想像中國的中世陶磁，當時該是怎樣的為阿拉伯世界所喜愛。

不過由外國所發現的中國陶瓷，當然大部分係經由貿易而來，但有許多名貴之品，如現庋藏於伊朗、土耳其、埃及等地知名博物館的瓷器，內中自然也有由中國政府餽贈給外國君主實人之禮品。許多珍貴陶瓷被君主貴人豪富之輩所收藏，有時是因爲它們具有高度的使用價值，所謂美味不如美器，但泰半也是因爲欣賞其美術價值，因而纔把它視如拱璧。

我們若從貿易觀點對陶瓷的傳播加以追踪，殆即可瞭解中國與亞洲諸地區及地中海世界的貿易狀況，這祇是所謂東西關係的一面。若更進一步看，便可發現中國陶瓷所給與各個接受它的國家在精神方面、諸如工藝技術上的刺激，以及在美術方面的影響，則較前者所受的影響爲尤深。這當然是有關東西文化交流的問題了。

關於東西文化交流的問題，本書著者並不完全同意十九世紀末，先由歐洲學者所提起，旋由日本學者所附和的說法。人們多以爲問題既首先由歐洲學者所提出，因此便必然是西方文化對東方具有壓倒性的影響，或可以說那也就是西洋文物之東漸，其實這無非是由於在近世東西世界政治力量的比較中，西方文化東流的程度，一時稍佔優勢而已。然而本書作者認爲文化主流決非經常祇「由西向東」，他認爲縱令因時代之變遷，文化流向有强弱之差，但雙方文化與物資的流動，也不會是片面流通，而是互相交錯的，從這裏便造出了普世都可通用的一種時代特徵。從古代到中世的中國絲織物貿易，和中世以後的陶



哈馬出土的中國元代磁器片

磁器貿易，即爲顯示文物自東向西流動的適切例證。兩者的西傳，在時間上雖有先後，然磁器；藝術價值，或竟凌絲絹而上之。

關於研究古代和中世的東西關係與貿易方面，若僅倚靠研究貿易路線和貿易品目，仍不能完全了解貿易問題的歷史意義，考古學上資料之活用，在這方面就比較方便而合適。可是在考古方面所得到的資料，假如在質量雙方尚無充分之發現，也很難達成目的。儘管中國古絲絹富有聲譽，然作爲遺物留給後世者極爲稀少，因之也無法派上用場。

關於這一點，陶磁器雖壞而不朽，在遺跡中仍保持原形，故可成爲極可貴的資料，但如此種陶磁器資料發現的數量極少，則也無法掌握其全般的性質，因而稍形貶損其價值。本書即在闡述中國古代陶磁（完整的與不完整的）散播世界各地的情形。

三上先生爲了研究中國古陶磁的產銷種類，擴展情形，藝術價值，以及貿易年代之幅度，和它所給予輸出對象各國社會與文化的影響等項，曾在中東各國，東非北非和南洋各國，印度等地，作過廣泛的研究旅行，就中在開羅附近的福斯塔特地方所發現的中國古陶磁破片尤其是元代青花最爲豐富，這種質量兩方均屬卓越，而價值又極爲高昂的製品，何以竟能在這遠隔重洋之處發現，這證明着當時的開羅市民，如不是相當富有，便是愛好珍奇，不然便是愛好中國製品，或因中國陶磁的利用價值極高，方能有如此鉅量的輸入。以上各點必居其中之一，

或者竟係上列各種原因彙而有之的結果。

當人們在中東和埃及看到了驚人數量的中國古代陶磁，一定會聯想到先民究竟使用什麼方法，把它們運到遙遠的中東地帶。毫無疑義，一般都會說絲路是連結東西亞與地中海世界的貿易路線。因爲那是一條由中國經中央亞細亞沙漠、綠洲和草原地帶，以及高山峻嶺而抵達波斯，然後再通往地中海海岸的貿易通路。這條被人習稱爲絲路的交通路線，從歷史上看，可說是時斷時續，一方面是由於政治或軍事上的關係，另方面也是由於山川砂磧的險阻，困難較多，但說者總容易陷入唯有它纔是自古代到中世。東西貿易主要通道的錯覺。可是據三上先生的意見，實際上頻繁使用這條道路者，乃在七、八世紀之時，至八、九世紀以後，海上交通道路，毋寧已成爲東西貿易的中心路線。中國陶磁之輸出，儼然轉爲興盛，的確始自唐末。但連絡東西方的海上貿易路線，事實上在公元一世紀前後，即已爲航海者所經常使用了。這是可從紀錄和考古學上所得的資料加以證明，即海路與絲路一樣，早已爲東西方重要的貿易道路了。

我們再從東西交通史方面看，也可證明自九—十世紀時期起，海上貿易更呈現了爆發性的發展，來自阿拉伯和印度等地的大船，舳艫相接，大都以廣州、泉州、明州（寧波），杭州等港爲目的地，收購物資西歸，中國可載千人的巨大艦隊還曾幾度遠征南洋各島和波斯灣沿岸港口。這類船舶的發展，對於在



福斯塔特遺跡發現的中國磁片

運輸上較易破損又屬笨重的陶磁器之裝運，極爲相宜而又容易。因爲海運較諸陸上運輸具有許多方便，故可說自九世紀之後，不獨我國輸往西方的磁器，絕大多數均改爲海運，即以往須遵循「絲路」運往西方之絲織品，恐均已改採運送陶磁器之海路矣。

這種負有連繫東西方文化橋樑任務的海上交通線，隨時代之進展，其重要性日益顯著。三上先生認爲繼絲路而負起運送陶磁前往兩方的海上交通線，實爲幅射中華文化光芒的海上大動脈。也是担負東西文化交流的橋樑，他把這條交通線命名爲「陶磁路」，實可當之無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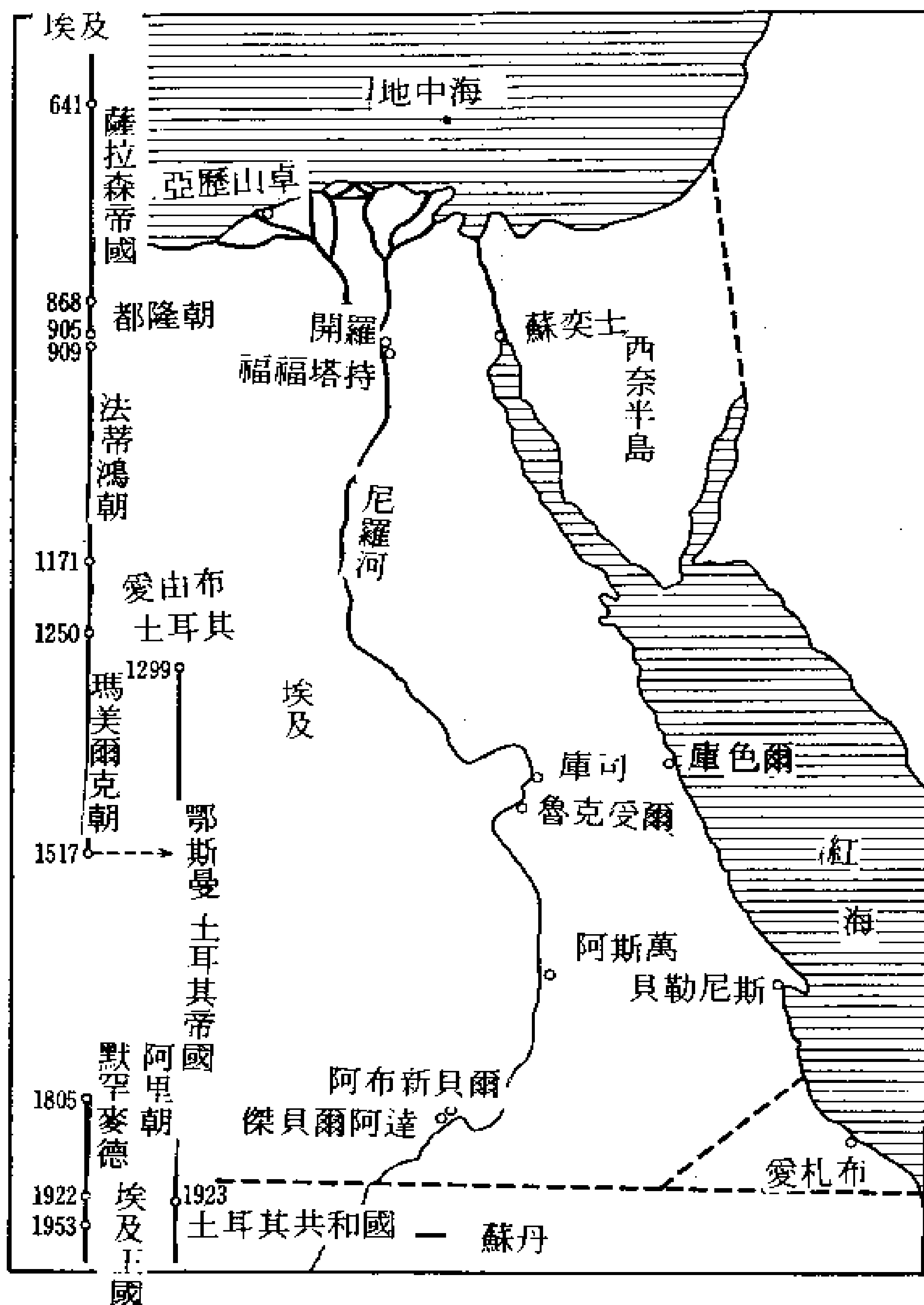
本書爲三上先生親歷各地發掘遺跡，實地考察研究之紀錄，內容翔實，議論精闢，讀者得此一篇，或可略窺中華文化西傳之深之廣，其影響人類之文明進步，實至深且鉅，即純從欣賞研究中華陶磁藝術或東西交通、文化交流而言，亦殊有其獨特之價值，譯述既畢，特爲之序。

本譯稿屢承留日研究之謝明良先生的鼓勵與慫恿，並承藝術家雜誌社發行人何政廣先生之協助，方得出版，在此順表衷心感激之忱。

宋念慈

民國六十九年元月五日

陶磁路 目錄


埃及
641
薩拉森帝國
868
都隆朝
905
909
法蒂瑪朝
1171
愛由布
土耳其
1250
瑪美爾克朝
1299
1517
鄂斯曼土耳其帝國
1805
默罕麥德
阿里朝
1922
1923
1953
埃及王國
土耳其共和國
地中海
亞歷山卓
開羅
福福塔持
蘇奕士
西奈半島
尼羅河
埃及
庫司
魯克愛爾
庫色爾
紅
海
阿斯萬
貝勒尼斯
阿布新貝爾
傑貝爾阿達
愛札布
蘇丹

一、流落遙遠地方的中國陶磁

——在埃及廢墟中發現的中國陶磁



佇立於福斯塔特遺蹟上

一九六六年二月初，在一個薄寒侵體，冬日初懸的清晨，我兩年以來再度訪問了開羅南郊的福斯塔特遺址。這是一個令人嚮往的中世紀都市遺跡。

在一千年或者更久以前用磚建造的整齊房舍遺跡，極目一望，都變成了一片慘不忍覩的廢墟。這是非常壯大的中世伊斯蘭都市遺跡。

自一九一二年起，由於繼續不斷的發掘而出現的建築物，雖大小各有不同，但目之所及，多爲堅固的磚牆所圍繞。就中之建築，即以現在的眼光看，也屬相當奢侈，樓上地板正中，築有形狀相當美好的四角或八角形的小水池，其中噴水上昇。水是從屋頂水塔經過埋藏在磚牆中的水管，而進入水池的。水管是陶製品。

以水池爲中心的中庭，由小的居室所環繞，在其一個角落裏，有通往上面的樓梯。想必是在炎熱天氣的夜晚，一家老少團聚中庭，觀水談笑，以消磨時光。牆壁上抹的石灰很厚，牆面上似乎還有過種種裝飾，有的地方還剩有刻線花紋和壁畫的模糊痕跡。不知如何，總令人感覺着有一種籠罩近乎千年以前的阿拉伯氣氛。此外它還有地下室，其中的一部分，充做貯水槽使用。

據記錄說，竟有七層的房屋，總之，這些建築物，無論大小，到那方面都是連接的。所以這項遺跡是有其進深的，其中有官署、商店、倉庫、麵粉磨房，並有玻璃和陶器工廠雜處其間。埃及人自詡他爲中東的寵兒，亦不無道理。

夾在建築物中間的道路，亦很有趣味。道路是向各方彎曲延伸的，有時甚至令人摸不清是走向何方。當初，兩面都有高牆圍起之時，恐怕眞成了名符其實的迷宮。

這種中世紀都市的迷宮，一旦被敵人侵入，自然可說是出於迷困敵軍，爲軍事的必要而設想，實際上一經接觸，則對這種說明，自亦無話可說。

沿途到處有井。這是由附近的尼羅河通進來的地下水，也有在四、五公尺以下儲水者。本來在地面上很像有井框存在，因現已遺失，故在此黑夜行走，定會跌落井中死亡、據傳夜間野犬狐狸橫行。白晝則禿鷹在天空飛舞。似乎下面有可以獵獲的東西。

在福斯塔特遺蹟，諸如此類的廢墟，長逾數公里接連不斷，令人對千年前的繁華懷念不置。當人走進如此壯大的廢墟之中，人間社會的忙忙碌碌，

究竟成爲何事？所謂文明和歷史，令人痛感悉成夢幻。

可是當我攀登稍高一些的廢墟之上，眺望四方之時，埃及五千年歷史的悠久步伐，展現在眼前，


福斯塔特遺跡

居住於尼羅河畔之人類的不可測度的激昂慾望，他們堅強的生存慾和物質慾叩人心弦。

聳立於遺跡東面的白堊石灰岩山丘，即在距今約五千年前，鑿出了數達二百三十萬塊金字塔所用大石材的牟卡達姆山丘。在這山丘之上，使人流血流汗的神聖王者之聲，似猶深入人心。

在其北方的山丘之上，有開羅足以自誇的伊斯蘭時代的莊嚴城堡，矗立的穆罕默德．阿里陵墓，是一座火箭型的尖塔建築，高聳雲際。

北方重重疊疊的屋頂和成羣的坟墓，是自一千數百年的古代開始，有數逾百萬的貧富人等，一方面確保着伊斯蘭信仰；窮困潦倒，繼續着呼天搶地阿拉伯人的開羅市街。在西方更遠的地方，有基札（Giza）地方有三座大金字塔，靜靜地浮在沙漠之上。

一切都是人類執拗的歷史縮影。像這樣規模雄大的歷史遺跡，隨時代之推移而累積起來的場所，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也無法找見。

這種使遊子對歷史發生無限感慨的福斯塔特都市遺跡，在現實方面正是我們的第二次福斯塔特調查團（出光中東文化調查團），此後兩個月有餘期間，必須逗留並實行調查的工作場所。

如果有人要問這調查團的目的何在，我可以答覆說：徹底調查從此中世紀遺跡所發現的大量中國陶磁，以及埃及當時所仿造的陶器，便是我們的目的。中國陶磁──那是在距此有一萬五千公里海陸途程，遙遠的東亞一地所造成，不但經過大船巨舶，而且還藉駱駝的背負，纔運來此地的。這無疑是充滿了苦難的陶磁貿易之道。

福斯塔特遺蹟的重要性

觀光開羅的人，任何人都會遊覽一下基札和撒伽拉（Saqqara）的金字塔，或進入埃及博物館，回顧一下法老時代的國王和貴族的榮華與文化遺產，可是知道開羅為現在伊斯蘭世界的一大中心地點，而遊覽時了解其歷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城市福斯塔特遺址之日本人，却意外地少。

這是因為位居亞洲東端的日本，對於伊斯蘭世界的重要性，尚未充分認識，這和歐洲人用瑪腦和皮膚雙方的感受，以了解伊斯蘭世界之政治經濟活動的實際以及其文化的貢獻者不同。

實際上，對歐洲的悠久歷史，自七世紀以來和伊斯蘭世界的接觸，無論在政治方面、經濟方面或文化方面，每件事都與重大的問題相關聯。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倘若沒有和伊斯蘭世界的對比，歐洲世界的成立和變遷，是很難想像的。

埃及是伊斯蘭世界的一大中心，而埃及的中心則是開羅。

福斯塔特的遺蹟，即為現在開羅的前身，它乃公元六四二年阿拉伯軍隊征服埃及，所最初建設的市街。即對伊斯蘭世界全體做一綜合觀察，因為福斯塔特也是阿拉伯軍繼美索不達米亞的巴斯拉（六三五）、以及庫發（六三八）之後，所建設的第三個城市，故對伊斯蘭的歷史而言，做為自己肉體成長的紀念碑，也是一個具有意義非常深長的城市。在此我試就這一城市的興亡歷史，作一簡單的敍述。

福斯塔特的歷史

尼羅河流域的埃及，不獨為東地中海沿岸的重要地，也是東北非的要地，而止因其亦為通過紅海而與地中海及阿拉伯海，聯繫東西交通路上的要衝，故這一方面的權力與財富，都在此地集中，為任何世代所重視。

即在拜占庭時代，埃及亦為此一帝國的有力領土，它建築了堅固的巴比倫城於尼羅河畔，而將埃及牢牢地掌握於自己手中。現在開羅南郊科甫特博

物館的地址，即爲巴比倫城廓的故地，目前博物館的一面，尙存有當時所築石頭城的一部分。

七世紀初，伊斯蘭勢力興於阿拉伯半島，他們當然不能將富有的埃及輕輕看過，當第二代哈里發的烏瑪爾時，派阿穆爾將軍攻略埃及，是公元六四一年的事。

六四二年占領巴比倫城，阿穆爾將軍在離舊城不遠之處，建築一所崇敬阿拉神的禮拜寺（阿穆爾墓），並在其旁營造了他的邸宅。尼羅河的財富，盡歸阿拉伯人所有。

阿穆爾墓其後幾有十次改建，在南郊一帶，歷次均有整備擴大，創建之初，四周圍以牆壁，屋頂係以蘆葦覆蓋，似尙無若何規模可言。

但此一墳墓與總督之住宅，因係支配埃及之中心，故不久便在其周圍建起政府機關，櫛比的住宅而形成了市街。這便是後來的福斯塔特。

福斯塔特的意思是軍營，由這一字義的流傳，而道出了這一城市成立的原委。自然極具特殊意趣。

福斯塔特市街逐漸向四周擴展。於是伊斯蘭帝國在埃及的權威，亦即日趨鞏固，因爲它在此確立了在南地中海和北非的政治經濟中心地位，故市街亦隨之發達，建築也整備起來。福斯塔特在名實兩方，都成了尼羅河流域的中心都市。

其後，由於市街的擴大，中心發生了逐漸北移的傾向，於是一個新的政治中心，在市街北部出現了阿斯卡爾，接着在埃及成立了脫離巴格達政權而獨立的都龍王朝（八六八—九〇五），然後又以現在開羅城塞東方的都龍陵墓爲中心，建立了新的政治中心卡泰。

在突尼斯興起的法締瑪王朝，更將埃及加以占領，並以此地爲軸心，建立了巨大的政治勢力（九六九—一一七一），復在較北的地方，建設了新的政治中心地卡希拉（勝利之意）。此即目前開羅名稱的由來。

在如此情形下，政治中心雖向北方轉移，但舊日福斯塔特市街，仍以產業中心而繼續其繁榮，街路縱橫交錯，樓閣連雲而起。

不久，福斯塔特走霉運的日子忽然來到。那就是與第二次十字軍興起的同時，移駐巴勒斯坦之基督教軍的來襲，他們衝向埃及的財富，一一六八年，圍困了開羅。其時法締瑪王朝的宮廷中，正多內爭，勢力因之削弱，以致無法擊敗十字軍，却反而因爲恐懼位於開羅南部福斯塔特地區的產業中心，陷落敵手，乃決定將此地焚燬。

據傳，有一萬五千個油脂炸彈，被投入福斯塔特市街，在長期間裏夙以繁榮聞名的此一市街，竟慘遭焚燬。據傳大火繼續燃燒五十四日之久，方纔熄滅。當人們行經遺蹟之時，到處都散落着炸彈的破片，它們都是被牢牢燒在一起的無釉陶製的石榴形炸彈。

依靠這種果敢的焦土戰術，雖幸而使政治中心的開羅，免於陷落，但失去了重要肢體的法緹瑪王朝，已完全失去了力量，於一一七一年滅亡。

被燒燬了的廣大市街遺蹟，其後被由沙漠吹來的風沙所埋沒。沙子一公尺、兩公尺、三公尺地往上吹落，更加以來自北方，因建設新市街而堆棄的廢土，重重疊疊地深埋在千載永不見天日的境地了。

福斯塔特遺蹟的發現及其遺物

喚醒這千載長眠者，是二十世紀初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埃及在長久期間爲土耳其所統治，自十八世紀以來，更淪於歐洲各國殖民地的地位，進入二十世紀，所謂「阿拉伯人的埃及」民族意識乃形高揚，他們的眼光也終注意到自己歷史的追求。在這種情形下，伊斯蘭時代最古城市的福斯塔特遺蹟，乃形登場。

遺蹟的發掘調查，始於一九一二年，進行到二〇年（註）擔任發掘工作者，是埃及人學者阿里·巴哈格特博士 (Aly Bahgat) ，這點也頗具意義。他後來成了阿拉伯博物館（現在的伊斯蘭美術博物館）實質上的創立人。遺蹟的全貌已弄清楚，發掘工作其後也在繼續地進行，直至最近，尚有阿拉伯聯合考古局暨美國調查中心兩個團體，正在探索着古昔都市的遺蹟。

註：Aly Bahgat Bey et Albert Gabriel: Fouilles d'al Foustat, Paris, 1921;

我們於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六年，曾前後兩回以此遺蹟爲工作場所，但我們的目的並不在於發掘這一遺蹟。我們的目的乃在調查埋藏在這塊土地之下的許多遺物，尤其爲了調查其中的陶器。

由此一遺蹟之中所發現的陶片，爲數極夥，携往國外者也相當多。但仍有多數存留，在遺蹟中央的兩座倉庫中，堆積如山，其數殆達百萬，推算調查的結果，殆以六七十萬片爲妥當。

陶片的大部分，爲自七—八世紀起，至十六、七世紀之物，然其中也有更新的東西。福斯塔特滅亡於十二世紀之末，何以其中竟有十六—十七世紀之陶片，乍見之下，似覺不可思議，但如前文所述

，乃因此地於滅亡之後，自位於其北方的新市街所運來廢土之中，含有陶片的緣故。

在倉庫中所堆積者，尚不祇陶片。數十年間的沙塵，也與陶片堆積在一起。

在此等陶片之中，不獨陶磁研究者，即對於東西貿易以及東西文化交流的專家們，也都成爲注意的目標者，厥爲自距埃及福斯塔特，海路超過一萬五千公里的東亞中國，運來陶磁之事，而且其爲數還異常之多。

歐洲各國的學者們，雖對調查此等陶片具有強烈希望，惟以倉庫牢牢鎖起，不許開放。但戰後，機會終於來臨。那是小山富士夫氏活動的結果，調查工作終於委託了日本。因爲他們認識了日本在研究陶磁器方面的實力。

我們的工作是把這些陶片和堆積如山的塵埃垃圾推翻，先從其中檢出全部中國陶磁片，並就其種類、時代加以分類，測度其數量，隨後並用同樣方法，調查在埃及所製成的中國陶磁仿製品。

但以如此時機不可再得，故立意對埃及獨特的陶器，和自中國以外各地所輸入之陶器，也竭力加以追求。至於何以要計畫實行這番調查，下文將逐漸予以闡明。

然當一九六四年與小山富士夫氏等共同參加此項工作以來，發現調查此等堆積如山的六七十萬片陶片，實非易事。因此第一次調查工作，中途停頓，而轉入第二次調查工作。我們終於經過前後兩次的調查，方大體上達成了目的，卸下了肩頭一半的重荷。但距作成正式報告書，尚剩餘一半的擔子。

依陶片之種類加以區別，當然以在埃及製做者爲最多。但埃及以外的製品，爲數亦夥，地中海周圍的敘利亞、土耳其、賽普路斯、意大利、西班牙、北非的東西，或美索不達米亞、伊朗的陶器，固不必論，其他如遠處東亞的泰國、安南和中國的陶磁，無不包括在內，至於在數量上雖屬無多，日本的伊萬里製品，也堆積其中。這簡直可稱爲世界陶磁片的展覽會，也是研究世界陶磁器的寶庫。

中國陶磁的發現及其性質

根據我們兩次調查的結果，蒐藏於福斯塔特遺蹟倉庫裏陶片之中，中國陶磁片約一萬二千片。

雖然簡單說來約有一萬二千片，但實際堆起觀看，則其分量實屬驚人。假令全部陶片爲六十片之中，即有一片中國陶磁。這一數字較之出土於福斯塔特遺蹟、埃及以外各地陶片之量，還特別多。誠

如下文所述，自中東和東非沿岸的伊斯蘭時代許多遺蹟之中，也同樣發現有中國陶磁片。但福斯塔特的中國陶磁出土量，比較遺蹟的出土量，則佔絕對多數。此不獨對中國陶磁之硏究，即對中世紀中埃間貿易的調查，也足可提供唯一無二的重要材料。

另外還有必須特別一提的是：由此遺蹟所發現的中國陶磁片，是種類旣豐而質量又美的。

出土的中國陶片，古老者上自八—九世紀的唐代開始，下迄十六—七世紀的淸代，其間凡中國所生產的有名陶磁器，無不具備。



福斯塔特出土的陶片（整理中）

埃及陶器和中國陶磁

因爲關於中國陶磁，此後將時時談到，故在此仍有先行一談中國陶磁發達情形的必要。

在此先就世界上究竟那一地方，首先製成陶磁這一點，似爲興趣之所在。最古的陶磁即產生於埃及。埃及於紀元前三千年之初，已經製成了在銅呈色土耳其蔚藍色上發光的鹹性釉子的陶器。自今算起，大致已爲五千年前的事了。

埃及的陶磁都具有神秘感覺的色調，它和後代在素地上使用陶土的陶器不同，它是將硅石壓成粉，而做素地的。此爲古代及陶器的一個特徵。在同一時期，美索不達米亞雖也有同一性質施釉陶器的丰姿出現，但直至目前究竟何方在先，其影響關係等等，尙無所知。

當埃及進入新王國時代紀元前二千年紀的中葉，找到了在青釉之下，用錳的紫黑色，繪畫魚游、水池和水蓮等的技術，使埃及的陶器進入佳境。迨至紀元前千年紀的前半，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便已都能分別使用青、綠、黃等各種顏色的釉子，而

畫出有趣的花紋了，總之，此種製陶方法，業經持續了將近三千年之久，埃及纔進入羅馬佔領時代。

然到紀元前二世紀，在東地中海沿岸的地方，又發現了與從前不同的製陶方法。那即使用易於延伸的陶土做底子，以便自由造形，使用以鉛爲媒溶劑的釉子（鉛釉）塗飾陶器，因之而顯現出銅綠、鐵的黃褐、和錳的紫等等鮮艷的彩色。此爲羅馬人所愛好的漂亮陶器。

其後在中東地方，埃及、美索不達米亞系的鹹釉陶器，和東地中海沿岸地帶所產生的羅馬系鉛釉陶器，兩方同時並作，直到七世紀以後的伊斯蘭時代。進入伊斯蘭時代後，中東陶器因受到下文所述的中國陶磁之影響，而急遽發達。於是便在伊斯蘭陶器或波斯陶器名義之下，受到西方世界的集中重視，關於此點將在其他機會談論及之。

然則東方世界核心的陶磁是什麼呢？那就是中國陶磁了。

中國最初製成陶器，是在比埃及遠較在後的紀元前二千年紀的後半，殷商時代。但陶器的性質，則和埃及的完全不同，乃是以鐵爲呈色料的灰釉陶器。故在表面上呈褐或暗褐色的土質色調。這在感覺上便絕像中國的色調。這種性質的陶器，以後一直在繼續製做，而成爲古代及中世中國陶磁的主流。

在後漢時代的中期（二世紀左右），又出現了與前此製品毫無關係的，以銅、鐵爲呈色料的鉛釉綠、褐色陶器，它和上面講過的，生產於羅馬領下東地中海沿岸的綠、褐色羅馬系統陶器相同。我以爲中國之製成此種陶器，其時東方的中國與西方的羅馬領土之間，以印度洋岸爲中繼地，已有了通商關係，中國的綠褐釉技術，是否是自羅馬領土傳來的結果。

中國的灰釉陶器，其後以華南爲中心，獲致了顯著發達，四世紀之初，浙江省地方甚至已出現了半磁體的青磁系陶磁。此種技術爲杭州灣南岸越州地方的窯所繼承，自隋（五八九—六一八）、唐（六一八—九〇七）、五代（九〇七—九六〇）時代起，至十二世紀的北宋初期，出產最盛。此種橄欖色或青綠色的青磁系陶磁，即輸出到中東地方的越州窯磁，同一系統的陶磁，在唐、五代、和北宋（九六〇—一一二七）時代，在福建省地方亦有所製做。

唐代，在華南有青磁系統陶磁之製作，相對地，在華北地方則製有白釉陶器和黑釉陶器，並又製

出了用綠和黃褐色釉子，在器面上繪成美麗的各種三彩陶器。唐三彩雖爲漢代綠、褐釉陶器技法之再生，但與國際的唐代潮流相適應，造成了絢爛的氣氛。白釉陶器和三彩陶器是這一時代華北的代表陶磁，它對海外也有輸出。此外，長沙窯又做出了在淡褐地子上用綠釉繪畫花紋的陶器。

中國自唐代後半起，政治、經濟、社會，都進入了變革期，經過十世紀前半的五代時代，而進入宋代（九六〇—一二七九），社會一經安定，陶磁器之生產，無論量與質任何方面，均到達了飛躍發展的時期。於是在前此世界上所生產的陶磁之中，最優秀、最美麗的陶磁，亦應運而生產。

具體言之，一旦進入這一時代，青磁的生產中心，便移到了浙江省龍泉縣。這種青磁的色彩直同萬里無雲的秋空，蕩漾着靜謐深遠如海的青色。龍泉窯青磁即以此點馳名於世，此種青磁復與福建廣東兩省窯場所產青磁，同時大量輸出外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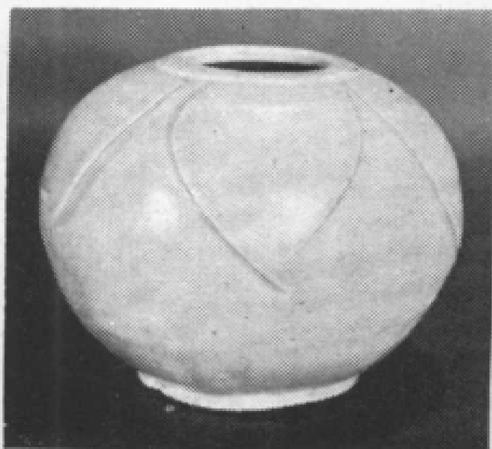
江西景德鎮亦爲窯業的一大中心。此地燒製了清澄的青白磁（影青）和白磁，閩省的水吉縣則出產黑釉磁（天目），德化縣則出產白磁。閩粵兩省的其他地方，也有很多磁窯，製有青磁、白磁、青白磁等作品，同在對外貿易方面發揮着作用。

宋代華南的青白磁和白磁，有其很大的特色。此即以陶石爲原料的優美磁器，中國陶磁因此而更臻一大飛躍。世界陶磁界自此以後，纔開始追踪中國所創獲的磁器，不僅要做複製品，還集中努力於製作更爲進步的磁器。

一方面，華北的磁州地方，也成了製陶中心，此地大量生產白釉、黑釉和白釉黑彩的陶器（磁州窯系），河北定州的定窯，則爲宮廷、貴人之使用，而做出了高級白磁，而陝西的耀州，河南的洛陽、開封附近，則燒成了種種罕有的青磁（耀州窯、臨汝窯、汝窯、北方宮窯）。

銜接宋朝的元代（一二七一—一三六八），在前此的青磁、青白磁、白磁、黑磁等之外，又生產了新形式的磁器。此即白磁青花、白磁五彩和釉裏紅。白磁青花（即藍釉磁器）主要是在景德鎮所燒的美麗白磁之上，用鈷釉繪出有趣的故事畫，和寫實的花草繪畫，或描出複雜的藤蔓花樣，白磁五彩將這些圖案，與鈷釉同時使用紅、綠、黃等顏料，描繪出非常艷麗的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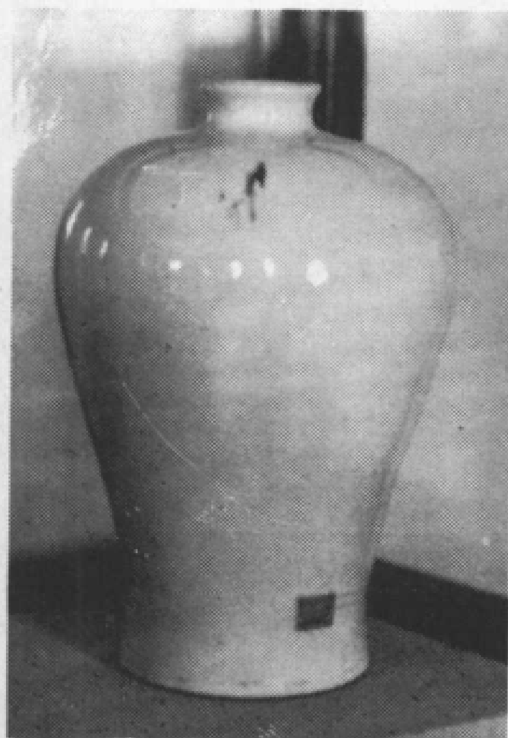
如此這般，固然可以想像用鈷和顏色繪具而描繪的方式，是感受伊斯蘭陶器的影響，可是中國的優越製陶技術，一方面雖在學習伊斯蘭製陶的技法



越州窯
（出光美術館藏）



青磁
（阿得畢爾收藏）



白磁
（阿得畢爾收藏）



青白磁
（日本松山古城出土　出光美術館）

，但它又立刻達成了獨自的優秀陶磁器。同樣應用伊斯蘭製陶的技法，在中國以新形式而製成的東西裏，甚至還有所謂法花這種以七寶的技法，而飾成的陶器。

自十四世紀中期明朝興起（一三六八—一六四四），陶磁器之生產，爲中國主要產業之一的情形，仍無變化，有諸多種類的陶磁，一直賡續前代而製作。惟十五世紀過後，久踞華南陶磁王座的青磁，轉趨衰微，青花變成了中國陶磁的代表。同時，五彩發達起來，出現了華麗的種類，在此一時代的後期，金色也被盛行使用（金襴手）。此爲文化爛熟時代的陶磁。

自十七世紀開始的清代（一六一六—一九一二），對此種情形，仍無變化，中國的陶磁器一方面是愈臻精巧，另方面又愈趨華麗。在白磁表面使用種種色彩，描繪精細的花鳥畫（豆彩），亦開始於這一時代的初期。

因此，在長年之間，許多窯場生產了大量的陶磁器，於滿足擴大的國內需要之外，又向海外輸出；其範圍遠及非洲，其輸出情形，約如下述。

福斯塔特的中國陶磁

在如此情形下的中國陶磁器之中，發現於福斯塔特者，唐代的東西有唐三彩、邢州白磁、越州窯磁、黃褐釉磁、長沙窯磁，尤以越州窯磁爲多。

自十世紀起至十三世紀的宋代，爲中國生產品質最高陶磁器的時代，這一時代的馳名製品有龍泉窯的青磁，閩粵兩省窯所燒的青磁，景德鎮的青白磁、德化窯及其他南方的窯之白磁，還有北方定窯系的白磁等。至於十三—十四世紀元代的陶磁，除青磁、白磁、青白磁之外，還有不少是在這一時代剛纔出現的白磁青花。此外也有似乎是廣東方面所做的褐釉陶磁，自十四世紀末起，下迄十七世紀，明代陶器之種類，與元代大致相同，但因其加上了五彩，故又增加了明亮度。

如此列舉下去，可說幾將中國華中華南的重要窯製品，網羅殆盡了。但華北製品之所以居於少數，或因距輸出之港口較遠之故？令我們最感興趣的是，我們在多數碎片中發現了據推測爲遼國首都所製做，具有特徵的白磁（即所謂遼白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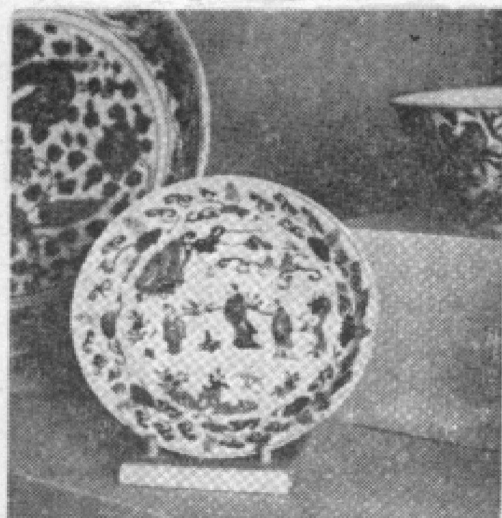
此等中國陶磁的磁質，咸屬至極優良之品。如就各種各類詳細敘說，未免過煩，現僅舉一二例，以概其餘。那裏有自唐末到五代，有多數生產且對外輸出的越州窯磁，黃褐窯磁等，鉢的內面有美麗



伊朗蒐藏的中國陶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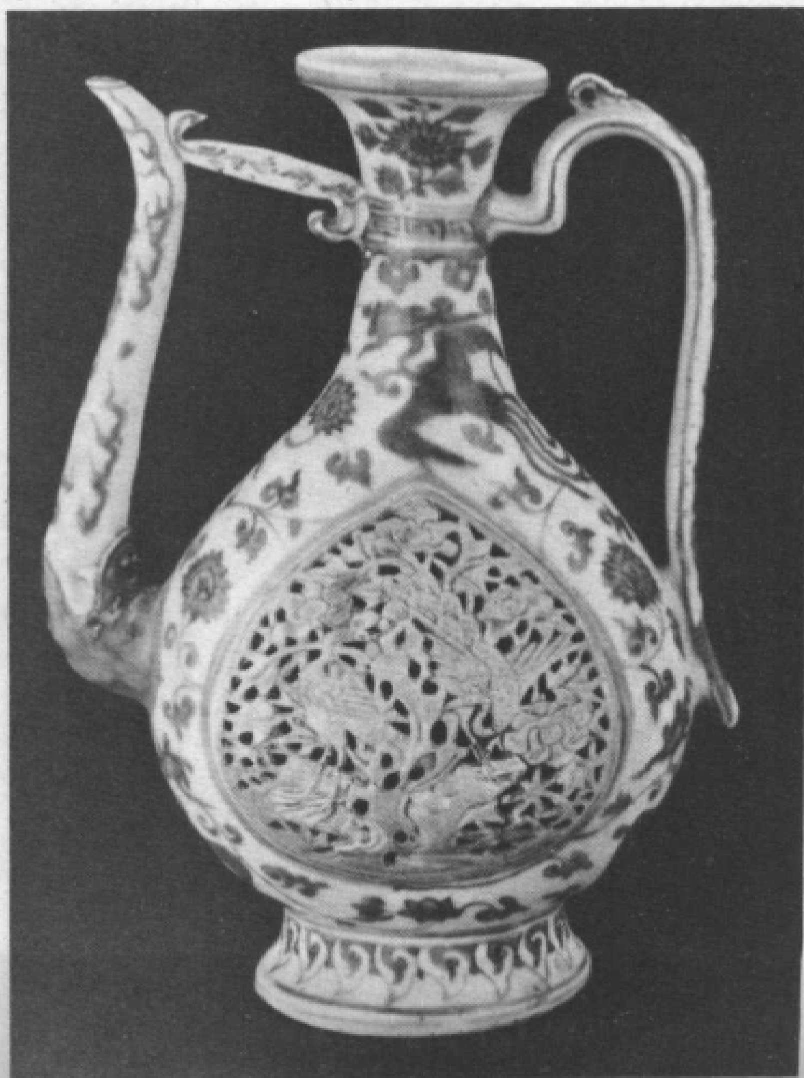
△元代圓盤

▽明代彩繪盤





明初彩瓶



明的金襴手

的篦彫和線彫的花紋，有時尚有少數具有透彫者。顏色是用上品橄欖綠的釉子覆蓋，堪稱精品。

我們如僅止於這種信口說說，人還未必眞能認爲它就是優秀的作品，我們且將同一時代輸入於日本的陶磁，加以比較研究。

因爲日本是中國的近鄰，人與人間亦有往來，故越州窯磁或黃褐釉磁，對日本亦有輸入。現在博多（按即福岡市的舊名—譯者）平和臺球場之地址，即爲當時接待外賓的鴻臚館舊址，由那裏曾發現了相當多的越州窯磁破片。大概這都是供賓客使用而珍藏的食器。

然自平和臺所發現的越州窯磁幾乎全都是沒有任何花紋、頗爲粗糙的製品，與自遙遠的福斯塔特所出土的東西比較起來，頗有差別。這究竟是由於兩者間財富的差異呢？抑係由於規模的不同呢？實不免令人深有所感。

越州窯磁最近已成爲重要的觀賞陶磁之一，輸入日本者頗多，爲蒐藏家所愛藏，但即在其中，也很少有如發現於福斯塔特的大量良質越州窯磁。因此可以想見，九—十世紀的當年，輸往福斯塔特的商品，實爲比較優秀的品質。這件事對我們實爲一大驚異。

那末，由中東各處所殘留的中世紀都市遺址，所出土的越州窯磁，是否到處均爲如此優秀的品質？其實也不盡然。在伊朗內地東西交通路上；一個重要中世都市遺蹟尼夏普爾，以及自波斯灣沿岸和東非海岸港口遺址，均有相當數量越州窯磁的破片出土、它們大致均與自日本博多的平和臺球場邊所出土者，性質相同，都屬普通產品，或爲輸出而製作的東西。

我現在關於最古的越州窯磁，雖然舉例很長，但因其與自福斯塔特所發現的任何種類的中國陶磁，均能相合，故不再多贅。但有一件事仍必須在此一提，即在此曾發現了元代的青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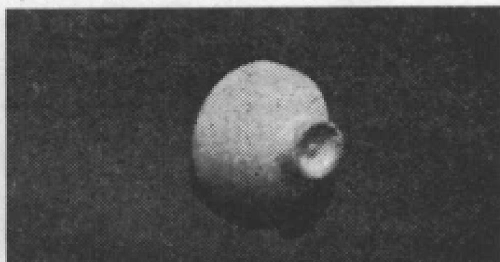
在景德鎮所製之清楚的白地磁器之上，用鮮豔的鈷深藍色，繪有花紋、鳥獸文或風景、人物等的白磁青花，據我看似爲元朝感受波斯的伊斯蘭陶器之技術的影響而產生者，元代製品，花樣也未曾形式化，筆致敏銳，頗能表現創始期時代的強勁之氣。唯初期製品爲數極少，故非常爲人所珍重。據小山富士夫氏估計，元朝青花的完整無缺者，全世界祇有二百件左右而已。

元朝青花的非常優秀陶片，曾自福斯塔特遺蹟發現數百枚之多。它們雖僅爲破片，但對於研究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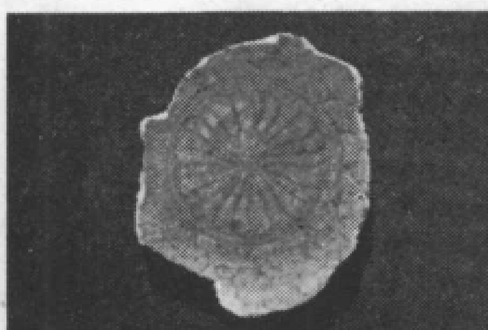
在福斯塔特遺跡發現的中國陶磁製品的破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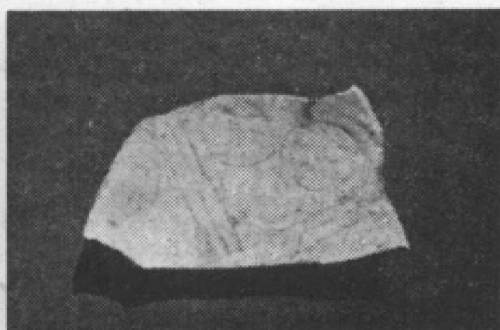
三彩皿



白釉碗



黄釉刻線文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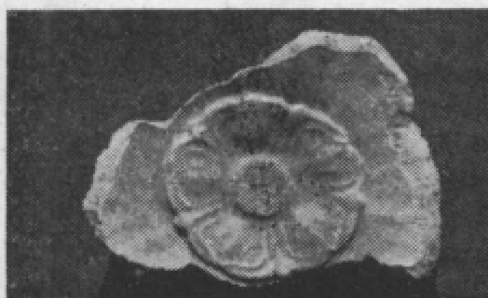
白地刻線文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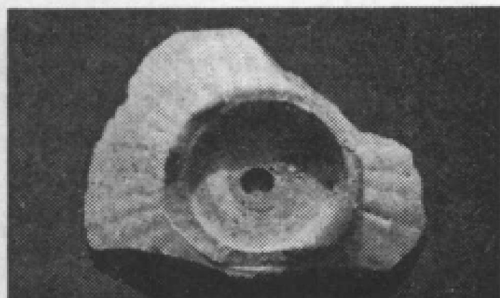
青釉刻花文鉢



白地染付花文台付鉢



青釉貼付花文鉢（内側）



青釉貼付花文鉢（底部）

代青花工作上，却是非常重要的資料。

元代青花即使在中國，價值也是非常之高的，可是竟在這一遠隔重洋之處，從遺蹟之中發現了如此大量的破片，這件事證明着當時的開羅市民，如不是相當富有，便是愛好珍奇，不然便是愛好中國製品，或因中國陶磁的利用價值極高，必居其中之一。不，這種出乎常情之事的產生，必係上列各種原因，兼而有之的結果。

中國陶磁的複製品

當時埃及人之愛好中國陶器，從其他方面，也可得到證明。

在福斯塔特遺蹟倉庫之中，藏有陶器破片六七十萬片，如前所述，其中之大部分為埃及所自製。

可是，在這些埃及製造的陶器之中，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在某些點來說，都是中國陶磁的複製品。這種複製品是當中國陶磁一經輸入，即於其時代倣製。

當三彩陶磁輸入的九——十世紀，仿製品有多彩彩文陶器和多彩刻線文陶器，白磁進口後，又倣製了白釉陶器。埃及製的越州窯磁，是帶有黃褐釉刻線文磁器作風的。但於九——十世紀所製倣者，既在模倣中國陶磁，又附加伊斯蘭獨自的裝飾，以表現伊斯蘭特色，至於十一世紀以後的青磁和青白磁，以及白磁青花的複製品，似乎都是漫不經心的倣造。如果是一枚破片，立即可以分曉是中國的磁器，或為埃及的陶器，但其中也有在形狀和花紋方面，不能僅靠照片便可分辨清楚的。

青磁系和青花系陶器等，僅靠照片，確有難於分出何者為中國青磁，何者為埃及倣製品之苦。

日本於鎌倉時代亦在瀨戶模造了中國青磁製品，但無論在色調上與形式上，均未能達成如此酷似的作品。

唯有自十五世紀左右起，在青花方面，此處於生產倣製中國式品物之同時，也轉變生產伊斯蘭式的陶磁。

埃及需要中國陶磁如此之多，真貨之不足，便加以倣造，此種事徵之日本明治、大正，甚至眼前仍舊喜愛洋貨、舶來品的倣造品充斥市場的情形，試一想像便不難瞭解。尤其是當時的埃及，對於商品的本身非常嚮往，但並非對製倣商品的外國，也無條件加以崇拜。

紅海岸的港口，愛札布的遺蹟

我們的話有如天方夜譚一樣堆砌起來，現在再稍就當時熱愛中國陶磁器情形，繼續談談。

兩次調查福斯塔特遺蹟陶片之結果，我們對於由此一遺蹟之中，發現出乎預料之外的多數中國陶磁，以及其倣製品一事，頗感震驚，但對此等磁器究竟由何處運抵開羅，這又不得不調查清楚。貨物是在何處卸下的？是經過什麼路線，纔將這些貨物運到福斯塔特或開羅的？

因爲商品之經過船運是很明顯的事，故貨物之卸下，也非在紅海沿岸不可。但是，縱使是現在，紅海沿岸，尤其是接近埃及的北半部，是和阿拉伯半島暨西奈半島一樣，全是沙漠，這是一段很難行走的地方。在其沿岸極少適於人類的飲水，由海岸導向尼羅河畔的幾條隊商道路，雖有水井，但礦物質非常利害，通常是無法飲用的。

因此，要想到埃及方面散布於紅海沿岸一千數百公里之間的礦山和小漁港去，便必須由蘇彝士準備舟船運水，不然便須蒸溜海水使之變成純潔之水備用。總之，這是幾乎祇有沙子、岩石和天空的無情之地。

這一地方雖屬荒涼無情，但自法老時代起，在紅海沿岸也曾有過從阿拉伯及其他地方，運卸香料、象牙以及金銀等物的港口；在羅馬時代，從北方數起，也剩有密歐斯、厚爾茅斯、庫色爾、貝勒尼克等自古有名的港口遺跡。自三四千年前起，人類對奇珍異寶的欲望，該是如何強烈，對利益的追求，該是如何激烈，支配階層的權力對於維持沙漠海岸上的大港口之通行，其權力之大，確是驚人。

那麼，伊斯蘭時代，將中國陶磁運到尼羅河畔，並將其卸下的地點是那裏呢？檢點一下古代記錄和調查報告，纔了解到現在蘇丹國境的紅海岸邊，從十世紀到十四世紀，有一個名叫愛札布的港口，在該港口的遺蹟中散布着中國陶磁片。在隔着紅海對岸的阿拉伯半島上，麥加的外港吉達爲最近。指點給我們這件事的，是曾任埃及地理調查所所長，英人約翰．莫雷氏所寫的幾頁短短報告，他曾於一九一二年訪問過該地（註）。

註：G. W. Murry : Aidhab.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68, July-December, 1926

愛札布港，於十二世紀末葉有著名旅行家伊本．鳩拜爾（Ibn Jubayr），十四世紀又有大旅行伊本．巴托它（Ibn Battuta）前後遊歷過，他們不僅寫下了趣味盎然的各種記事，而且在各種阿拉伯的記錄裏，也可隨處發現有關此地的事情。

根據此等記載，自十世紀左右起，從印度方面溯紅海開往埃及方面船隻所指向的目標，均爲愛札布港。又自此出發之船隻，半數是開往遠在印度西南海岸的馬拉巴（Malabar），半數則是開往印度西北岸的古加拉特（Gujarat）。此一海港的使命，不僅做爲開往附近麥加城朝聖船的出發點。據葉門猶太商人的記錄，自印度運往愛札布的商品，以中國陶磁爲第一，其餘則爲胡椒、藥草、絹、眞珠和鐵等，故在此發現中國陶磁，實毫不足怪。

自十一世紀中葉起至十四世紀中期，爲最繁榮時期（一〇五八－一三六八），上述的鳩拜爾甚至於說「因來自印度和葉門的船隻，出入頻繁，故成爲世界上最繁盛城市之一」。（註）

註：家島彥一「有關印度洋通商史之研究」「Orient」雜誌、第十卷、十二號。

我們以莫雷氏的簡短報告爲線索，以愛札布爲目標，決定南下紅海海岸。在南下途中，歷盡艱辛，第七天抵達愛札布遺蹟。

因爲並無所謂正規的道路，所以在沙漠之中，便幾乎像漂蕩一樣地向南行進。那最後兩天痛苦的程度，簡直超出了預想之外。一輛載重的大卡車，運轉方向稍有錯誤，便陷入沙中，而卡車剛剛拖出，這次又輪到吉甫沉沒了。

倘汽車在此不能行動，則調查工作等於萬事皆休。還不僅如此，假如運氣壞，另輛汽車忽然不見，即有生命的危險。在我們出發之前，聽到德國的調查隊在西邊沙漠中，陷於不能行動，而使五名隊員喪生，因此拼命將車輛拖出。這眞有如船隻在海洋上遭難一樣的感想。

我們雖然遭受了如許痛苦，但從蘇彝士起到愛札布，途中也有很多趣談和奇事。在此固無暇一一展開，不過，在前往愛港途中，所碰到的自羅馬時代起，繼續到十三、四世紀，具有港口的庫色爾遺跡，和採集宋、元時代的中國陶磁片一事，還頗足一道。埃及發現中國陶磁之遺蹟，又增多了一個。

愛札布港在一個面對珊瑚礁海岸的荒涼沙漠，和貧瘠的草原地帶，留下了它的荒廢光景。我們找到它當時的喜悅，眞可說是大喜過望。我們的調查工作，從此開始。

愛札布港遺蹟和中國陶磁片

遺蹟散在沿岸約兩公里地方。港口市區的中央部分，擴展於海岸較低地方，背後是六－七公尺的海岸階段式臺地，在那一部分裏還殘留着大小建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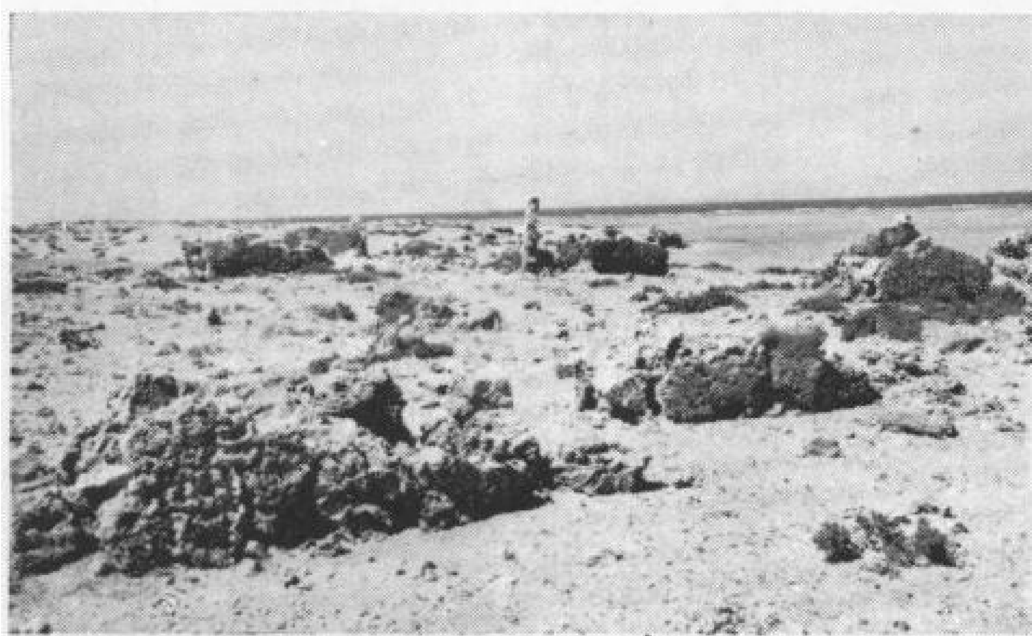
物的遺跡，在臺地的東端，也有類似清眞寺和燈塔的痕跡。

宛如生活在沙漠孤島中的這一港口居民，大概是彼此靠近羣居的，日常來看顧他們的，唯有騷動的潮音，和吹過紅海烈風的聲音，生活是寂寞無聊的。可是也正因如此，每當商船或向麥加方面的朝聖船，穿出海面珊瑚礁的裂口，前來訪問時，居民一定是喜悅愈恒。

該地没有木材和好的石材，因此每家的牆壁，都是用切成塊狀的珊瑚礁石所堆砌。同時，在居住區周圍約有三千個成羣建築好的古墓石棺，也都是板狀的珊瑚礁石，其中的某些坟墓，還附加上開放美麗花朵的花紋，那種情景，給人心胸之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港口的設施和四個巨大的儲水槽，當然也都是用珊瑚礁塊所造成。由遠處船運來此的飲水，被珍重地保存於儲水槽內。放眼一看，任何建材都用珊瑚礁石。所以要把此地叫做「珊瑚礁的遺蹟」，當最爲相宜。環境的嚴酷，令人感歎。

但此地沿着白沙海岸，生長着青葱一片，類似伏地松的灌木，在海岸和碧海裏，游着無數的紅色長脚蟹和魚類，頗能慰人寂寞。因爲人是想念生物的。遠望西方，是巍峩高聳的耶爾巴石頭山，這對於航海之人，必是一個好目標。



愛札布港遺跡

孤獨、寂靜、没有一個人居住的沙漠海岸，唯有在那裏躺臥的廢墟，它纔能把人類的種種激烈行動，和歷經四百年的苦難歷史，向吾人申訴。

這裏有中國的陶磁片，而且到處都有。爲了下次有機會從事發掘調查，而準備書一份遺蹟詳圖，在我們巡行的脚下，到處都碰到它們。越州窯磁、龍泉窯磁、白磁、青白磁、白磁青花、黑褐釉磁等等，雖屬小的破片，我們檢拾蒐集到唐末、宋、元、明初各期的東西，約千餘件。還有一把素朴的黑褐釉磁壺破片，其中還蓋着「口清香」的印章。這是否爲廣州方面所製作，裝香料來的?完全和這個遺蹟一樣，在遺蹟上全面散亂着中國陶磁，眞是難得。因此，這顯示了一項事實，證明此處確是衡過萬里洪濤巨浪，運來中國陶磁的主要卸貨場。

根據記錄，在此所卸下的物資，更橫貫過西面的沙漠地帶和石頭山，而運至尼羅河畔的庫斯以及阿斯萬。庫斯是位於因有王陵的山谷等而有名的魯克紹爾之北方，爲一商業城市，由愛札布到庫斯，據說以隊商的走法，還有九—十日的途程。

運送到尼羅河畔庫斯和阿斯萬的商品，一方面是沿尼羅河而下，運至河口，一方面是溯河而上，運至古代衣索比亞(現在奴比亞南部)

中國陶磁器就這樣冒着海陸一切的危險，和一切困難，自福斯塔特—開羅，運送到亞歷山大。當它們行經數萬公里之遙的行程時，不能不在各種意義上，驚訝於人類欲望之深和強烈了。

以上我所說及者僅止於福斯塔特遺跡和愛札布之事。但當我漫步於開羅，更可在種種地點檢拾着中國陶磁片。其中之一就是帖爾卡特・耶爾瑪拉(Jel Qatel Mara)的小丘。這一人工丘陵，位於開羅市街東端，距著名的阿茲哈爾禮拜寺不遠。據說這是自瑪穆爾克時代以來，隨現在開羅市街之建設，而堆積的廢土所形成，在此丘陵之中，尤其在巴布大爾布・耶爾瑪哈爾克(ab Darbel Mahruq)一帶，埋藏有大量質地優良的中國陶磁器破片。其中包涵着很多南宋、元、明時代的龍泉窯青磁，南宋、元、明時代的景德鎮青白磁，元、明清時代的青花，明、清時代的五彩。令人一見而懸想其或爲毀壞富豪邸宅區的廢土。假如在此小丘的某處，其情形是如此，則輸入開羅的中國陶磁之數量，將益爲驚人。似乎每家所使用者，均爲良質的中國陶磁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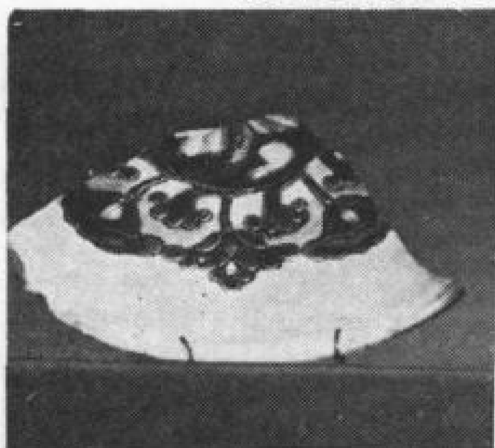
惟從此小丘之中，未曾發現如同在福斯塔特遺蹟中所有的唐代越州窯磁，和北宋時代的中國陶磁。這是因爲這一地區使用中國陶磁的年代，較諸福斯塔特遺蹟爲遲的緣故。

其他地點也有中國陶磁片出土。在開羅市街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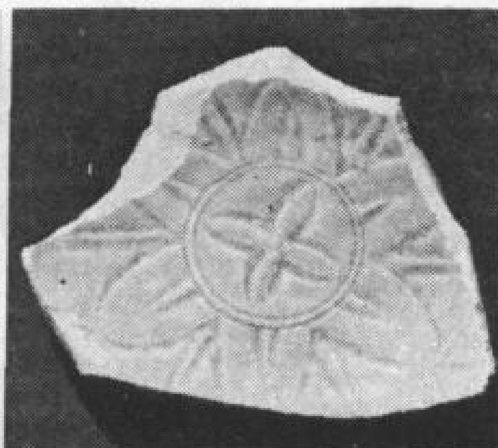
端，有一埰法蒂米德時代的開羅堅固城牆，在其南部之一角，有座建於十九世紀初之壯麗的穆罕默德阿里的清眞寺。據開羅美國研究中心史堪龍氏(George T. Scanlon) 說，於發掘調查阿里清眞寺不遠處城牆附近時，有宋代陶磁破片出土。東面的城牆向北，其尖端因正與上述帖爾卡特•耶爾瑪拉的小丘相連接，故史堪龍氏所採集的中國陶磁片，或與此丘中之遺物，具有關係。

總之，在開羅無論走到何處，都有中國陶磁的芬芳。因此，訪遊這一古都，又平添了一層情趣。

福斯塔遺跡出土的中國陶磁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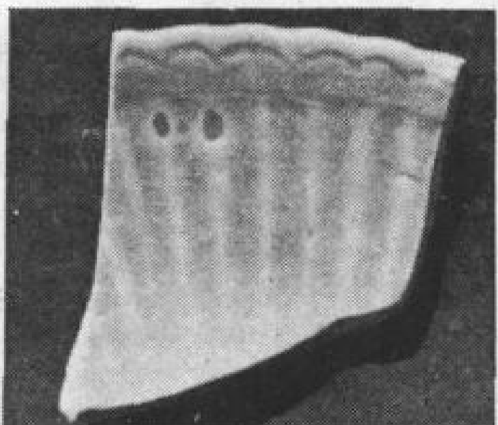
唐三彩盤



越州窯鉢



青白磁皿



龍泉窯青磁鉢



貼付花文青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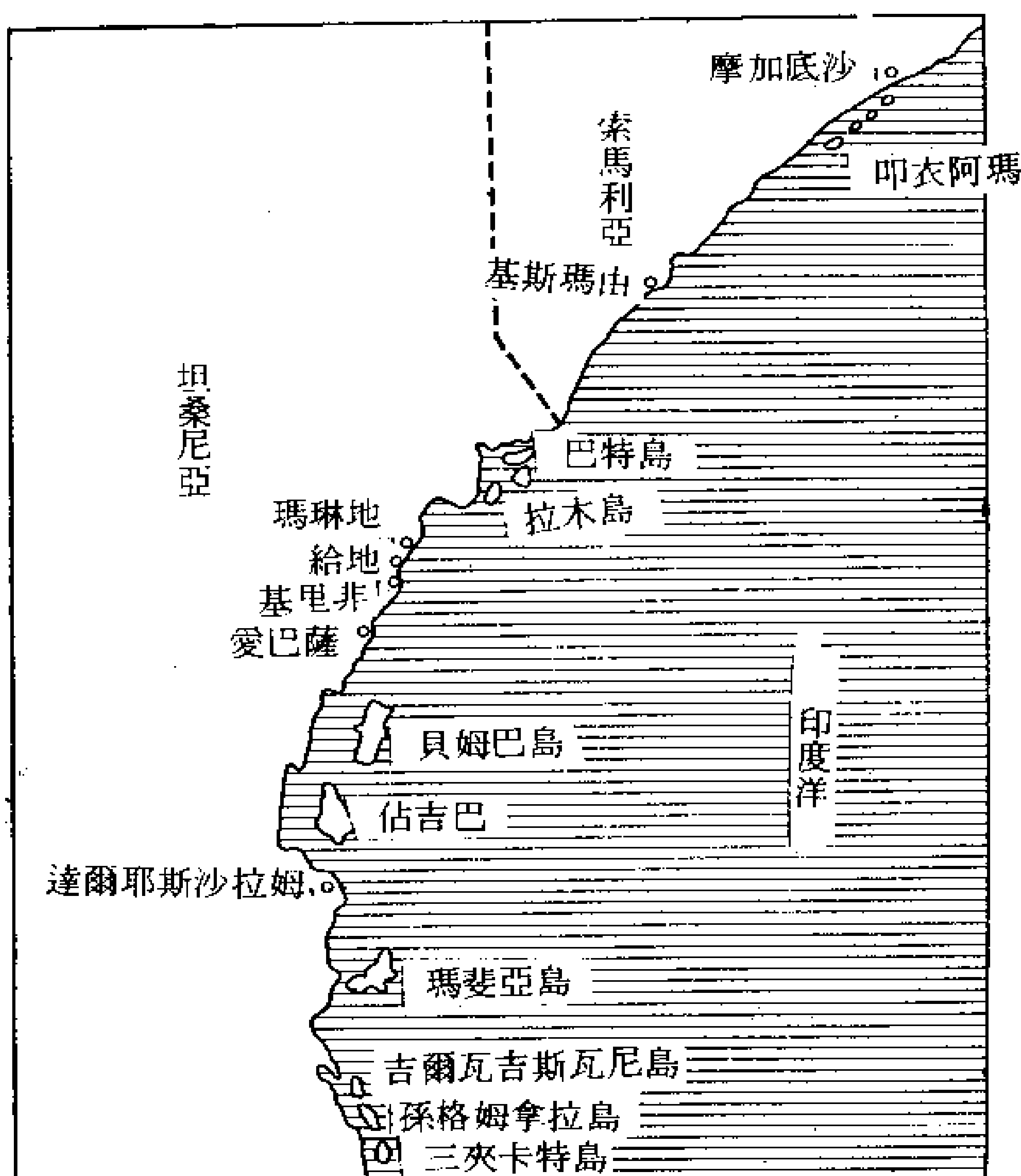


元染付

二、遺留在東非的中國陶磁

——中華文化的西漸





摩加底沙
索馬利亞
叩衣阿瑪
基斯瑪由
坦桑尼亞
巴特島
瑪琳地
拉木島
給地
基毛非
愛巴薩
印度洋
貝姆巴島
佔吉巴
達爾耶斯沙拉姆
瑪斐亞島
吉爾瓦吉斯瓦尼島
孫格姆拿拉島
三夾卡特島

東非諸國

溯尼羅河而上

紅海是一個名實不符的、美麗而碧綠的海。它的色澤由於環海沙漠粗獷的紅褐色調，而更顯得深沉暗淡。對岸西奈半島白色岩石的山嶺，威嚴地聳入雲霄。

在沿此紅海岸南下約五五〇公里處，有一個名叫庫色爾的城鎭。此地自法老時代的末期起，經過羅馬時代，直至眼前的伊斯蘭時代，是一個壽命很長的港口城市，在埃及領有的紅海岸上，這是唯一像樣的城鎭。在市街中心，還矗立着一座興建於奧斯曼土耳其佔領時代，堅固的方形城塞，它雖已半趨朽壞，但仍以冰冷的形骸，暴露於白日之下，這宛如以古老的歷史自矜，也像似空懷往日的榮華，令人發生落寞悽涼之感。

像許多中東城市所經歷的一樣，這一城市也是在悠久的歷史洪流之中，不知有多少次，被劇烈的興亡命運所播弄，山河幾易其主了。現在的市街就是淪於奧斯曼土耳其統治以後所營造，中世以前的城鎭，在距此北方海岸約七公里有餘的地方，僅剩下一堆殘破的廢墟了。

在面臨小灣的舊庫色爾廢墟，剩有許多爲砂子所掩埋的大小丘墟，那裏散亂雜陳着羅馬時代毫無章法的青色埃及陶器破片，以及纖細的伊斯蘭陶器片，和玻璃與無數素燒水壺碎片。這一港灣自從羅馬時代起，一直到伊斯蘭時代的十四、五世紀左右，曾因船舶的出入而繁盛一時。

在調查愛札布遺跡的途次，我們在這一遺跡上，一方面徘徊，一方面緬懷着往跡，從許多散亂的陶片之中，拾到了不少中國陶磁片。它們是唐末、宋初的越州窯系青磁、宋龍泉窯的青磁、景德鎭的青白磁，以及元末明初的青花破片。尤其是這種青白磁的破片，安靜的淡青色，裏面充溢着東方的美感。這就是迄今尙無人報導過的，中國陶磁在埃及的新出土地點。我們禁不住歡呼起來。

因此而知，在埃及登上陸地的中國陶磁，不僅是此後我們行將做爲目標的愛札布，卽在其他許多港口，也都曾卸過貨。這也說明了在埃及地方，中國陶磁消費地的多樣性了。事實上，中國中世紀陶磁之發現於尼羅河流域者，並非僅止於福斯塔特和開羅兩地。此外，在種種地方均有發現，試追尋概述如次。

亞歷山卓與阿普新貝爾附近

位處尼羅河河口的亞歷山卓港，可稱得起是於紀元前四世紀後半，亞歷山大大王所建設的許多城

市之中的第一個，它以有當時列為世界七奇的燈塔和大圖書館而聞名。還有一件未經證實的傳聞，那便是亞歷山大的遺骸，也是葬於此處。羅馬時代當然極為繁盛，現在仍是具有清潔沙洲的海岸和整齊港口的中東有數都市。

為了追尋羅馬時代中東中心地點的文化遺跡，近年波蘭考古隊，曾選亞歷山卓站前不遠的幾個地方發掘，在地下四—五公尺處，發掘出埋沒着的四世紀前後，羅馬時代建築物的遺跡，一九六四年，從位於羅馬時代層之上的伊斯蘭時代層，發現了中國龍泉窯的青磁破片。隊員中一位可愛的泰蕾莎．包爾堪莎小姐(Teresa Borkansa)說，那似乎是十二至十四世紀，亦即南宋至元代的遺物。

由此可知亞歷山卓人也和開羅人一樣，都是渴望中國陶磁的。亞歷山卓當時是繁榮的海港，也因一一二二年兒童十字軍的悲慘犧牲而聞名一樣，那又是一個奴隸的貿易中心，所以有很多富商居住在那裏，中國陶磁也就裝飾了這些人的房間。

在埃及首都開羅的街上，現在還剩有幾座土耳其佔領時代所建築的石造富豪邸宅，現已均被指定為文化遺產，經訪問過其中與阿茲哈爾清真寺距離不遠的塞赫努(Sehenu) 一家，發現在其嵌有土耳其式花紋的二樓主室牆壁架子上，裝飾着中國十七世紀時幾十塊整套白磁青花盤子。在敍述上雖稍覺煩瑣，但藉此可視阿拉伯貴族人的趣味，自亦引人入勝。這與同世紀歐洲貴族和富豪的趣味相同，十二三世紀亞歷山卓富豪的邸宅，大概也是以同樣的情調，貯藏着中國的青白磁器。

亞歷山卓與中世紀的中國青磁，當然有其相得益彰的關係，可是能够給予實證，也未嘗不是一種可喜之事。

溯尼羅河而上，離開三角洲即達開羅。開羅與中國陶磁的關係，前文業經述及，茲不復贅。（編者按：參閱本刊八卷十二期「在埃及廢墟中發現中國陶磁」）再向上游走去，便到了尼羅河第一個有瀑布流水、風景幽美的阿斯萬。

阿斯萬因最近建築高壩而著名，當地於法老時代，即為使用於建築方尖塔、以及其他建築的良質紅色花崗岩切石場的重要地點，伊斯蘭時代初期的法蒂瑪朝（九〇九—一一七一），當其自突尼西亞進入埃及之際，那裏還是移往開羅之前的首都。所以在阿斯萬的小丘之上，迄今仍遺有累累法蒂瑪朝時代帶有變形圓頂的墳墓。前章所說自愛札布越過東面沙漠兩條隊商道路的南邊一條，即走向阿斯萬的。

因此可以想像在愛札布卸到陸上的中國陶磁，

當然是可以運到阿斯萬的。果不出所料，在當地也發現了南宋和元代（一二—一四世紀前半）的中國青磁。

中國陶磁不僅爲下游地帶貴族和富人的寵愛對象，甚至可說在全尼羅河流域都市，已全面把它們當做心愛之物了。

如果認爲阿斯萬是位處相當腹地部分，可是據報在更上游的努必亞地方，也發現了中國陶磁，豈不更令人吃驚？發現中國陶磁的地點，即在因建築阿斯萬高壩被水淹沒，復用鉅金移往山丘之上的阿普新貝爾Abu-Simbel 神殿之南、約五公里的杰貝爾．阿達(Jebel Adda)。

調查這一遺跡之人是英國青年馬丁敏斯(Martin Minns)，據馬氏自己和指導他的斯堪侖博士說，從此一伊斯蘭時代遺跡之中，發現了十二至十四世紀的宋代青磁。

如此可知中國中世陶磁的足跡，已溯尼羅河而上，逐漸深入內地。因此，最後它也到達了阿比西尼亞。

阿比西尼亞高原

阿比西尼亞爲青尼羅河發源之地，乃一擁有悠久歷史的高原國家。

阿比西尼亞不是回教國家，她以信仰古哥普特(Copt)派基督教爲特徵。據馬修的報告（註），在該國東部，和幾個可稱得上是前往面臨亞丁灣索馬利亞的吉布奇港(Djibouti)窗口的阿姆德(Amud)、阿巴莎(Abasa)戈給撒(Gogesa)、以及更位處於腹地的哈拉爾(Harar)和達加布爾(Dagahbur)、愛克(Eik)等地，都有宋、元、明時代的陶磁器破片出土。

註：Gervase Mathew: Chinese Porcelain in East Africa and on the Coast of South Arabia. Oriental Art New Series, Vol. II, No. 2, 1956.

中國陶磁之發現，實不僅限於埃及一地。

古代阿比西尼亞與埃及的關係，正如同威爾第在其壯麗的歌劇「愛達」主題中所傳述的一樣，非常悠久，埃及有力的法老們，爲了獲得此地的黃金、寶石，以及香料象牙等，曾屢次派軍來此遠征。

到中世的伊斯蘭時代，貿易關係雖仍在繼續，但與外國接觸的門戶，似乎已轉移到亞丁灣內的索馬利亞港了。

如我在下文所述，阿拉伯半島南岸的亞丁，和在其東北的阿布揚港，是包括中國陶磁在內的貿易

商品大市場，它的商品都在對岸的澤拉（Zeila）城——中世紀的澤拉，位於現在澤拉海裏的沙丁島(Saddin I.)——卸貨，然後再由此地用駱駝馱往高約一千五百公尺的阿姆德等高原城市的中繼貿易地點。據馬修氏的研究，十四、五世紀時，該處爲阿達爾王國（Adal）所領有的城市，故從此等高原遺跡所發現的中國陶磁，據說與從阿拉伯半島南岸阿布揚都市遺跡所發現的十三至十五世紀的中國陶磁，完全相同。熱心追求利益的阿拉伯商人隊商行列，令人瞠目。它們把中國珍貴陶磁等物，運入阿比西尼亞，於交換寶石、香料、象牙等等之後，獲致了重大贏利。

在阿姆德所交易的中國陶磁，更供給到腹地的哈拉爾和達加布爾城。在此地所發現的宋末、元、明初的中國陶磁，背後隱藏着如此辛勞，這種狀態一直延續到十六世紀。

眼前雖尚未發現，但中國磁器更遠送到內陸阿的斯阿貝巴方面，當無疑問。

東非沿岸的港埠

如謂索馬利亞的港口沙丁島，是中國陶磁輸往阿比西尼亞方面的卸貨地點，則在東非沿岸，另外仍必有其他卸貨的港埠。

再由亞丁灣的索馬利亞起，繞過所謂非洲突角(The Horn of Africa)的瓜爾達菲岬 Guardafui，南下到面對印度洋海岸的索馬利亞、肯亞、坦干伊喀，在此等地方便可發覺到，在海岸與海島之上，出土中國陶磁器遺跡之多和散在之廣。同時在坦干伊喀海上的桑吉巴島，和巨大的馬達加斯加島，也均有出現。

遺跡數目是如何的多，由英國弗立曼、格林威爾氏（Freeman Grenville）所作，於一九五〇年代中期的三年間，僅在坦干伊喀海岸，即找到了四十六個有中國陶磁遺跡的報告（註），已可思過半了。

註：Gervase Mathew: Ibid., p. 53.

太小的遺跡名稱從略，茲僅舉有問題的遺跡名稱計有：索馬利亞靠亞丁灣的沙丁島和貝爾貝拉(Berbera)、靠印度洋的摩加底沙（Magadicio）、基斯瑪由(Kismayu)、以及科伊阿瑪諸島(Coiama Is.)，肯亞有德恩福港(Port Durnford)、帕特島(Pate I.)、曼達島(Manda I.)、拉木島(Lamu I.)、曼布魯依(Mambrui)、給地(Gedi)、瑪琳地(Malindi)、基里非(Kilifi)、姆拿拉尼(Mnarani)

和蒙巴薩（Mombasa）。坦干尼喀則有裴姆巴島(Pemba I.)、瑪菲亞島(Mafia I.)基爾瓦・基斯瓦尼島（Kilwa Kisuwani I.）、雙高・木拿拉島(Songo Mnara I.)、桑吉雅卡特島（Sanji Ya Kato I.)和基爾瓦島(Kilwa I.)。此外，桑吉巴的許多遺跡，亦屬重要。

從此等若干遺跡之中，除中國陶磁之外，還發現了中國銅錢。例如，一八九八年，一位德國人就曾在摩加底沙發現過宋錢，一八八八年，英國人也曾在桑吉巴拾到過宋錢（註）。東非與中國的聯繫，像是愈來愈密切了。

註：F. Hirth: Early Chinese Notices of East African Teritories. J.A.O.S., 1909, pp. 55-57.

這時坦干尼喀的基爾瓦島、肯亞的給地、基里非的阿拉伯人廢都和寺院，都曾經人調査，它的情形可說是這樣的。

基爾瓦島位於坦干尼喀首都三蘭港（Dar es Salaam）之南二百四十公里處，距離大陸海岸並不太遠。在該島的西北角，有一個中世紀的都市廢墟，這一點足可說明此地在中世時代，曾是一個貿易中心。

距離大陸海岸僅有短暫程途的海島，成爲通商活動之中心者，不僅此地爲然。在上述遺跡之中，島名甚多，它們都是自大陸於指呼之間，卽可抵達的近島。波斯灣岸有名的中世紀荷爾姆斯海港，便是這樣，亞洲自十九世紀以後，星加坡和香港也是如此，它們不僅祇是良港，當大陸部分情勢呈現不安之際，人們總可想到此等地方是可以避難，並爲作安全通商而活動。

發掘基爾瓦島城市遺跡之人，是英國東非考古學古代史研究所長的奇梯克氏(Nevill Chittick)，越挖掘越調査，則摻雜於伊斯蘭陶磁中的中國陶磁，爲數越來越多。

據訪問東非親眼見過這種事實的美國宮麗阿美術館的約翰鮑普(Alexander John Pope)說，其中不但有十世紀唐末—宋初的越州窯磁，還有白磁碗。既有爲數很多的十四—五世紀初的青磁，又包含着十四世紀前、中期（元代）的鳳凰、蔓藤花樣的白磁青花。就中還有元代在素地上帶有彫刻花紋的白磁，以及所謂樞府窯的製品，種類繁多。

此外還有一件罕有的事情，那就是在發掘物之中，還混有十四、五世紀安南的黑褐釉陶器，和同一時期的泰國斯萬卡洛克窯的青磁，更令人驚異的是裏面還夾雜着一片日本的古伊萬里白磁青花的破

片（註）。

註：A.J. Pope: Area Report on Africa. Manila Trade Pottery Seminar, 1968.

總之，自十世紀的後半以來，到十五、十六世紀，各種中國陶磁，都隨着時代運抵這一島港，倉儲起來，然後再銷售給背後非洲大陸東海岸的各地。下面再研究何以珍貴而優異的中國陶磁，竟會運到東非僻地。

隔着海島的大陸地方，對中國陶磁的喜愛情形，由下述對給地的阿拉伯人舊市街的調查，大致可看出些眉目來。

給地在肯亞蒙巴薩之北一一三公里處，在該城市中，尙遺有中世紀的建築物廢墟。發掘調查這一遺跡者，是在很早以前便從事於這一地方的調查工作，據現任蒙巴薩福特‧耶札斯國立公園長(Fort Jesus National Park）的傑姆士克爾克曼（James Kirkman）的報告書說（註），給地市街建於十二世紀，十六世紀初，有人自其南方的基爾瓦島遷入，乃新造城牆，因與葡萄牙貿易而臻於繁盛，於十六世紀末，因遭受隣居城市的攻擊和噶拉族的襲擊而滅亡。這一帶城市的興亡都在轉瞬之間，遭遇堪憐。

註：J.S. Kirkman: The Arab City of Gedi, Oxford, 1954.

而從此地的大淸眞寺和其他遺跡，也和中國南宋寧宗（一一九五－一二二五）時代的慶元通寶和理宗（一二二五－六五）時代的紹定通寶等，同時出土了很多的靑磁類——越州餘姚窯磁、龍泉窯靑磁，以及景德鎭靑白磁和廣東石灣窯靑磁—十四至十六世紀的白磁靑花類，以及僅有的一片釉裏紅。這些東西，都與相隔在幾百公里之遙的前述基爾瓦島的城市遺跡破片，屬於同一種類。

據上述目覩這一情景的鮑普說：其中以釉裏紅爲最美，描花的瓶子和畫龍的白磁靑花—約係十四世紀物—在靑釉下厚塗花紋的磁洲窯茶壺等，此外尙有意外發現的在釉下繪有黑畫的泰國斯萬卡洛克窯的破片。

東非的中世社會與中國陶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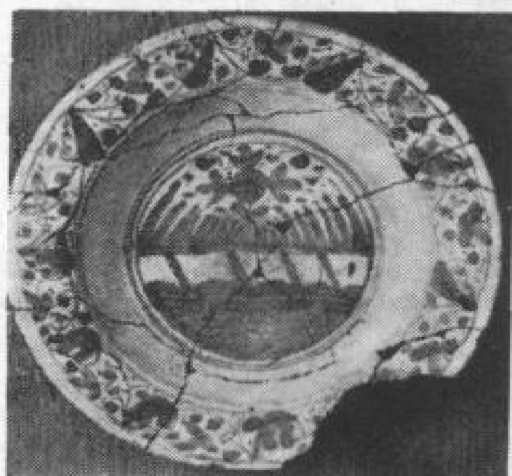
克爾克曼另外還有自其他遺跡，發現中國陶磁的調查報告（註）。報告稱該處爲位於蒙巴薩之北五十六公里基里非的牟拿拉尼淸眞寺及墓地，從這些地方發現了明代的白磁靑花。

註：J. S. Kirkman: Mnarani of Kilifi, The Mosque and Tombs. Arts Orientalis, Vol. Ⅲ, pp. 95-

111.

該處使用中國陶磁的方法，最有趣味。當地的阿拉伯人社會，爲了誇耀自己趣味的高尚，和財產的豐富，是把珍貴而高價的中國陶磁，使用於室內裝飾，並在宴席間供做食器和酒壺之用，這與其他城市如出一轍。可是在此地又發現了另一種使用方法，當地淸眞寺把它們用於寺院內部和柱墓的裝飾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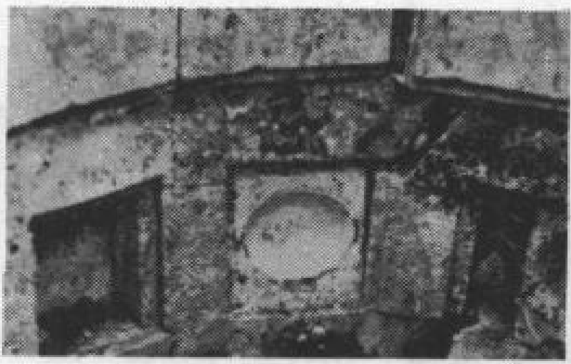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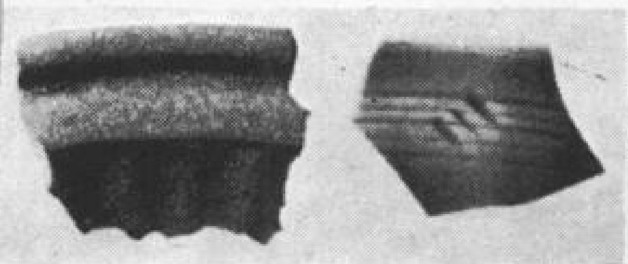


鑲嵌在基里非廟宇的中國陶磁（採自克爾克曼代論文）

人們在給地和基里非所殘留的十五—六世紀清眞寺廢墟中，可以見到輸入的中國磁碗和盤子，都在一定間隔之下，嵌入壁面，成爲裝飾品了。

像這種乍見頗爲奇異的壁面裝飾，在該地的中世大建築裏，似乎是極爲普通之事，例如坦干尼喀雙高木拿拉島宮殿遺址的牆壁和圓頂棚上，都整齊地嵌着內側朝外的青磁碗，看上去宛如柱槽中的緣飾一樣。





雙高木拿拉島的遺跡及陶片
（採自馬修代論文）

鳩阿尼島的庫阿（Kua, Juani I.）中世紀清眞寺的龕壁，也都是將中國陶磁，整齊地嵌入做爲裝飾（註）。

註：G. Mathew: Ibid., p. 52.

但鑲嵌中國陶磁用爲裝飾者，並不僅以宮殿暨清眞寺那種大建築物爲然。

在自索馬利亞越肯亞而至坦干尼喀海岸地帶的伊斯蘭時代遺跡之中，樹立着很多巨大的石柱墓標。這或者可稱爲柱墓（Pillar Tomb），柱的高度最低也有三公尺前後，最高有達八九公尺者，堂堂矗立，頗爲壯觀。石柱有圓形、六角形，四角形，以及希臘帶溝形的種種樣式，頭部有的是圓頂形，有的是細尖形。因附近多建有清眞寺，故亦有人誤認柱墓爲清眞寺尖塔者，非常惹人喜愛。這是所謂隔道不下雨，十里不同風，此地墳墓的形式，也就正是這一地區的特徵，論時代它也不算太老，最早也不過十五世紀，一般說來多爲十六—七世紀之物。

克爾克曼氏曾就此二十幾處殘餘的柱墓加以調查（註），就中於十五世紀初，中國明朝的海軍亦曾訪問過的瑪琳地柱墓，美麗雄偉，高約九公尺左右，威壓四周。

註：J. S. Kirkman: The Great Pillars of Malindi and Mambrui. Oriental Art New Series, Vol. IV, No. 2, Summer, 1958.

我在此暫不談何以要建造這種柱形墳墓的原因，這種柱墓，以及與它關係深切的墳墓，仍是用中國磁碗磁盤所裝飾。而此處所有者，還多屬十五世紀以後的陶磁。因此關係，用於這方面的青磁與青

白磁之外，尙多使用在白地上用天藍色繪畫花紋的白磁青花碗。

在白磁青花的花紋之中，有花樹、水菓、禽鳥麒麟和魚，從藤蔓到各種寶物，應有盡有，變動繁多。故鑲嵌此種磁器做爲裝飾的柱子，變化很多，足以令人賞心悅目。在這一點上，位處瑪琳地之北約十一公里地方的曼布魯依柱墓，其用陶碗所造成的裝飾，見者無不讚爲美觀。

本來文靜而樸實的中國陶磁，竟被使用於這種具有極不成熟前衞感的壁面裝飾，由陶磁的本身來說，也許是哭笑不得的場面。

不過，依照可蘭經的律法，在一切都禁止使用人類形像做爲建築裝飾的回教社會，却可使用各種不同顏色，具有華麗花樣的瓷磚，交相配合，以做爲壁面裝飾，而期補救。自中世以來，無論在伊朗、美索不達米亞，或在敍利亞，花式瓷磚的華麗，都有令人醒目的感覺。是以這種情況，也就成了間接促進中世依斯蘭陶器發達的原因之一。

像這種裝飾壁面的想法，雖在非洲東部伊斯蘭社會亦被採用，但因該地窯業極端落後，故無法獲致裝飾用的精巧磁磚。由於這種情形，和受了許久以來卽居於東非地區土著人民的不成熟然而實存的美術意識影響，方產生了將中國陶磁使用於壁面裝飾的觀念，此種解釋未識是否得當。

用中國陶磁盆碗於裝飾方面者，並不僅止於非洲東部如此。在遠處東方的泰國，在其十五世紀左右的阿由達亞時代的城門上，也曾鑲嵌陶磁以爲裝飾，此點曾由泰國希爾帕昆大學(Silpakorn Unv.)的狄斯庫教授(M. C. Subhadradis Diskul) 所指明，據說此卽伊斯蘭文化在泰國所發生的影響（第五次伊朗美術、考古學國際會議），在更位處東方的北婆羅洲薩拉瓦克達雅克人之間，也有這種習慣，說起來亦頗足驚異。

薩拉瓦克的古晉，是一個意想不到的清潔而安靜的城市，在該地國立博物館前庭，立有高約十公尺的巨木柱子。據稱卽係達雅克人部落百餘年前的墓標，經遷移來此的，在木柱的外側，滿佈着類似疙瘩狀子的東西。於感覺奇怪之餘，走近觀看，乃知係直徑十公分的中國磁碗，都成列地碗底朝外嵌入材木之中，那是墓標的裝飾。薩拉瓦克有不少回教徒。因此，這種裝飾方法也許是未開化社會的未成熟感覺，與依斯蘭教徒的裝飾技法，合而爲一所產生者。

輸往東非的中國陶磁



嵌入中國磁器的柱墓
（薩拉瓦克、古晉博物館）

現在書歸正傳。

在東非沿海地方，發現有中國陶磁器的中世城市，其他地方亦所在多有。至於發現的數量，既決不在少，種類也相當繁富。如將時代與種類配合言之，首先是九－十世紀（唐末－五代－宋初）的浙江越州窯磁，自十一世紀到十五－六世紀（宋、元、明代前半）浙江龍泉窯青磁，及其他福建廣東省方面的青磁，自十二世紀起到十五六世紀，江西景德鎮的青白磁，以及以福建德化窯爲首的閩、粵兩省地方窯的白磁，還有十四－五世紀（元、明初）的釉裏紅，以及由十四世紀到十六、七世紀，華南各窰的白磁青花和五彩等等，可說是五光十色，紛然雜陳。

此外，最引人入勝者，是在白磁青花的盤、碗或壺上所畫的花紋，非常獨特，無論在中國、日本、或歐美的收藏裏面，頗多向所未見的貨色。但它却與白波斯等中東遺跡所出土的中國陶磁，有其共同之一面。因此這種特別圖樣的白磁青花，原是爲供應中東市場而製造的推測，便得以成立了。

關於此點我或將在下文有所交代，但無論如何，前此向未介紹過的具有花紋的白磁青花之能由東非廢墟發現，足徵中國陶磁根底的深厚，和其幅度的寬廣，引人入勝。

散處於埃及與東非沿岸遺跡的多量中國陶磁，將做爲一個新角色而被人所喜愛，也將因其將成爲研究的新寶庫，而哄動世人。

但依時代分別，將在東非諸遺跡所搜尋到的多數中國陶磁加以整理，所得結果如何？對此，馬修氏的報告是這樣的：

發現於東非沿岸諸多遺跡的中國陶磁，包括由十三世紀起到十九世紀止的各種東西，但自十五世紀的後期起，陶磁器的輸出情形，總覺得有些變化。

在十五世紀的後期以前，卽在十五世紀的前半，乃以青磁爲主流，白磁靑花居少，可是自此以後（後半），關係便見逆轉，以白磁靑花爲主，靑磁爲從了。而前半期良品居多，粗品居少，迨至後半，又以廉價品爲輸出中心了。而且前半的良品，主要均發現於索馬利亞北部，反之，以普通品或粗劣品居多的後半陶磁，一般均認爲發現於索馬利亞南部，亦卽基斯瑪由遺跡的以南地方。

此卽馬修氏的意見（註），其觀察頗饒興趣，因爲這樣依時代與地區劃分的輸入中國陶磁，其種類與品質的差異，足以給我們演繹出種種推測有趣歷史的餘地。

註：G. Mathew: Ibid, pp. 53-54.

從東非方面的立場來說，在十五世紀以前，其所以良品能够多在北方的索馬利亞和阿比西尼亞方面出現，當然可視爲當時之北部比較發達，也擁有比較富足的需要者，另方面，從輸出者的中國方面講，據推測直到該一時期，粗製濫造的貨品，是不向市場推出的，同時，輸出商品的品質，也比較整齊。

其次，以十五世紀之後期爲一界限，白磁靑花的普通品和粗劣製品，其所以能在肯亞以南的城市多有發現，特殊的優良貨品雖不易見，但這也足以說明，尙有可以大量購買普過品的社會，存在於其間。

現在再看看中國方面的情形，十五世紀的後期以後，在浙、閩、粵三省，繼續出現了製造普通白磁靑花的地方窰。它們的出現，或者卽由於這些窰的製品，能够供應大量輸出。不然，也許因爲貿易業者，以低價購入粗劣製品，運至遙遠的非洲，以高價出售，以博巨利。

這種現象，大概準是與中非雙方的情勢有關，周旋於二者之間的貿易業者，便採取了相當的措施。故由此種時代與因地區的變化，也從而可以了解貿易狀況和貿易業者的性格及其變化了。

因之，如能逐區追踪研究中國陶磁的出處情況，則僅靠文獻之所不能瞭解的經濟與社會情事，貿易業者與生產者的心意，以及購買者氣質等等，都可以陸續地引伸出來，無限的興趣湧上心頭。

對非洲的航海

那麼，何以有如許多的中國陶磁運往非洲呢？現在讓我們研究一下這項問題。

東非的沿海地帶，很受非洲這一名詞的幻惑，

究竟在那裏所居住之人，是否全屬非洲土著？事實上決非如此。這一地方大量生產古代人所喜愛的黃金、寶石、象牙和香料之屬，自古欲從事這種貿易，以獲致鉅大利益的波斯人和猶太人，都遷移到沿海要地和良港，從事商業。

尤其當進入伊斯蘭時代之後，撒拉森商人的貿易活動一經開始，東非沿岸的港口，都進入了他們的勢力範圍，舟船的出入逐漸增多。

十三世紀蒙古的征服西亞，使進出這一地區的阿拉伯人，更為眾多。因蒙古的西征而被逐出於波斯與美索不達米亞各城市的伊斯蘭人，都為尋求新天地，而來到了東非沿岸，於是這種阿拉伯商人，便在此地蒐購金、銅、奴隸、象牙、毛皮、海龜以及犀角等物，運往外國，大獲利市。在十三世紀前半，此地的伊斯蘭教徒業經蓄積了如何堅強的勢力，祇要一看索馬利亞在摩加底沙地方所遺留、於一二三八年建造的宏大清真寺尖塔，便可窺見一斑了。

從十世紀起到十三—四世紀，運到此一地區的中國陶磁，在這樣歷史背景之下，更經過多次的中間手續，乃遠涉重洋，運達非洲。

鄭和的遠征

十五世紀初，由中國陶磁與東非發生聯繫的重大事件隨着發生了。那就是以「鄭和下西洋」之名為世人所知的，中國大海軍在印度洋上的活動。

這支中國海軍艦隊，第一次活躍於印度洋方面，時在明朝第三代皇帝成祖永樂三年（一四〇五），於其後的二十八年間，前後出動七次之多，（亦有認為前後共有八次之學者，如蘇宗仁氏）司令官為雲南人鄭和，他出身太監，據推想亦為一伊斯蘭教徒。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曾到過麥加朝聖，故均有「阿吉」的稱呼，因此，他的西征或亦由於伊斯蘭中心地對他有所吸引而使然？

這樣龐大的中國海軍，在印度洋上大肆活動之事，誠屬空前，而直至眼前為止，亦堪稱為絕後。

此一事件頗引起中外東方學者的興趣，自十九世紀末：菲利普(G. Phillips)、洛克希爾(W.W. Rockhill)、伯希和(P. Pelliot)、戴溫達(J. J. L. Duyvendak)、向達、及山本達郎諸氏，曾經種種調查而有所發表，然因一般尚不了然，茲據一九三一年在福建省長樂縣南山寺天妃宮所發現的「天妃之神靈應記」碑文等，予以概略說明。因其與下文所述中國商品之流通一事大有關係。

鄭和第一次出使，時在永樂三年秋至五年九月

（一四〇五—一四〇七）之二年間，寶船以六十二艘大艦爲主力，所率其他大小船隻甚多，途經爪哇、蘇門答臘、錫蘭、經印度西海岸的科欽，而抵達當時對中東貿易的大中心地卡利科特。第一次出使行動的半徑很大。

第二次出使始於永樂五年十一月，完成於七年七月（一四〇七—〇九），此次所採的航程與第一次相同，仍以卡利科特爲目標，這就表示這條航線在連結東亞與南亞實爲一重要海路。

第三次出使時在永樂七年九月至九年六月（一四〇九—一一）約二年，此次的活動範圍以東印度洋爲中心，寶船自爪哇、蘇門答臘起，指向錫蘭，在當地與錫蘭軍交戰，擒錫蘭王亞烈苦奈兒（Ala-gakkonāra）。於北上印度東海岸，達孟加拉灣。後來並在扼麻六甲海峽的麻六甲地方，建一麻六甲城塞根據地而還。

自第一次至第三次之間，行動連續，幾乎未及喘息，其後有時稍停，二年之後，第四次出征於永樂十一年十月啓程，至十三年七月（一四一三—一五），寶船再出現於印度洋上。此次仍由印度東海岸進入波斯灣，達忽魯謨斯（Ormuz）。這是大艦隊所作的大行動。有人謂此次遠征，一軍曾訪問東非沿岸海岸惟無明白佐證。

更越二年乃有第五次出使（自永樂十五年秋至十七年七月。一四一七—一九）。此次本隊仍與前次同採自東南亞經印度諸港之航線，而進入波斯灣，別動隊則通過阿拉伯南岸，進而訪問東非沿岸，曾到摩加底沙（木骨都束）、不刺哇而抵瑪琳地。這眞是可資紀念的大航海。葡萄牙人達伽馬經伊斯蘭領航人的導引，橫貫阿拉伯海，其抵達卡利科特爲一四九八年之事，故鄭和寶船之自阿拉伯南岸，而巡航非洲，實早於達伽馬八十年。

中國與東非首次直接聯繫

第六次出使是在越二年後的永樂十九年春解纜，而於次年八月歸國（一四二一—二二），此次也是本隊在波斯灣，而別隊則巡航非洲東海岸各港。中國與東非的距離，有愈益縮短之觀了。

這項大規模的航海事業，於永樂二十三年（一四二五）隨永樂帝的駕崩而接近尾聲。

自宣宗宣德六年正月起，至八年七月（一四三一—三三）的第七次印度洋、波斯灣巡航，爲最後一次，也是此項航海的大結束。此時鄭和之所以派其部下參加麥加的朝聖，我們必須注意這項遠征與其心情所顯示的交織與糾纏。

鄭和所率領的海軍，其規模是如何地龐大，祇要看其第二次遠征所擁有的大艦隊，乃由二百四十

九隻戰艦所組成；而於第一次遠征時，艦隊之中包括着長達四十四丈，寬十八丈的巨艦六十二艘一事，便不難想像了。全艦搭載人員約二萬七千餘人（第一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七次）爲一非常強大的海軍（註）。當其停泊於海面時，任何敵人都將爲之膽寒。

註：包遵彭「鄭和下西洋之寶船考」臺北、一九六一年。

那麼，明朝第三代的永樂皇帝，何以在十五世紀之初；做出了這樣超羣的壯舉？表面上的理由是他要查明追丟了的第二代皇帝惠帝（建文帝）逃入緬甸、南海方面的傳聞是否眞僞，以期確證其行止，但實際上發揚國威於南方各國，似乎纔是他的眞正目的。

此時在西亞方面有成吉思汗的孫子鐵木兒所建立的大帝國，而且他又是夢想再建一個蒙古大帝國，用以攻擊明朝，故鄭和最初的遠征計劃，恐怕是秘藏着從背後予以牽制的構想亦未可知。

同時，中國與諸外國通商的擴大，獲得珍貴物資，更進而掌握印度洋之貿易，顯然亦爲其最大目的之一。此點祇要一看艦隊的寄港地點和目的地，全爲當時最重要的貿易港，便思過半了。鄭和的寶船其所以攜帶大量金塊和銅錢，這也就是它的證據之一。

因此，從這件事也可推測出東非的摩加底沙和瑪琳地，都是貿易要衝。是以自十四世紀後半起，至十五世紀初期的優良中國陶磁，能從此地發現，勿寧是當然之事。

所幸隨鄭和出征的馬歡著有「瀛涯勝覽」，鞏珍著有名爲「西洋番國誌」的見聞錄，而費信亦遺有名爲「星槎勝覽」的旅行記。在星槎勝覽之中，記載着摩加底沙和不刺哇的情景。其中都說在這些地方，運用磁器。這就表示說遠征軍本身已經知道磁器是重要商品了。總之，由於鄭和海軍的遠征東非，毫無疑義，中國陶磁已在這一地方一般化了。

由中國人所開拓的貿易路線，便在這種情形下，普及到了東非，但因明朝國內情勢的變化，中國人對這一地區以政府力量爲背景的侵入，其後遽然衰退。但以此爲契機，中國人向東南亞的移住，與年俱增，他們仗着本身的力量，與印度、阿拉伯商人的努力，使中國商品的輸出，愈益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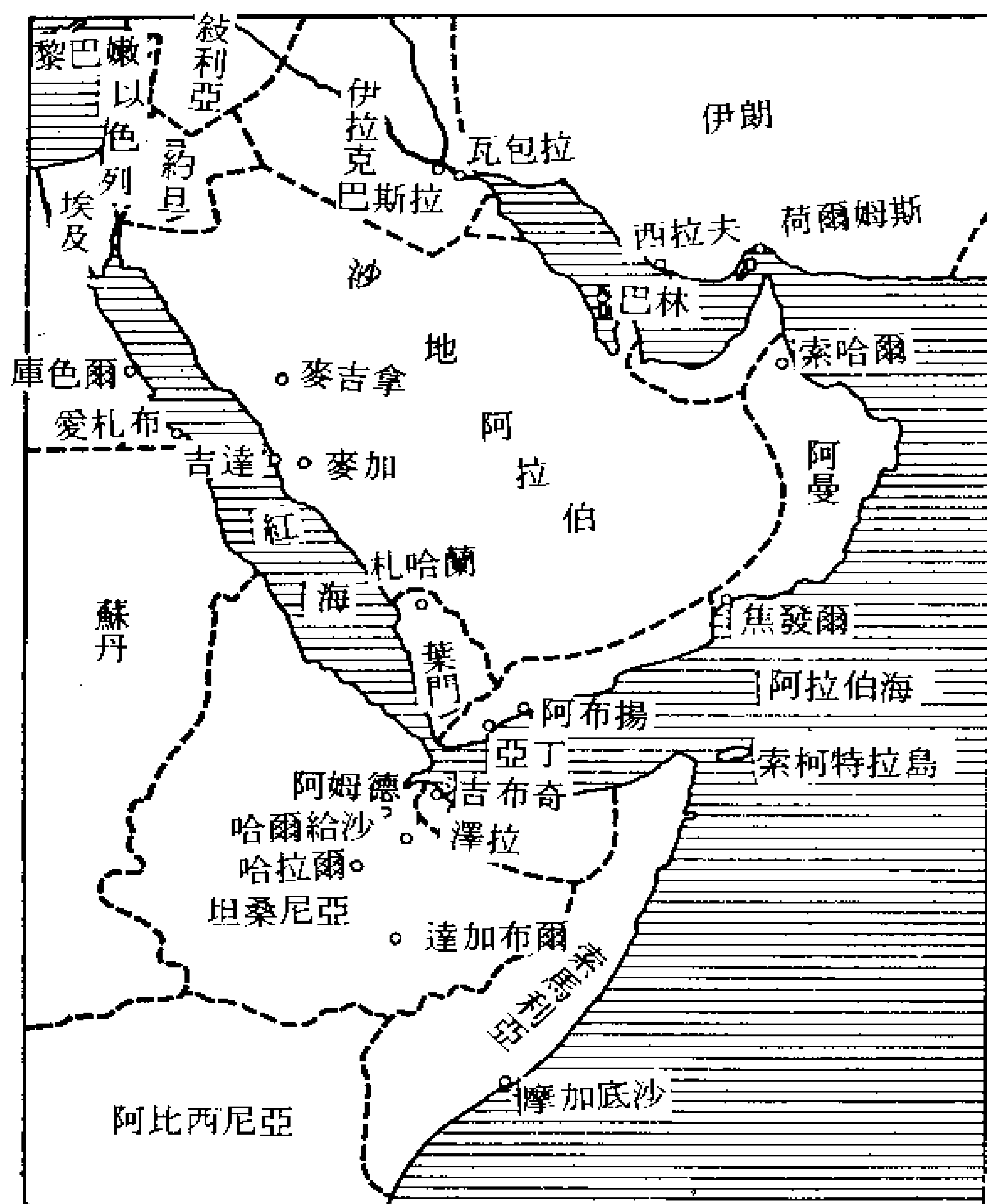
中國陶磁器銷售於東非的數量，自十五世紀以來之所以更加增多，我認爲其中有這樣的原因。

目前在東非沿岸，自坦干尼喀而南，尚未發現中世紀的中國陶磁。可是沿岸地方的調查工作如一經進行，則自其以南、或自更多地方，一定會發現中世紀的中國陶磁。馬達加斯加的情形也是一樣。

更引人神往的是在索馬利蘭的非洲東端，瓜爾達非岬海面上的索科德拉諸島（Socotra I.）。現在

頗有被人遺忘之觀的索科德拉島，從前叫做第斯科利達島，(Discorida I.)，自羅馬以來，即爲印度商人、希臘商人、和阿拉伯商人等之間的大規模轉口貿易地，據桑田六郎氏的研究，該處有多數商人聚集，實行交換由地中海地區、由非洲或印度擁進的物貨（註）。在中世紀，中國陶磁在市場上爲一重要商品，更無待詞費。假如能到該地訪查，我想那裏必定有寶山在等待我們的來臨。

註：桑田六郎「上代東西海上交通史話」『懷德』第二十三號、一九五二年。


黎巴嫩
敘利亞
以色列
約旦
埃及
伊拉克
伊朗
瓦包拉
巴斯拉
沙
地
阿
拉
伯
西拉夫
荷爾姆斯
巴林
索哈爾
庫色爾
麥吉拿
愛札布
吉達
麥加
阿曼
紅
海
札哈蘭
焦發爾
蘇丹
葉門
阿拉伯海
阿布揚
亞丁
索柯特拉島
阿姆德
吉布奇
哈爾給沙
澤拉
哈拉爾
坦桑尼亞
達加布爾
索馬利亞
摩加底沙
阿比西尼亞

四、伊斯坦堡砲門宮博物館

——中國陶磁的世界收藏



中國陶磁出土了

阿拉伯半島與東非最爲接近。若能從東非發現中國陶磁，則從阿拉伯絕對不會有不發現之事。實際上，阿拉伯南岸和東非各港口，幾乎處於彼此可以互相握手的近度，西岸則隔着狹窄的紅海——雖然如此，但其寬度仍是看不到對岸的——和埃及、蘇丹、厄立特里亞相望。東岸距印度不遠，北岸與波斯灣彼方伊朗的土地相對，乃東西貿易上的重要地方。

這地方也有中國陶磁。從南岸、東岸、和北岸皆有所發現。因爲在阿拉伯半島，尚未能充分調查，所以還不能說剩有許多地方，但據馬修氏的報告，在南岸的亞丁(Aden)及其附近的考德阿姆色拉(Kaud am Saila)、阿爾哈畢爾(Al Habil)，以及距亞丁東北五十六公里的阿布揚港(Abyan)等地廢墟，均曾有所發現(註)。自亞丁進入也門後，筆者曾親見美國首都博物館人員，在接近也門及沙烏地阿拉伯國境的札哈蘭(Zahlan)，發現了龍泉窯青磁和元朝白磁青花的破片。又自半島東南角的阿曼國索哈爾(Sohar)地方，和東北岸生產石油的巴倫島，均有發現，後者，鈴木八司氏曾有所報告。關於索哈爾的情形，鞏珍在其所著「西洋蕃國志」中，亦有磁器交易的記事。

註：G. Mathew: Chinese Porcelain in East Africa and on the Coast of South Arabia Oriental Art New Series, Vol. II, No. 2, 1956.

現在先從南岸說起。

第一個是亞丁的市街，該處直到最近，凡採取歐洲航路的船隻，於其抵達蘇彝士運河之前，做爲一個小休的港口，是很有名的。可是離此不遠一個叫做阿布揚的地方，恐怕無人知曉。這個城市現已毀滅爲廢墟，但祇要看看它那有三公里四方的城市遺跡，可知它曾經是一個很爲繁榮的城市。事實上，自十二世紀到十五世紀，因經商的往來而繁榮起來，聚集的商品，越過亞丁灣而運往索馬利亞的沙丁島(Saaddin)，此島亦卽中世的澤拉島，然後纔由此賣給阿比西尼亞的高原城市。然至十五世紀末，繁華消逝，竟被商業對手亞丁所滅亡。故失落於此一遺跡之中國陶磁，大體上均屬十二——十五世紀

的物品。

這對我們雖較陌生，但中世阿拉伯的諸多城市，却帶給這一城市許多次劇烈的政治經濟戰爭，城市的興亡也時有發生。

除阿布揚不計外，從阿拉伯其他南部遺跡所發現的中國陶磁，多爲十三—十五世紀的青磁及十五—十七世紀的白磁青花。

它們都是在各城市所使用，或爲人所買賣的商品，就中似以堆積於亞丁之地的數量居多，十四世紀的名旅行家伊本·巴士塔(Ibn Batuta 1304-77)，曾在其旅行記之中，談到中國陶磁之事說：「亞丁爲了統制價格，而對輸入加以限制」（註）。由此可證中世亞丁做爲貿易港的重要性，同時亦可推測出十四世紀當時，中國陶磁輸入量的鉅大爲如何了。此外，於十五世紀初，隨鄭和遠征西洋的費信，亦曾在其所著的「星槎勝覽」之中，記載着青白花磁器在此爲與金、銀、色緞、檀香、胡椒等相交易的商品。

註：岡村誠太郎『回教海事史』一〇四頁。

阿拉伯半島的地理條件

大體上，每當提起阿拉伯半島，人們在腦海中總要浮起那無非是類似大海一樣的、荒漠無垠的熱砂之城的印象。事實上，半島的大部分也確是如此，由天空所看到的地面，完全如毫無一點綠意的，帶有赤褐色沙漠和岩山起伏的連續。其情其景已超越了荒涼和雄大的表現，甚至竟洋溢着莊嚴之感了。

在沙漠中的生活者是剽悍的阿拉伯人，或被稱爲貝多因人(Bedouin)的漂泊的閃族系遊牧人民。因此，阿拉伯半島在世界文化史上，無寧予人以落後的印象。唯有所謂伊斯蘭教之發祥地的說法，或能使此半島發生某種光彩，可是就連這一點，也隨着伊斯蘭教國家的發展，而把中心移往敍利亞、美索不達米亞、波斯和埃及去了。許多人對阿拉伯的觀感，大致如此。

可是從歷史的現實來觀察，這種概念，雖也有其眞實的一面，但亦有很多不盡然之處。那就是說，如以巨視的眼光來觀察此地，則在印度大陸和非洲、地中海地域之間，它的位置是一個儼然存在的巨大半島小大陸，如更加仔細思惟，則它又成爲存在於東地中海岸的敍利亞、埃及和波斯灣方面的美

索不達米亞（伊拉克）、伊朗中間的空間。

故自印度駛向紅海方面的船隻，自古以來必朝阿拉伯半島東南角掛帆，抵達東南角之後，則沿南岸而進抵亞丁，由此而駛入紅海。再操舵南行繞過所謂「非洲之角」（The Horn of Africa）的瓜爾達非岬（Cape Gardafui），遂卽駛向東非海港。反之，凡出紅海岸羅馬時代的庫色爾（Quseir）、米歐斯・荷爾摩斯（Myos Hormos）、以及發自貝列尼克（Berenike）的船隻，在其停泊於亞丁之後，再由此駛向東方的印度，這種情形，在名著羅馬時代的「厄留特拉海嚮導記」、和普里紐斯（Plinius）的「自然誌」裏，說的很清楚。

又據家島彥一氏的研究，雖在伊斯蘭時代，多數駛往波斯灣的船隻，於其一度抵達阿拉伯半島南岸的亞丁、或焦哈爾（Djohār），再由此轉向東北，而繞經阿拉伯海方面的東岸。於是經馬斯喀特阿曼（Masqat Oman）地帶之後，再乘潮進入波斯灣（註）。

註：家島彥一著「南阿拉伯的東方貿易港」「東方學會報」三十一輯，一九六五年。

陸上貿易路的中心點麥加

是以位於阿拉伯半島南岸的各港口，便成了貿易商品的倉庫堆棧，也就是重要的中繼貿易地了。像目前的航空路發達以前，在暑熱之下煎熬的西南岸亞丁港，被許多人親近，做爲歐洲航路的停泊港口，乃自古以來的慣例。

因爲在南岸有連絡東西兩世界的重要貿易基地，故此地與中東文化中心地的美索不達米亞、敍利亞乃至埃及互相連繫的路上貿易道路，也就自然發生。其中主要的貿易路線，是半島靠西邊，沿紅海海岸的道路，裝載許多貴重商品的隊商，從綠洲到綠洲之間，牽引着駱駝通過這些街道。於是以敍利亞爲目的地者，由此北上，而走向東地中海岸的巴勒斯坦，販運商品前往埃及之人，途中在西奈半島轉而西行，抵達尼羅河畔。

前往美索不達米亞的隊商，也暫由這條道路通行，在麥加折向東北，橫貫半島上的大沙漠，而出現於波斯灣頭，波斯灣頭的巴斯拉（Basra）因爲地處要衝，故在六三五年，一經阿拉伯軍佔領，立卽

建設爲一新的城市。

這條路線還不僅做爲阿拉伯半島南岸與地中海岸、波斯灣岸聯繫之用。由東地中海岸出幼發拉底河上游，前往美索不達尼亞的北方道路，倘因某種政治原因而感通過困難，則經由麥加的南方道路，便興盛起來，隊商們通過巴斯拉而步行前往巴格達。

由岩山所圍繞的麥加綠洲，便是一個具有如此重要意味的交通道路交叉點。麥加繁榮的經濟基礎，卽在於此，更加有伊斯蘭教聖地的卡巴神殿之存在，其繁榮乃愈益擴大。

積存於麥加的商品，再運至麥加的外港吉達，由那裏橫斷紅海，再向愛札布和其他埃及港口裝運出口。愛札布是中國陶磁輸往埃及的主要卸貨地點，前文業經述及。

由此觀之，阿拉伯半島在法老時代的埃及當時，已在南阿地方，有了謝芭女王的富饒之國，根據古老的傳說，此地因向埃及運銷黃金與香料，而臻於繁榮，不僅如此，它還在古典的古代和中世紀，於東西方貿易上也擔當了重大任務。而此種都市曾儲存了大量財富之說，從南阿拉伯沙漠之中，仍舊存有古代、中世出人意表的漂亮遺跡一事，亦可推定出來（註）

註：R.L. Bowen Jr. and F.P. Albrigh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South Arabia, Baltimore, 1958.

故自阿拉伯南岸的中世遺跡，發現出中國陶磁，乃屬當然之事，而此等陶磁據推想當均屬商人或富貴人家的裝飾，或爲積存中的商品。阿拉伯半島上考古學的調查，因地理條件與政治條件有其困難之處，故尚未能做充分考察。雖然如此，但將來如能對阿拉伯西部之中心地的麥加與麥地那加以調查，從陶磁貿易之點，也一定會獲致富有興趣的結果。

陶磁貿易的記錄

上述十四世紀的伊本‧巴士塔，在其旅行記中曾記載說：「中國磁器流傳到印度與敍利亞方面，此種陶磁在吉達（麥加的外港）已屬司空見慣」，又同在十四世紀前半，元人汪大淵在其所著『島夷志略』地理書中，也指出「靑白花器」爲天方亦卽

麥加所買賣的中國貿易品之一。與此相同者是十五世紀初葉隨鄭和遠下西洋從軍的費信，他在其所著旅行記『星槎勝覽』裏，也明白地指出「青花白磁器」的名稱。十四世紀之初，中國磁器確已為麥加地方之人士所知，並加喜愛。由此可以窺知當時被人所珍重的磁器，當包括青磁、白磁，和白磁青花在內。

另外還有一件有興趣的紀錄。與費信同時追隨鄭和的馬歡，著有「瀛涯勝覽」一書，這是一本從軍記，書中說，當明朝海軍抵達卡利剌特時，特請恰巧駛來卡埠的麥加船隻搭載前往麥加的七名使者，送到「麝香和磁器」。使者於一年之後歸來，買來了該地的奇貨。這是在了解當時麥加情狀極饒興趣的史料。不過當時所帶來者是何種中國磁器，這就唯有看考古學的調查結果了。

費信在星槎勝覽中，曾說阿拉伯的佐法兒(Zafar)和剌撒(Al Ahsa)，都曾把磁器當做商品買賣。佐法兒似即相當於現時半島南岸的焦哈爾(Djofar)。剌撒的位置雖不甚詳，但似乎也是南岸的一個地方。南岸的情勢大致如此，下面我們再看一下在東方的波斯灣沿岸情形。

波斯灣岸的巴倫島

從阿拉伯半島南岸要想進入波斯灣，便必須經過面對阿拉伯海的阿曼。在其東岸有一名為索哈(Sohar)的港口，從其舊市街的地下，也發現有中國的青磁和明朝的白磁青花，以及泰國青磁，發現這種遺物者是一位名為溫德菲利普的現在堪稱知名的探查家兼考古學者，他對一起發現的伊斯蘭陶器記述頗詳，但可惜對中國陶磁，則僅有簡單敍述(註)。現在既已知由東岸的阿曼都發現了中國陶磁，那麼下面便僅探究波斯灣方面好了。

註：Wendell Phillips: Unknown Oman, New York, 1966, p. 161.

在波斯灣岸以中國陶磁出土地為世所知者，是巴倫島。此島是位處略在波斯灣中央南岸的一個土侯國，為英國的保護領，現在却以石油產地而馳名。自天空俯瞰，它宛如神奇地漂浮在一碧萬頃的波斯灣海水之中。島呈茶褐色，從有油田的附近到海港之間，污染得一片烏黑，令人一見便知是出產石

油的島嶼。

從這一島上拾獲中國陶磁的地方，是位於首府卡拉特巴倫之南四百公尺處的清眞寺廢墟，及其附近海濱。鈴木八司氏曾在當地蒐集到青磁片二十八個，白磁青花破片五十八個（註一），據小山富士夫氏說，美國賓州大學所收藏的陶磁片之中，也有採集自巴倫島的東西（註二）。

註一：「波斯灣岸遺跡追尋記」『朝日雜誌』六卷三十一期、一九六四年八月二日號。

註二：「美國美術館蒐藏的東方古陶磁」『陶說』五七期、昭和三十二年。

石油和中世紀的中國陶磁，兩者的緣分雖不太好，可是却在意想不到之處找到了中國陶磁，由這裏發現的青磁多爲自十四世紀後半起，到十五世紀初的明初龍泉窯青磁，就中尚包括着可能是將餅乾狀的菊花貼上去的特殊元代青磁鉢破片（請參照「伊斯坦堡砲門宮博物館」），白磁青花的花紋，以蔓藤花紋和荷花爲主，似以明代中期以後的作品居多。

更據鈴木氏的記述，在對岸沙地阿拉伯的達哈蘭居住之美國人蒐藏品之中，包括有在接近海岸之卡提夫所發現的中國北宋貨幣咸平通寶（九九八—一〇〇三），及其他貨幣，其次，於一九四〇—四一年，當康涅爾教授調查時，也在卡提夫採集到北宋紹聖年間（（一〇九四—九七）和南宋紹定年間（一二二八—三三年）的銅錢—應係紹聖元寶及紹定元寶。

從一個荒涼而又無背後地的巴倫島，以及從其對岸的卡提夫地區，能够發現中國的宋錢和元、明兩代的陶磁器一事，已在默默無言之中，說明了此地從十二—三世紀到十五—六世紀，實爲波斯灣南岸的重要中繼貿易基地，同時也是當時相當富豪人家的居住地區。

若把時間從伊斯蘭時代上溯，從紀元前三千年紀中期起至紀元前二千年紀中期，即爲繁榮的印度文明時代，就在這巴倫島上，也曾發現過印度河流域之人所使用過具有特色的印章。發現的時期是在一九五二年，發現者是丹麥調查隊。印章頂大不過三公分四方大小，上面彫刻着圖騰獸和印度文字，由此可知，印度文明人—實在應該說是哈拉帕人—

大約是於紀元前三千年紀的後半，或二千年紀的前半，曾居留此地。當時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人，經海陸雙方將木棉與寶石之類，盛行販運到美索不達米亞，謀求貿易利益，從如此古老時代開始，巴倫島及其近傍地點，卽已成爲海路的重要停泊港口，已是一個貿易基地。

縱使在波斯灣貿易最爲繁盛的伊斯蘭時代，此處之曾爲一繁榮的貿易港，亦並非難以想像。

三、阿土兩國對中國陶磁的收藏

——阿拉伯半島是中國陶磁運銷非歐兩洲的橋頭堡

到伊斯坦堡去

伊斯坦堡是我所喜愛的城市。當長時期埃及的調查工作完成之後，一經走到這一市街的郊區，經常感覺着心境平靜，不由得呼吸爲之一暢。三四兩月，原野已有了綠意。草原上一片爽目的淺綠。大自然正像向人伸手表示歡迎。令人有要在草中打滾的衝動。

一經走近市街，當地的悠久歷史芳香，逐漸漂蕩過來。東羅馬時代的高水道路，擋住了去路。飽經古代和中世歷史風霜的厚城牆，令人發思古之幽情。市街之內人羣熙來壤往。熱鬧情形，動人心魄。這是一個和善近人面孔的集團。

佇立於歐洲部分的小丘之上，放眼俯瞰，紺碧的博斯普魯斯海峽，即在眼底，對面亞洲部分起伏極多的山丘，一望無際。強烈的潮流翻騰着白波。而這正和寬廣而明朗的馬摩拉海相連接。

博斯普魯斯海峽與馬摩拉海相連的一帶，有海灣深入到歐洲方面的山丘。那是金角灣（Golden Horn），山丘被海灣一分爲二。在海灣出口不遠處，有一座名叫噶拉塔的橋，將兩者連結起來，羣集於其附近的露店，有炒板栗和烤魚的店面，從有棚的攤位裏發散着食品的香氣，引人食慾。向亞洲方面過海的渡船，或駛往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馬摩拉海方向的船隻，都要從這橋旁出海。這裏其所以有如此多男女老幼來趁熱鬧，職此之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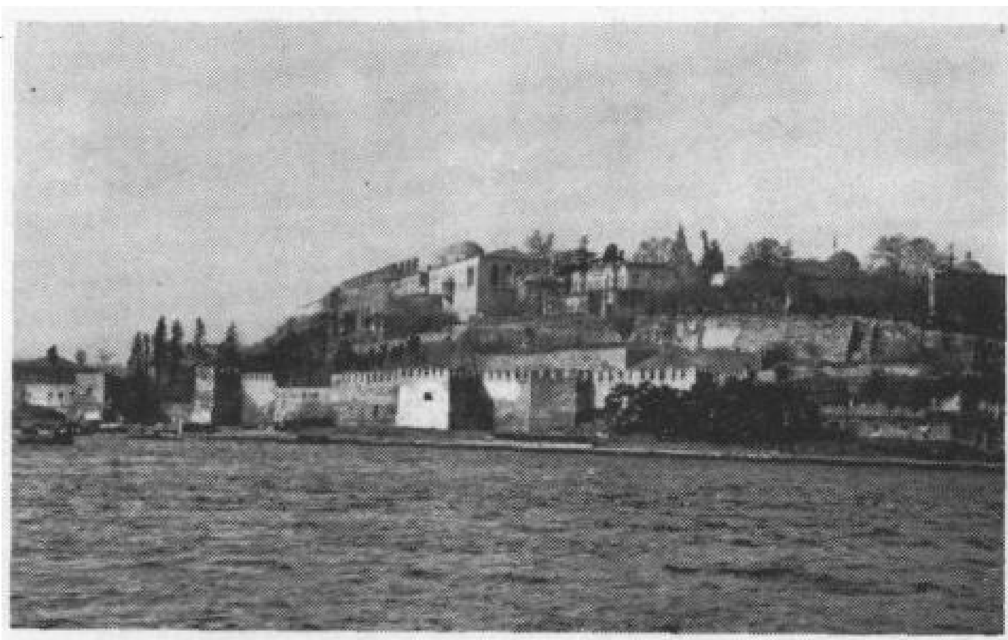
噶拉塔橋北的山丘，爲近世發展的新市街，南丘是自羅馬時代以來，頗有歷史淵源的土地。山丘的周圍現在仍有古代城牆，尚到處像柔腸寸斷般地存在着。而在山丘之上，還並列着羅馬時代戰車競技的馬場遺址、儲水場和有名的聖索菲亞寺院等建築。聖索菲亞寺院後經改造爲伊斯蘭教阿亞索菲亞淸眞寺，此外尚有藍色淸眞寺等，伊斯蘭建築很多，其中也可交雜地看到奧斯曼土耳其時代的巨大宮殿遺跡。此等故宮的一部分，現經改爲緬懷前王朝榮華的托普卡普沙拉伊博物館，它和鄰近的考古學博物館，同爲吸引遊子美夢到過去歷史的去處。

中國陶磁的寶庫

我們所追求的中世中國陶磁的一宗大收藏，擺

滿了這家托普卡普沙拉伊博物館的幾個陳列室。

世界各處博物館，陳列中國中世紀陶器之處雖然爲數極多，但像這一博物館這種隨便把名品亂放



自馬摩拉海遠望砲門宮

的博物館還少有。

一進陳列室，從十三世紀後期南宋末葉起，到元明兩代各種各樣色澤優美的青磁，便收入眼底。正在尋思之際，令人瞠目驚視的，無論色澤花樣均屬美麗好看的、十四世紀的元代以及明代初期的白磁青花大盤和大碗，又出現在面前。完整的元代白磁青花，全世界爲數極少，據說祇有二百個左右，可是就此一處就佔了其中的八十多個。

元明兩朝的白磁，也有不少，不過這好像是爲了適合此間人士的愛好，而特別輸入了沒有花紋的東西。實際上此處有將寶石嵌入白磁碗作爲裝飾，並以金銀做成精巧工藝的製品。看到這種東西，便可知當時的宮廷生活，該是如何充滿着東方絢爛華麗的工藝品了。

此外另有寫着「大明正德年造」（一五〇六—二一）銘文的黃彩、一五—六世紀的五彩，暨嘉靖年間（一五二二—六六）製造的豪華金欄手，以及非常衆多的十七世紀清朝初期的白磁青花和五彩。

總而言之，舉凡我們在埃及福斯塔特所看到的，元代以後的中國陶磁破片，和它幾乎同一種類的製品；一切在此均有完整姿態的展出。不過，像在

埃及與東非沿海地方所見到的，由十世紀到十二世紀的作品－例如越州窯磁和北宋青磁、青白磁等－則未見及，至於它所蒐藏的青磁，也以十三世紀末的龍泉窯青磁開始，這一點似也可以說明此一王室蒐藏的歷史了。


砲門宮博物館入口

我沒想到竟在此見到了江戶時代來自日本的伊萬里燒的華麗色繪大壺羣。日本陶磁在質量雙方，向爲中國陶磁所壓倒，故未稍加留意，玆經留意一觀，方知其製做頗爲精緻。壺多爲十八世紀沈香壺形式，據我看，還應有較早或較新的東西。此等古伊萬里磁壺想均係由荷蘭東印度公司船隻運至爪哇，然後才又輾轉運來伊斯坦堡者。無論如何，在此能與日本製品邂逅，也至爲高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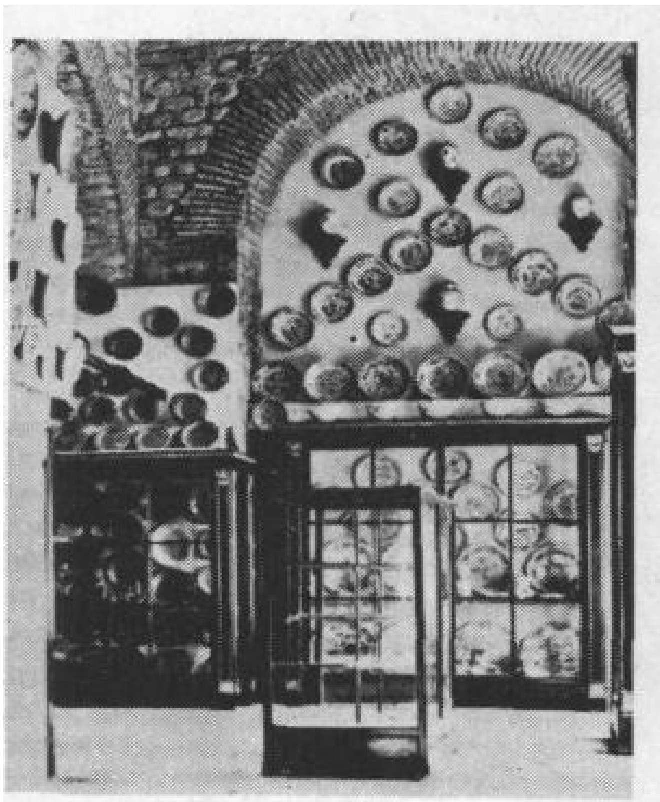
陳列室中目之所及，任何方向，都充滿着中國陶磁。玻璃櫥中，塡塞得幾乎令人看膩的程度，牆皮上也掛着陶磁，直達天棚。

簡直是陶磁——陶磁——陶磁的天下，想到此地常有地震發生，一念及此，髮膚爲之寒戰。

不知怎樣蒐藏得這樣多。大概究竟蒐藏有多少？參觀之際，這種疑問不由默默地湧上心頭。

砲門宮的由來

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大博物館，多爲昔日的宮殿。在質量兩方都堪稱第一流的博物館，應該算得上是倫敦大英博物館、巴黎的羅浮博物館、列寧格勒



砲門宮博物館的中國陶磁展覽室
（採自波浦氏著書）

的耶爾米它鳩（隱廬）美術館和紐約大都會美術館等四大館了，其中的兩個是由皇宮所改裝的博物館。

伊斯坦堡的托普卡普沙拉伊博物館，也是從前奧斯曼土耳其其時代的宮殿。惟因其由來稍覺複雜，茲據約翰波普氏的研究（註），略述其沿革。因事先的瞭解，極有助於訪問時感興的湧現。

註：J.A. Pope: Fourteenth-Century Blue-and-White, A Group of Chinese Porcelains in the Top Kapu Sarayi Müzesi, Istanbul, Washington, 1952.

在伊斯坦堡最初建立宮殿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皇帝，是默罕麥特第二(Mehemet Ⅱ, 1451-1481)。他於一四五三年佔領了久經攻略的伊斯坦堡，將具有悠久歷史的拜占庭帝國滅亡，遂即在忒奧特修(Theodosius)皇帝的公會堂舊址——即目前巴牙吉特廣場附近——營造了王宮。此即爲舊宮殿（Eski Sarai)。

他對這一地點似並不滿意。旋於一四六七年，又重在俯瞰馬摩拉海風光絕佳之地，建造了新王宮(Yeni Sarai)。

此宮的東門由砲兵把守，因塔裏裝有大砲，故此門不知於何時竟被稱爲托普．卡着．沙拉伊（大砲門）了。又約二百五十年後，阿合梅特第三（Ahmet Ⅲ)於一七〇九年，在托普卡普附近海濱，造起一座木造離宮，其後逐漸加蓋，到十八世紀中葉（一七四八），已成爲一座由美麗庭園所包圍的大宮殿。托普．卡普．沙拉伊（砲門宮）名稱的由來，實自此始。

這座在海濱所建造的砲門宮，其後又加改裝，而成爲夏宮——山丘上的新王宮，改爲專用的冬宮

——一八六三年八年十一日，因後宮起火而焚燬。砲門宮的名稱，又被山丘上的新宮（Yeni Sarai）所承襲。一九一八年，土耳其帝國被推翻，成立共和國，丘上的托普卡普沙拉伊（Top-kapu Sarai）（即新王宮），却承襲舊名成爲永遠的博物館了。

在宮殿中放置的大量傢具、珍寶之類，一齊移到此館陳列，其中窮奢極麗的寶石類的陳列，不知吸引了多少仕女的芳心與青睞。

中國陶磁的收藏

陶磁也是宮廷蒐藏的一部分。收藏在砲門宮博物館內陶磁器的種類，遍及世界各國，據說總數約有一萬件，其中的八千件則爲東亞陶磁。雖然說是東亞，幾乎全部均係中國陶磁，其他不過僅有若干泰國陶磁和日本陶磁而已。展出品形狀整齊完備，是中國陶磁的非常偉大蒐藏。

現根據波普氏調查的結果，說明中國陶磁的種類與時代關係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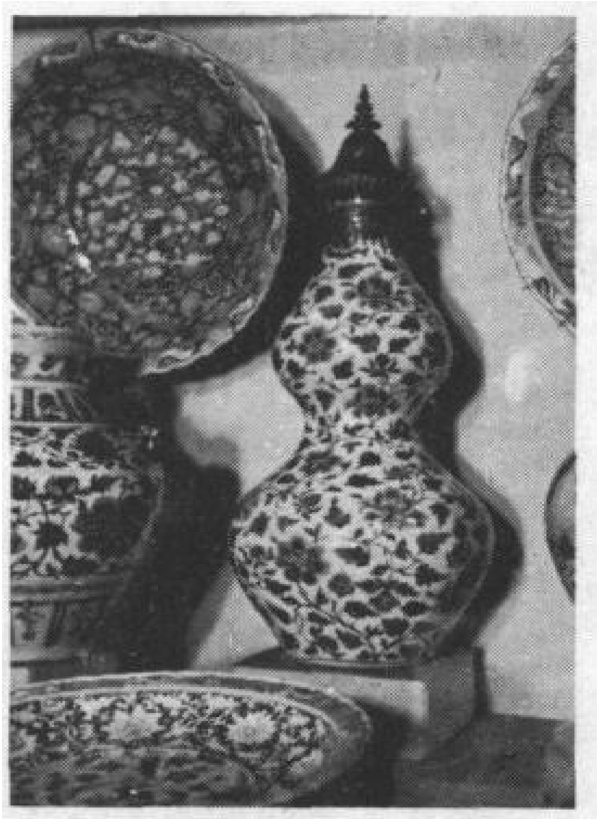
種類以青磁爲最多，約有一千三百餘件。十三世紀宋代的製品，絕無僅有，幾乎全部均爲十四世紀初以後，元明兩代的製品。但是盤子、鉢、碗的質量至爲良好，其中尚有花器形大壺。在日本叫做天龍寺手和七官手，看上去非常端正，而且發色也好，形狀堂堂，令人信賴。

青磁以外的元末和明代磁器，約有兩千六百件。其餘的四千多件，則爲淸代磁器。

自十四世紀到十七世紀初的元末和明代的磁器中心，是青磁和白磁青花，如上文所述，其中有八十餘件還包括着爲普世所珍重的元代白磁青花。元代的青花是在美麗的白磁大盤大碗之上，用生動的筆法描繪出牽牛、菊、牡丹等花，松、竹、芭蕉，瓜等的草木、山水、人物、池魚，以及麒麟、鳳凰、龍等動物，大方之中有嚴謹，實在富於魅力。現在，像這樣大的磁盤，雖屬一件，其價値之高已遠超想像之外，若將此項蒐藏中的全部元代白磁青花統合起來，即僅此一部分，亦屬驚人的財產。

從十四世紀後半到十五世紀前半，明初的青花

，優級品亦多。此外尚多有明代白磁、黃地紅彩磁、或五彩、金襴手等，種類繁多，不暇一一細數。現在暫擧奇特形狀的磁器，以結束明代陶磁。


砲門宮博物館的元代青花

那就是在從中國輸入的白磁、青磁、以及青花、五彩碗、盤、盃等之上，另由土耳其的精工巧匠，鑲嵌進很多黃金寶石，造成了很多華麗的花樣，因此容器已變成了輝煌燦爛的樣式。假如我們知道這些傑作都是十六世紀奧斯曼土耳其全盛時期，蘇力曼大帝時代前後的物品，那末自然也可了解其所以製做如此豪華宮廷用品的緣由了。在中國方面，這也正當明朝末葉，文化爛熟的嘉靖、萬曆時期。

於看到這種中土合作品後，不由想起其他國家所加於中國陶磁上的工夫。埃及也曾早於十一——十二世紀的法蒂瑪王朝時代，在由中國輸入的美麗德化窯白磁之上，用釉藥彩畫成伊斯蘭花樣，造成了獨特的合作陶磁，前文業經述及。在伊斯蘭地帶使用輸入素材，以求發抒表達獨自感覺之事，由此可見一般。

到十七、八世紀時，輸入中國和日本陶磁的歐洲各國人士，在碗、盃之上，添加白銀或黃銅的裝飾，以求合乎自己趣味之擧，雖屬其後很久之事，也屬同樣的想法。

我對明磁過分熱心了。清代陶磁之中雖也有康熙（一六六二——一七二三）、雍正（一七二三——三六）、乾隆（一七三六——九五）時代的優秀青花和五彩，但詳情祗有割愛了。惟用清代的中國白磁，於表面施以土耳其作風的華麗上繪，用為裝飾的合作陶磁，則頗引人注意。

有關砲門宮博物館蒐藏之事，還有一點非常引人興趣者，卽帝室的蒐藏究在如何情形下發生。這是在獎勵陶磁貿易實情上，任何人都希望了解之事，但是實際上却非常不易明瞭。

所幸關於這一宮殿的備品，有一份自新宮殿建設前後開始的詳細收納目錄，故尚能知曉其一端。這仍是以波普的研究爲軸心，聊述其大略情形如此而已。

中國陶磁之能見之於收納目錄者，似自一四九五年的第二號目錄始，但明白有中國陶磁收藏紀錄者，則自一五〇一年的第三號目錄始。果眞如此，則砲門宮博物館開始蒐集中國陶磁的時間，應爲十五世紀末到十六世紀初，這要和埃及和東非地帶，以及下述的美索不達米亞、伊朗相比較，則相當落後。這是事實。

不過，這祇能說宮廷開始蒐集的年次而已，這並不能說拜占廷時代的君士坦丁堡，和居住於小亞細亞的商人們，直到這時還沒有蒐集中國陶磁。

令人感覺遺憾的是，在土耳其還未曾從較此更早的時代遺跡之中，發現中國陶磁，但將來如進行調查，則定必更有種種可資助人瞭解的消息。

話又說回來。關於中國陶磁的記事，每當增加目錄冊數，便也隨之增加，據一五一四年目錄，土耳其軍於戰勝伊朗達布里斯的伊斯邁爾王的結果，據說又增添了六十二件中國陶磁。諒係戰利品。

另據於十六世紀初，曾前來中國訪問之阿拉伯商人賽德・阿里艾克巴(Sayyid Ali Ekbar)在其所著書『中國故事』(Khitai Nameh 1516)中說，明武宗正德皇帝（一五〇六——二一）曾贈送栖林第一(Selim I)皇帝（一五一二——二〇）帶有阿拉伯文字裝飾的兩件中國陶磁，縱然不太確實，但該項陶磁，似已收入這一宮殿。

又被稱爲大王的蘇力曼第一(Suleyman I, 1520-66)，據說在飯桌上所使用者亦係中國磁器，故其間收藏於宮廷之中的中國陶磁，其數目確實已有了增加，殆無疑義。

只是一五七四年發生火災時，焚燬了厨房，前此的收藏品亦被燒失，其後經急速補充，於一六八

一年收藏目錄之中，已登記了幾百件中國陶磁。但據說達到一萬件的時候，還是從一七六二年起到九二年之間的事。何以於短短三十年之間，蒐藏的數目便如此暴增，很遺憾地令人無法了解。

設如在十八世紀後半蒐藏的增加，多屬十四、五世紀之陶磁，則可確定其並非由於貿易和呈獻的自然增加。這時，許多奇珍異品自敍利亞和埃及，不斷地運抵君士坦丁堡，故許多古代奇珍，或爲數極多的中國珍貴陶磁，說不定均由儲藏地的開羅運進此間。

總之，土耳其之收集中國陶磁，是以宮廷爲中心的。其中有購買而得者，有餽贈而來者，有爲貢物，也有自他人強制取得者，來源至爲複雜、因此，這一蒐藏乃日臻龐大。宮廷既然如此，貴族、廷臣與富豪人家，所謂上行下傚，大概一齊都對中國陶磁，加以收羅了。進入伊斯坦堡海港的船舶，自然都是販運這種貨色的。

在砲門宮所收藏的全部陶磁，於阿不杜爾美邪德第一（Abdulmecit I, 1839–1861）時，列爲寶藏，移交博物館，如今能在吾人面前展示者，其經過蓋如此也。

我對此項具有異色的博物館，和爲世所珍視的中國陶磁的偉大收藏，已作了冗長的敍述。

在此我更順便把館中收藏品內在形式上最有興趣的青磁，一加介紹。

黏貼花紋的青磁

在砲門宮博物館陳列的自十三世紀末起至十四世紀前半的龍泉窯青磁之中，竟有帶變相裝飾花紋的磁鉢與陶碗。那就是在碗盤內部的中央，黏貼上一塊餅乾形狀的大朶菊形花樣，這是一種裝飾。這種鉢子的特徵，還不僅如此，在花紋的裏側，亦即在高邊所圍繞的底部中央，留有小孔。總之，這是在填密小孔的情形下，才把花樣貼在碗鉢的底部。一般青磁的磁質都非常良好。

此種形式的元代青磁破片，從埃及的福斯塔特遺跡中，也有相當發現。同時在形狀色澤都和這一樣的埃及複製品很多，都係在埃及所燒成，藉此可

知這是埃人所頗爲喜愛的樣式。總之，這種原始而完整的東西，伊斯坦堡很多。據跟我在一起的和久井路子女士的指點，竟達五十八件之多。因爲被它放置於高臺之上，所以僅能看到側面，但在此種陳列品中，必定也有同樣的東西，故僅就陳列品中挑選，數字定更增加。這確是一個大的數額。

如我在下文行將述及的，伊朗德黑蘭考古博物館的阿德畢蒐藏品(Ardebil Collection)中，也有幾件展出，波斯灣南岸的巴倫島、伊拉克的瓦濟德遺跡，以及敍利亞的哈瑪遺跡，也都有此種破片出土。

可是最令人費解的是，在土耳其、埃及與伊朗，雖都能遭遇到很多這種貼花形裝飾的青磁，然在出產青磁的老家中國、和主要輸出目的地的日本、菲律賓、爪哇等東亞國家，却完全不能發現。雖偶而有在鉢心黏貼花紋者，但並無小孔，質諸研究中國陶磁的中外專家學者，亦均謂在東亞未曾寓目。

我對此曾稍有所思。我的結論認爲這種貨色又是由中東各國，特別請龍泉窯定做的產物。

另外還有這種例子。譬如在日本和東南亞許多國家，遺留很多自十六世紀末起至十七世紀初所製，被稱爲吳須五彩的，多少有些華麗庸俗感的五彩磁器，乃純爲輸出而製造，故爲中國本土之所無。事實還不僅如此，因爲自中東遺跡也向未有所發現，故可暫行認定其爲特爲限於日本及東南亞輸出用而製造者。

現在把範圍再縮小一些。日本精通茶道之人非常珍重的青花之中，有種稱爲祥瑞手者。那是一種穩重的天青色，小巧的裝飾花紋，山水人物的繪畫，均屬精心描繪的十七世紀前半的青色，它們也是日本特別向江西景德鎮定做的東西，故不獨他國沒有，即中國亦不存在也。

自此例推測，即屬回溯至十三——四世紀時，認爲當時中國磁窯，曾承做外國的特別定貨，亦無可厚非。由這件事既可藉以了解中國窯場生產機構的一面，也足爲熟悉阿拉伯與中國雙方貿易業者工作與任務之一助。此外，藉此也足可以了解中東人



砲門宮博物館收藏的黏貼花紋青磁

士愛好的一端。

然則，中東人士何以要定做這種奇異形狀的東西？對於這一點的研究，亦不無若干興趣。

定貨人的愛好

陶磁之爲物，不論東西，實在有取代金屬容器和石製容器而開始發達的樣子。日本不知爲何却不甚愛好金屬容器，而由漆器取代了它的地位，雖然如此，但無論在東方的中國，或在西面的中東地區，初期的陶器，忠實地模仿金石容器形狀的努力，無不歷歷可考。中國戰國時代和漢代陶器，像把手等類的細部，都被細心地追跡參考了金屬容器的丰姿。尤其是中世伊斯蘭陶器（波斯陶器）之發達，在哈里發嚴禁奢侈金屬製品之餘，急遽地代之而興，故在形式等細部，亦多與金屬製品毫無二致。據稱在伊斯蘭陶器中最具特徵的是發光彩陶。一經在光亮之下展現，其在陶器表面所描繪的阿拉伯花樣，便閃閃散發出七彩的金屬光輝，它也以此爲世人所知，可是說到它們的形、色設計，蓋無一非追尋高貴金屬器之美夢的。

假如這種情景屬實，中國陶磁也同此爲由這方面所定做的物品，則貨主也一定要求土耳其、埃及和伊朗人士所愛好的樣式。這種東西恐卽爲模仿金屬品樣式的製品了。

我一方面在頭腦裏畫出這樣的影像，一方面瞭望這一地區的金屬製品，但見帶有圓形的碗鉢之中，在碗裏子的底部中央，有一部分像肚臍一樣突出的種類。何以做出這樣的碗和鉢來呢？對這問題據說是由於宗教上或特殊用途使然，另外似乎並無適

切的解釋。不過，土耳其自古老的希泰特（Hittite B.C. 2000-1200)時代和弗利加(Phrygia紀元前一千年紀前半）時代起，卽已使用，直迄於今。那是一種被人相當喜愛的樣式。

這在碗裏中央具有隆起的大花形，成爲問題的中國青磁鉢碗，和這個形狀正有其共同之點。這不是由於中東人士爲求製造鉢底中央突出形似金屬碗鉢，而特別在碗鉢底部貼上餅乾形花樣的表現？譲陶磁器像金屬器一樣，造成圓的突起，在技術上是困難的，在不得已情形下，乃使其做了餅乾狀的隆起，於是更在其上將向所慣用的花樣捺上。這祇爲一種特殊造形有趣的青磁，除這種想法，已別無解釋了。所以當這種形狀的磁器，一旦輸入中東，便贏得中東人士的愛好，埃及和其他地方，也開始大量仿製同型商品，到處發售了。

另外還有一種想法。那就是說，中國於十二、三世紀時，有一種在中心部分黏貼小花型的青磁鉢、碗之類。也許中東人士知有此種青磁，遂卽依自己之所好，而擴大訂製，亦屬可能。

如循此思路前進，又遭遇到有趣的問題。問題是什麼呢？那就是在碗底的中央何以竟有小孔是也。在想像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也是研究陶磁之一樂。

實際上這是一種不可思議的作法，如專從常識方面想，將令人發生膩煩之感。可是假如說貼有花樣青磁的原形，卽爲中央突出的金屬碗，則解決底部開有小孔的理由，也得了端緒。

翻過中央突出的金屬碗一看，卽見底部向上膨起，呈圓形凹進狀。青磁的小孔，是否針對這種感覺而做的？以陶磁爲例，底部之所以凹進，在技術上是困難的。鑽小孔似爲最大接近可能的辦法。

此外另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由於鑽小孔，可使底部的厚度平均化，同時可使來自底部的火的回轉勻整，並使在表面黏貼的餅乾狀裝飾之附着更爲良好，這點或不致有誤。

最後，還要就經濟上的緣由思考一番。本來這種青磁若做的非常精緻，那便不必黏貼餅乾形狀的菊花形捺陶板，而先將胎子做成圓形隆起，再在其上用竹刀彫成花形。雖然如此，其所以還要貼附花形陶板，從事敷衍，並在底部穿扎小孔，以使火的

回轉勻整者，其目的乃在於簡化製做方法，減少耗損，壓低成本。這是輸出品所具有的一個宿命。果眞如此，則中國的製陶業者和貿易業者。便是對中東人士特殊器形容器的定貨，運用心思，製成了成本較低，並能取悅顧主的作品。

無論如何，這種形式的青磁鉢、碗、其為投中東人士之所好，是無可置疑的。這樣一來不僅使許多同種的龍泉窯青磁遺留下來，而且因以知道色形花樣，以及黏貼花樣方法，甚至碗裏底的小孔，一切都完全相同的複製陶器，在同時代的埃及暨其他中東地方，也製造了很多。中國陶磁和中世的中東人士之間，不單單在經濟關係方面，心靈方面彼此也是互通的。

阿那托利亞的中國陶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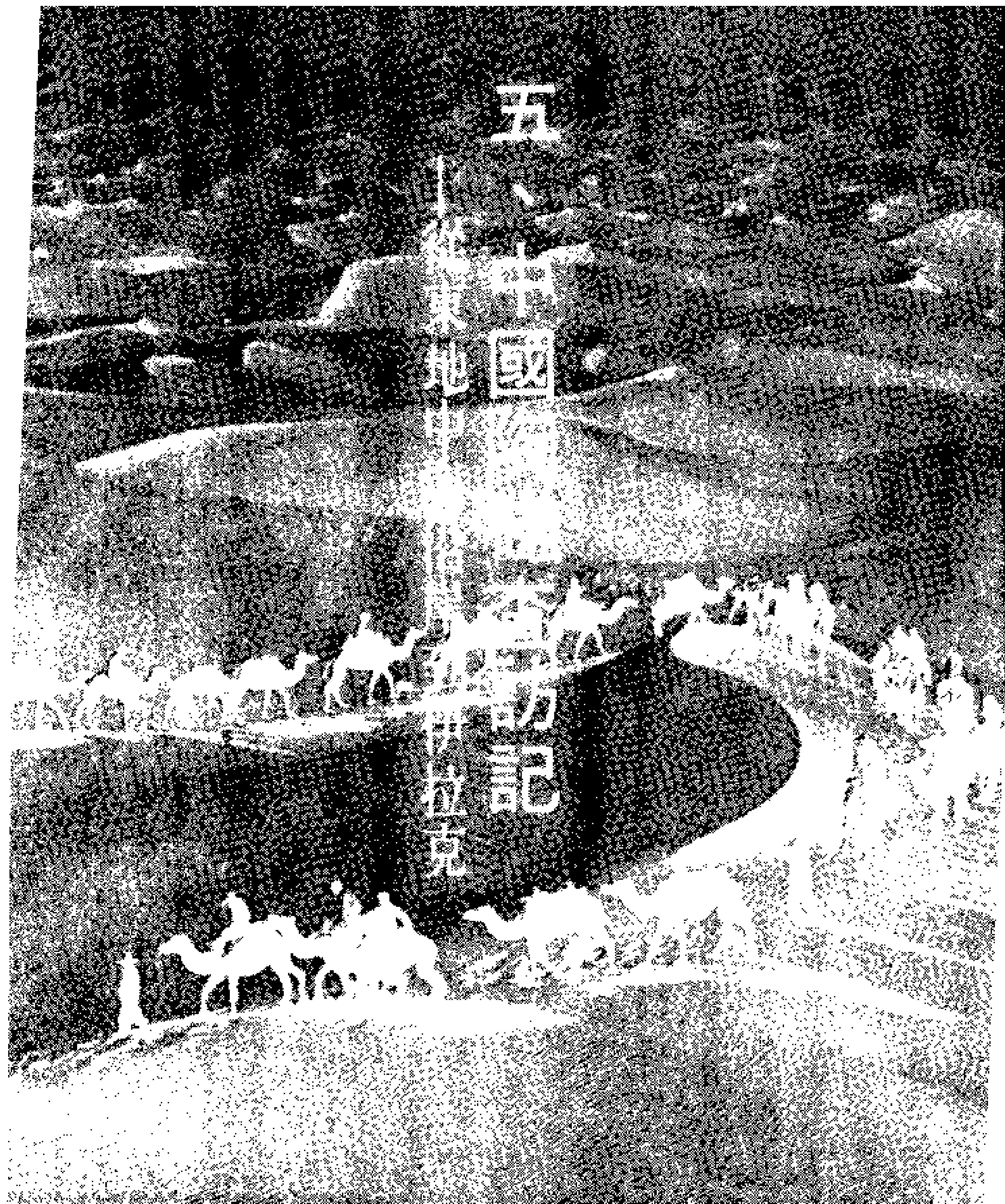
我尚未聽說從土耳其伊斯坦堡以外的中世建築或遺跡之中，傳出有發現中世中國陶磁的有關資料。即以砲門宮博物館蒐藏品象徵性的說明，還不能知曉十三世紀以前的中國陶磁，在此是否存在。

那麼，實際上，從十到十二、三世紀這一時期裏，中國陶磁對阿那托利亞（土耳其亞洲部分）一地，究竟是無所輸入呢，抑在伊斯坦堡以外未曾使用？如這種情形屬實，則它正成了告知中世阿那托利亞的政治、經濟、文化狀況之一件重要的歷史指標，不過有關此點，目前尚不能下任何斷語。現在土耳其有關古代遺跡之研究雖在進行，但有關中世之研究，尚不充分，同時，這也是由於此地的研究者，有關中國陶磁知識，尚不充分所使然。

我想將來我遍歷土耳其土地之際，在阿那托利亞地方追尋中國陶磁之跡，這也許是我要負起責任的工作之一吧。


土耳其
伊朗
拉塔奇亞
哈馬
敍利亞
特里波利
何母斯
巴美拉
貝魯特
巴爾貝克
西頓
大馬士華
泰爾
沙馬拉
巴格達
阿必爾達
庫迭西灃
伊拉克
庫法
瓦濟特
底格里斯河
幼發拉底河
以色列
沙地阿拉伯
巴士拉

阿必爾達的遺跡



東西貿易路和東地中海沿岸

東地中海的海水，於清澈瀲灩中，帶着深沈的光輝，在色調上它予人以水天一碧的感覺。在這碧藍海水逐漸變爲青白之處，由此向南出現了一條長長的海岸線，沿這條線展開了帶狀的豐饒的沿岸地方。在這一地帶的東陲，就是巔峯積雪的黎巴嫩山脈。這一帶的山麓曾爲高杉所掩蓋，木材輸往各地。但現在已被砍伐得童山濯濯，杉樹的殘姿已所剩無幾，雖然如此，但黎巴嫩國現在仍把希大杉做爲共和國的象徵標識，由此可見地方人士對這種樹，該是如何深具懷念之情了。

東地中海海岸，是由遙遠的東方，越過了波浪一般的山岳和沙漠，走向西方的絲路或香料路的大終點，也是從地中海方面，向遠在東亞的中國和南亞印度貿易路的起點。所以從這一沿海的北方數起，很勻稱地散佈着塞琉細亞（Seleucia）、拉塔奇亞（Latakia）、塔爾透斯（Tartous）、特里波利（Tripoli）、必布洛斯（Byblos）、貝魯特（Beirut）、希頓(Sidon)、泰爾(Tyre)等港。海港周圍的田野裏，葡萄、橄欖，或無花果樹，在小麥田間發出青葱的濃綠，春天一到，野生白頭翁的紅花耀眼盛開。這些港口都因往來於賽普洛斯、希臘、義大利、埃及運送東方商品和西方旅客的出入船隻而繁盛起來，當地也一定有古來的種種情景，呈現在人的眼前。不用說中國的絲綢也必是經此而運往羅馬和埃及的。

東地中海的沿海地帶，即自古叫做敍利亞的區域——現在則分屬於敍利亞和黎巴嫩，一部分則劃歸土耳其和以色列——之西部，正是我們心所嚮往的地方。

黎巴嫩的巴爾貝克

由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到敍利亞首都大馬士革，車行僅約兩個半鐘頭，但其間必須經過兩條高大山脈。那就是黎巴嫩山脈和後黎巴嫩山脈。在兩條山巔有積雪的山脈之間，即爲名叫貝卡的高原地帶，在晴空之下一面都是小麥地和葡萄園。在其中有一個叫做巴爾貝克（Baalbek）的地區，剩有羅馬時代的遺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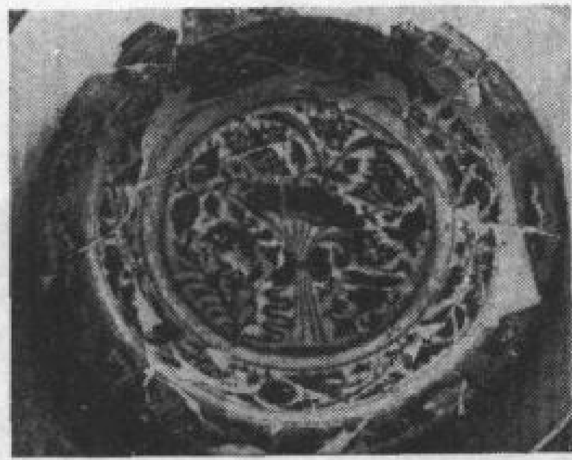
羅馬人建造市街和築城特爲熱心，凡在他們所

征服之處，不論如何邊遠，都建有以巨大石造神殿爲中心的市街。他們便在其中橫行濶步，豪飲葡萄酒，過着享樂的生活，一方面或也許因爲沒有如此堅固城牆圍起，便無法安穩成眠的緣故。

巴爾貝克也就是這樣的羅馬人城市之一，迄今仍和雄大的羅馬主神 Jupiter 的神殿、酒神的神殿、美神的神殿並存的，還有政廳和法院的遺址，豪壯的建築，簡直使人爲之瞠目。據說最近所掘出的建築用石材，一塊竟有重達二百噸者。如此駭人的巨大石塊，究竟如何搬來此地，我眞想問一下當時的人士。由尼羅河上游阿斯萬所運來的紅色花崗岩高大圓柱，也在法庭的正面樹立着。羅馬時代的巴爾貝克城市，隨着羅馬對東地中海地方之放棄，一旦成爲廢墟，在中世的伊斯蘭時代，似乎也曾被重用爲自敍利亞腹地到海岸的中途要地。


巴爾貝克風景

我所探尋的中世中國陶磁，在這以古老及豪壯見稱的巴爾貝克，也有其踪跡。在此地所發現的兩片中國陶磁，現正保存於東柏林貝爾噶蒙博物館的東方部，承蒙博物館的杜芝斯博士 (Dudzus) 和愛爾德萊茵氏 (Erderlein) 的好意，允爲調查。當發現其中之一片，係附有內外都畫着蓮瓣花樣的宋代龍泉窯青磁盌斷片，另一片則爲繪有流暢花草紋樣的美好元代白磁青花盌之一部分。十二至十四世紀之際，中國陶磁在此高原之古都，爲人所珍重一事，已至爲明瞭。



哈馬遺址出土的元代白磁青花模造品

從敍利亞的哈馬遺址，也發現了幾乎可亂眞爲元代白磁青花的同時代模造品。此種中國陶磁的模造品，它們無疑是以中國的白磁青花爲樣本而製做，故元代白磁青花之輸入敍利亞，自屬當然。對此事我將在下文另有說明。趣味仍在後頭。因此當我在大馬士革博物館裏，找到了這種仿製的白磁青花時，眞歡喜得如獲至寶。

不過巴爾貝克的出土品，尚不明瞭，究竟從何種處所，並在何種狀態下所發現，不無遺憾，但無論如何，做爲一個爲世人所熟知的羅馬時代大遺跡之古都，從那裏能發現中世紀與中國貿易有關的陶磁器，專就這一點而言，也就有其大筆特書的價值了。

敍利亞的哈馬

從巴爾貝克的貝卡高原，再向東越過一重後黎巴嫩山脈，便出到敍利亞大草原。而在後黎巴嫩山脈或在其延長上山脈的東麓，大馬士革、荷母斯、哈馬（Hamn）、阿勒坡（Aleppo）等，古來在東方歷史上，曾扮演過重要角色的都市，目前仍在其各自原有的地方，成爲中心的存在，繼續繁榮。

此等都市，每一個都位於從大馬士革走向北方阿勒坡途中，一條直線的道路之上，也都各因其悠久的歷史，而獨具特徵。大馬士革自羅馬帝國時代起，不僅已是馳名的都市，即在薩拉森時代初期的烏邁耶王朝時，也是首都，荷母斯則是控制前往巴美拉道路的軍事要衝。又約位於大馬士革和阿勒坡中間的哈馬，前臨奧倫提斯河(Orontes, R.)又名亞夕河(Nahr el Asi)，自古即爲政治、經濟、以及交通上之要地。至於阿勒坡，則是自羅馬時代以來，即成爲各國爭奪之目標的重要城市，在市的中央，一座雄大堅固的城塞，威嚴沉重地睥睨着四方。

中國陶磁便從這種都市之中的哈馬遺跡裏，發

現出來。

哈馬的城市非常有趣。它從新石器時代起，幾經毀壞，而又重新建築起來，它可以說是市街的堆積，現在是在十幾公尺高丘之上，排列着近乎重疊的屋宇。居住於山丘之上的人家，必須將水汲起。因此他們就用直徑七、八公尺、一種特殊構造的大水車，在吱吱的響聲中，把奧倫提斯的河水，送上高處的水道。想起這以「哈馬的水車」遐邇馳名的地方，自古以來這種大水車，不知已繼續轉動多少年代了。

在此自從新石器時代以來，卽層層推積的小丘之一隅，由一九三一年起至三八年止，曾由丹麥國立博物館調查團所發掘。遺跡之年代，爲自新石器時代起至十五世紀止。

由最上層的九五〇年起，到可以推定的一四〇〇年層，從那裏發現了青磁、白磁、和白磁青花等中國陶磁的破片。因爲這是從鐵木兒時代之劍的下層所發現，很明顯這是屬於十五世紀之前的。此外還找到了貝命細亞模仿中國白磁青花的白地藍釉彩畫陶器。

一九六四年三月，我曾訪問了保存這些陶磁片的哥本哈根。我拜訪了與白銀爭輝在雪中屹立的國立博物館，蒙發掘者（註）的黎斯博士夫婦（P. J. Riis）、蒲魯森博士(Vagn Poulsen)的好意，曾對出土的中國陶磁片加以檢點。

註：P. J. Riis et Vagn Poulsen: Les Verreries et Poteries Uédiévales (Hama) Fouilles et Recherches 1931–1938 IV. 2), Copenhagen, 1957.

其中既有疑似南宋時代官窯浮牡丹花樣的美麗青磁盌破片，也有在盌內底部中央，具有黏貼花形的元青磁盌的一部分。這都是在開羅的福斯塔特遺跡，伊斯坦堡的砲門宮博物館，或伊朗亞達畢爾美術作品館 Ardebil Collection 等處，可能見到並具有特徵的元代青磁。

這些珍藏之中，又包括着潔白如洗的宋代德化窯白磁破片，和一件外面是美麗的辰砂，而裏面是帶有青色的白磁碗。後者帶有辰砂的白磁，也許是在這遺跡之中時代最晚的東西。

這裏也有中國以外，東亞各地的陶磁，這裏有

泰國斯萬卡洛克窯出品的鉢子破片。十四至十五世紀的泰國陶磁，在埃及的福斯塔特、或東非沿岸之遺跡，都有所發現。如下文所述，此等物品在印尼和菲律賓等東南亞各國為特多。輸出於西亞者，也許均屬中國陶磁的代用品，但對中國陶磁需要的景氣，影響一直達到泰國，這也是不能輕輕看過的重要問題。

牧歌式的大水車，和具有異國情調的丘陵城市哈馬城故事，成了稍帶硬性講說中國陶磁器的談話了。

有關敍利亞的事情，在此暫行告一段落，現在我們要走向東方的美索不達米亞（伊拉克）。

由敍利亞到美索不達米亞

從敍利亞向東走，便到了伊拉克。它是一個夾在底格里斯與幼發拉底斯兩河之間的，即所謂美索不達米亞（兩河之間）的區域。因為伊拉克的名稱，也是「水濱」或「沿岸」之意，於是就和它發生了關係。它是一塊細長而肥沃的土地，和埃及並肩，為世界最初嚐到所謂文明這種蘋菓味道的地方。由敍利亞的大馬士革起至伊拉克的巴格達，空路需一小時又十分，如乘巴士橫斷沙漠，則需十三、四小時。這樣說來雖很簡單，但這僅屬近二三十年之事，在此之前彼此往來，並非易事。因為在兩個地區之間，橫着一片廣大的沙漠。而且在沙漠之上，還有一種似以掠奪為生計之一的剽悍伯多因人（Bedouin），更使人提心吊膽。

故普通旅客為了躲避這種危險，都北上敍利亞，摸到幼發拉底河上游，從那裏再回轉往東南方，而出至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如果騎駱駝由大馬士革到巴格達，則要搖晃二十餘日纔可抵達。所以比鄰而居的伊拉克和敍利亞，雖然看似很近，但路途卻意外地遠。然而自敍利亞到伊拉克的這個巨大弧形曲線，曾經被東方學者卜雷斯梯德稱為肥沃新月地帶（Fertile crescent）的問題地點，由此可知兩者的強烈連帶性了。

美索不達米亞是一個富庶的地方。同時它又有一個世界文明創始者的傳統，這一地方在任何時代，都成為東方的政治中心，和經濟、文化的要衝。即使在被東方的阿克梅內斯朝波斯或薩山朝波斯所

征服之時，亦仍爲重要地區，尤其是在薩山朝時代等，還在巴格達南方的庫迭西篷建築了首都之一。

到了伊斯蘭時代，強盛的阿巴斯朝（七五〇—一〇五五或一二五八）成立以後，首都經常選擇美索不達米亞地方。其次纔是幼發拉底斯河畔的庫法(Kufa)、底格里斯河畔的巴格達、以及其上流的沙馬拉等。尤其是七六二年，由卡利夫阿爾滿速爾(Al-Mansur) 所建造的巴格達，甚至還成了薩拉森帝國繁榮的象徵。

貿易是薩拉森帝國最爲重視的經濟活動。故自東西南北四方，珍貴物資和高貴商品，都向此地流入和輸出，使美索不達米亞的財富大爲增加。還不僅如此，遠處的工匠也被引入此地，從事於高級的生產。中國人的工匠們，於八世紀中葉，已經來到了美索不達米亞的庫法地方，下面介紹一段講這件事的有趣史料。

八世紀中葉，高仙芝所率領的唐軍，與阿拉伯軍大戰於中亞之呾邏私，大敗，唐軍數萬人被擄，客死異域，此一會戰（七五一年）成爲歷史上有名的戰蹟。

俘虜之中有一名叫杜環之人。他被帶至幼發拉底斯河畔的庫法，允其還唐，於八世紀末曾官至宰相。他於歸國之後，曾寫了一篇見聞錄，描述在薩拉森羈留期間的遭遇，其記錄的一部分流傳於世，即現時所稱之「經行記」是也，它宛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很多日本人被拘留在鮮卑利亞和中央亞細亞腹地的情形，以及馬可孛羅旅行記的重演。

該書曾有一節對當時的首都「亞俱羅」，亦即庫法的情景描寫的非常生動，而深具興趣。其中說，在此既有京兆（長安）的漢人畫匠樊淑和劉泚，又有織捻線綢的河東（山西方面）人樂隱和呂禮。」

這證明當地是有中國人的，他們可能是與杜環同爲被俘之人，也許是搭乘貿易船來此的工人。但無論怎樣，在如此早期，便已有中國人居住於美索不達米亞，以繪畫暨紡織爲業，我不知將如何說纔好，這確是一件極富興味之事。在庫法異域相逢的杜環和其同國人，一定有種種悲喜哀歡的情形。

想到這等情狀，則中國陶磁的知識能達到此地，亦絕非若何不可思議之事。於是當人們在美索不達米亞搜尋中國陶磁之際，便可知將由各處的中世

遺跡，發現其踪跡。其中沙馬拉(Samarra)的遺跡，最爲重要。

沙馬拉遺跡及中國陶磁

提起巴格達，雖屬無人不知，但知道沙馬拉之人並不多。它是位於巴格達北方約一二〇公里處，底格里斯河畔的一大遺跡，爲九世紀中期阿巴斯朝時代，薩拉森帝國所建的首都之一。從歷史和考古學方面講，它是一個並不亞於巴格達的重要地方。

總之，捨棄了像巴格達這樣美好的城市，而更在沙馬拉建設新的首都，也自有其相當的情勢。

卡利夫(教主)哈倫、阿爾、拉西德等所活躍的阿巴斯朝的初期，表面上輝煌璀璨，首都巴格達等地，予人以富麗堂皇、無所不有的印象，但究其實際，却並非如此，自九世紀之初起，卡利夫與支配階級之間，相繼發生了政治鬥爭和親衛兵的叛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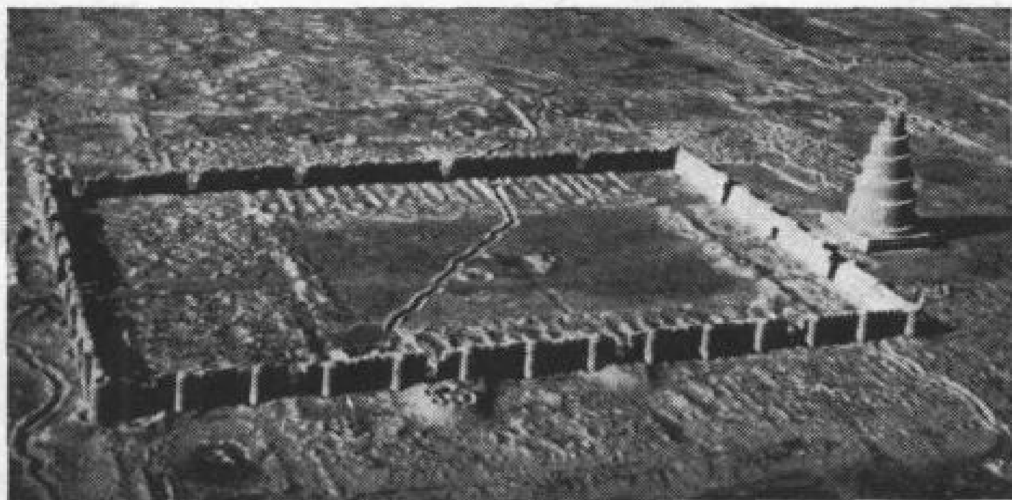
第八代卡利夫阿爾・穆達西姆(Al-Mutasim, 833-842)，爲了逃避這種血腥環境，復以躲避當時發生的底格里斯河的水災爲藉口，乃決定遷都於巴格達北方一二〇公里處的沙馬拉，八三八年(一說爲八三六年)在此建設了大的都城。

位於底格里斯河畔的沙馬拉，正處於南北美索不達米亞的中間地帶，較之巴格達，頗爲高燥而清爽。其遺跡散在於東西岸三十餘公里之廣，其間有宮殿、官衙、門、寺院、邸宅、馬場等遺址，一切均屬半就傾頹的壯大廢墟，但一見之下，無不令人緬懷當時都城規模之雄大與壯麗。其中像具有巴貝爾塔那種形狀之大尖塔的南北兩大寺院——北爲阿不達拉等，南爲梅爾維亞寺——這都足以表達阿巴斯時代文化的厚重特質，予人以深刻印象。

消耗如此鉅大勞力而造成的沙馬拉，又於四十五年後的八八三年(一說八八二年)，在十五代卡利夫阿爾・穆塔米德(Al-Mutamid, 870-892)時放棄，將首都遷至瓦濟特，嗣後復遷回巴格達，而沙馬拉則從未恢復用做首都。可是迄今金頂發光的南郊聖依廟姆墓廟，因爲被錫亞派的伊斯蘭教所敬重，故其後至此巡禮者，仍絡繹不絕。

因沙馬拉城市建於八三八年，而於同世紀的八三年復行棄而不用，故此遺跡在流傳九世紀中期伊斯蘭文化方面，成爲最佳之資料。學術界對此不會不加注意。果於本世紀初之一九一〇年，由法國建

築家魏奧萊氏(Viollet)開始着手調查，自一九一一年至一三年，德國的札列博士(F. Sarre)和赫爾芝費爾特博士(E. Herzfelt)，更實施了大規模的發掘調查。（註）


沙馬拉風景

註：Dei Ausgrabungen von Samarar, 5 vols.

中國陶磁片最初之發現即於此時。此項發現與埃及福斯塔特遺跡之調查，以及發現中國陶磁之時間相同，實為一件奇異的偶合。因此，沙馬拉的名稱與中國的關係，也傳揚開來。迄今薩拉森帝國與中國之貿易，雖有種種說法但唯有這件事纔提供了實證，。

沙馬拉遺跡的面積廣濶，未經調查之處尚多。其後於一九三六年至三九年，實行了第二次（註）調查，復於一九六三至六四年，實行第三次發掘調查，此兩次均由伊拉克政府考古局所主辦，當又發現了種種新事實。中國陶磁的問題更臻明朗化，自不待言。

註：Iraq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 Excavation at Samarra 1936–39. Baghdad. 1940.

現在講到中國陶磁的問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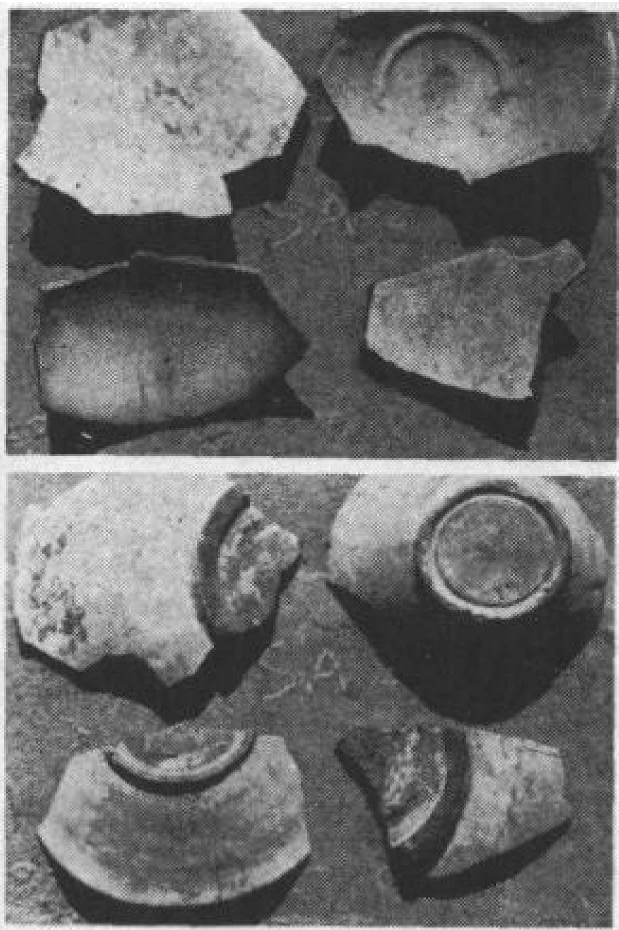
我們首先要知道的是運到此地的中國陶磁之種類。有關第一次發掘時的中國陶磁，見於上文所舉札列博士之報告（註），據稱自鄰接夾烏紗克Djausaq宮殿之庫房中，發現了唐三彩形式的碗和盤，綠釉和黃釉的磁壺破片，白磁片和青磁破片，從牟它哇基爾的大禮拜寺庭院水井之旁找到青磁片，又自阿錫克宮殿之地下室，出土了白磁片。有如此多種多樣的中國陶磁片出土，自然要轟動社會了。

註：Friedrich Sarre: Die Keramik von Samarra Berlin, 1925.

札列氏依據此一遺跡僅曾於九世紀中期使用過的特殊性格，即認為此等破片悉屬唐代製品，但依照現在的知識，便很難認為全部都是中國陶磁。尤其是以最成為問題的三彩系的陶器，以及綠釉、黃釉陶器為中國製品，似覺困難。我曾於一九六四年獲准調查巴格達阿巴希德宮博物館（Abbassid Palace Museum）所庫存，並為一九三六—三九年調查之際，所出土的中國陶磁片，其中所包括的綠釉系、三彩系、或黃褐釉系的大部分軟陶，都是模仿唐三彩的伊斯蘭多彩陶器或多彩刻線文陶器—其中雖也含有像似所謂中國的遼三彩。—這是因為中國輸出唐三彩的數量，現實上是極為稀少的緣故。

同時，札列氏所掘出的青磁和白磁，從吾人的眼光來看，與其說是唐代的物品，勿寧說是年代更晚一些，從十世紀到十二世紀（晚唐、五代、宋）的東西，似乎更為相宜。

如前所述，我於一九六四年，承伊拉克考古局的好意，惠准我調查於一九三六年——三九年由沙馬拉所出土的中國陶磁，其時在阿巴希德宮博物館庫房中，所保管的中國磁器之中，就有十二、三世紀(南宋、元初)的青磁和青白磁。其他在巴格達勘馬江的阿拉伯博物館（The Arab Museum at Khan Marjan）之沙馬拉出土品之中，也有一部南宋時代帶有稜紋的龍泉窯鉢子。



沙馬拉出土的中國白磁片
（上圖示內部下圖示底部）

請恕我的話稍嫌囉嗦，我甫經調查過的，同屬於一九六四年訪問過的西柏林達列姆博物館，它所

保有之沙馬拉出土品之中，也有十二至十三世紀（南宋、元初）龍泉窯的青磁片。

上文我急於報導自此遺跡中所發現之宋代中國陶磁，但這並不是說其中並完全沒有九世紀的東西。實際上，巴格達的阿拉伯博物館卽有九至十世紀（唐宋—五代）的越州窯磁，西柏林的達列姆博物館裏，也同此保存有九至十世紀的越州窯磁和白磁碗的破片。

所以可說在此處曾為首都之九世紀中期，中國陶磁曾有大量輸入之事，無可置疑。

不過自從九世紀之後，卽完全未曾被用做首都的沙馬拉，却從它的宮殿遺址和禮拜寺的遺跡之中，發現十世紀以後至十三世紀時的龍泉窯青磁和青白磁或白磁，這也是一件趣味盎然的事實。

假如這一首都，如本文開始時所述，自八八三年以後卽被完全放棄，則決不會有如中國的青磁、青白磁和白磁等貴重之舶來品出土之事，可是眼前的事實，則又與迄今所相信的事情有異，那就是說，沙馬拉雖在失去了首都地位之後，在當地是仍有相當的貴族和富人居住的。倘若僅有些人去到聖依麻姆廟去巡禮，他們似乎也決不會將這等高貴的物品，遺留於廢屋之中。諸如此類事實之文獻的考證，雖可委之於將來的硏究，但中國陶磁之存在，如其能成為變更迄今人們所給予沙馬拉概念的資料，那便必將發生雙重或三重的效用了。

伊拉克遺跡的中國陶磁

阿巴斯朝時代的繁榮，並不僅侷限於沙馬拉。像比較重要的都市巴格達，和在兩河河口所築造的世界有數海港巴士拉，亦皆如此。在這些地方當然有很多中國陶磁輸入，無庸置疑，但因接連不斷的洪水，致它們被深埋地下，故直至現在仍無發現之消息。試想自更小的城市亦能有所發現，則將來必能有大量出土，自無疑問。所謂更小的城市，卽指瓦濟特、庫迭西達和阿必爾達等是也。

瓦濟特(Wasit)位於南伊拉克之庫特(Kut)的東南方七十公里處，那裏有伊斯蘭時代的都市遺跡。當伊拉克首都從上述的沙馬拉，再度遷往巴格達時，在其中間的數年之間，就曾經作過阿巴斯朝的首都，說起來也不能算是鄉村僻遠的城市。

由該處所發現的遺物，在巴格達阿巴希德宮博物館的庫房之中，卽有所儲藏，在阿拉伯博物館亦有展覽。其中有外側呈稜形的十二—十三世紀（南宋時代）的龍泉窯青磁碗。那是一件大致完整而好看的東西。另外還包涵着內部中央貼有菊花圖樣的元代龍泉窯青磁碗破片。這種在內部中心黏貼菊花圖樣，且在底部穿有小孔的青磁碗，像在埃及的福斯塔特、土耳其的伊士坦堡、或敍利亞的哈馬、以及伊朗的阿德畢等處發現的一樣，這是僅在東方纔能見到的特殊青磁碗。這種東西準是爲了滿足東方人的需要，而特別定做的產品，它們也能被運來伊拉克的瓦濟特，這在顯示東方住民愛好的共同性方面，非常難得。

庫迭西逢(Ctesiphon）距巴格達很近。位於巴格達之南約三十五公里處，爲薩珊朝波斯首都之一，頗有名氣。遺跡在稍帶暗灰色的曠野之中，其中的一部分已由德國考古團所發掘。現在仍殘留有一部分仰面可見之豪壯宮殿所附屬的大會堂，徒使遊人緬懷往迹。可是雖到了伊斯蘭時代，城市仍未消失，在附近田地之中，到處還散亂着伊斯蘭時代的陶磁破片。其中曾發現有十二至十三世紀（宋代）龍泉窯的青磁片，現藏於倫敦大英博物館。一九六四年當我手持這一片青磁欣賞之際，在我的腦海之中，立卽出現了庫迭西逢豪富家庭，曾經使用過這種傢具的形像。無論在任何地方，卽在此地也有中國陶磁。

最後，我們再看看阿必爾達和中國陶磁的關係

阿必爾達(Abirta)這一不常聽到的遺跡名稱，我還是從日本駐開羅大使館奈良參事處得知的。他說那裏曾發現了中國陶磁。

一九六四年二月的一個清晨，我和八木正男大使夫婦、松見守道、杉村棟諸人，訪問了此處。該地約在巴格達東南方六十公里。在駛往庫迭西逢方面的公路向右轉，眼前一望無際，都是平坦的紅褐色沖積地，在地平線上似乎沒有一件顯眼的東西，不久，阿巴斯時代在此荒野爲供水而開掘的大運河遺跡，在眼前出現了，其附近有被沙子所覆蓋的小廢墟，這是到阿必爾達的半途。車輛依照嚮導的指

示，在砂原之中行走。不久，在地平線的彼方出現了一座類似崩潰之煙突一樣的東西。這是回教禮拜寺尖塔的遺跡，這一場所也就是由頹廢城牆所圍繞的阿巴斯時代的都市遺址阿必爾達了。

阿必爾達的一些附近是荒涼的狄亞拉(Diyala)地方砂原地帶。這種地帶如無灌溉設施，則無法耕種，至於都市的存在更不可能了。因此，設若有一有力的王朝出現，則首先整備灌溉設施，移植農民，使之從事農地的開發，迨王朝一經衰微，無力維持其設施，則耕地又重歸砂原化，都市被放棄。在中東地方，此種例證至爲衆多。

到了伊斯蘭時代，以開拓狄亞拉地方爲目標，而整備灌溉設施，似爲烏邁亞朝第十代國王喜夏姆(Hishám. 724-743)。結果住民移至此處，自八世紀的後半起至九世紀，土地變成肥美，收穫亦多。阿必爾達就是其繁榮的中心。但當九三七年，巴奇卡姆麾下的土耳其軍隊，一向巴格達進擊，阿巴斯朝第二十代國王拉第（Ar. Radi. 934-940），立將灌溉水渠破壞，以便防禦，從此這一地方又重新化爲荒野（註）。

註：拙稿「有關中國陶磁和伊斯蘭陶器之關係的幾個問題」『西南亞洲研究』十四號、一九六五年、六一七頁。Thorkild Jacobsen: Summary of Report by The Diyala Basin Archaeological Project (Sumer: Vol. XIV, nos. 1&2, Baghdad, 1958).

阿必爾達便是在這種情形被放棄的悲劇都市，於十世紀初期，它的壽命已告終結。一九五七—五八年，該地曾由芝加哥大學調查，在五六百公尺四方形的土城之內，重疊着禮拜寺和住宅的遺跡，地面上散亂着伊斯蘭初期陶片。這裏所看到的伊斯蘭陶器片，其所以祇限於初期，確如歷史之所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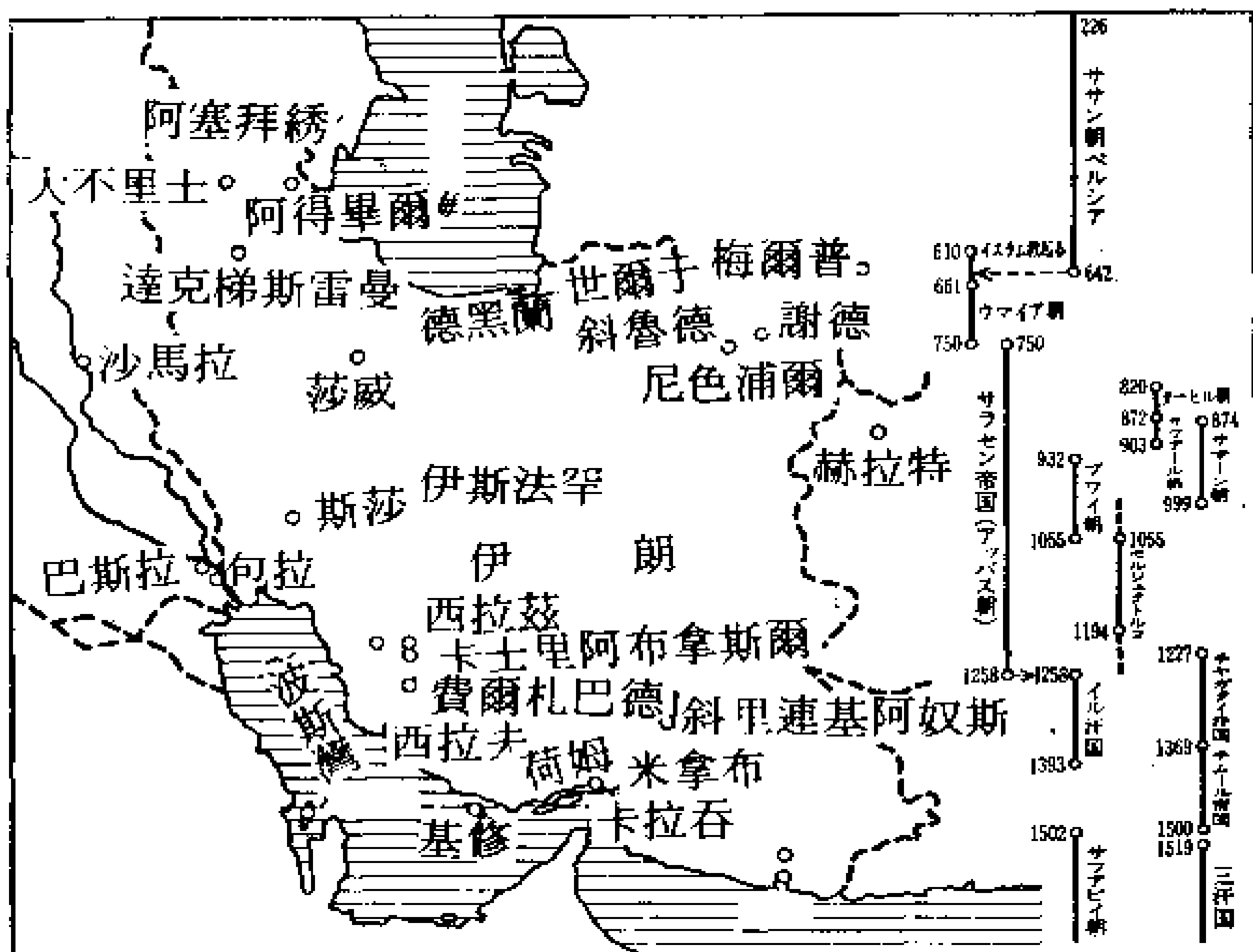
我們大家競相檢拾，終於在這裏也發現了九至十世紀製造的褐色越州窯磁和華南白磁的破片。目前在東京出光美術館陶片室所陳列者，就是這部分東西。

中國陶磁自九至十世紀時起，卽已像水一樣滲透到美索不達米亞的諸多城市之中了。

六、伊朗的東方陶磁寶藏

——東西文化的接觸點與中國陶磁





伊朗發現中國陶磁地點及其展覽分佈圖

波斯一詞的流風餘韻

在長久期間，波斯（伊朗）這一言詞，繼續在我的心靈深處，不斷響亮着它的流風餘韻。這是一塊遠在西方開放文化花朵的地方，與居魯士 Cyrus 或大流士Darius之名以俱傳的阿鑿米泥朝 Achaemenians波斯。它的首都伯賽波利斯 Persepolis 的壯麗和亞歷山大的徹底破壞。光明之神阿胡拉瑪芝德Ahura Mazda 和黑暗之神阿利曼 Ahriman 所交錯的拜火敎，薩珊朝波斯的銀器和在波斯所製做的正倉院四方形琉璃碗，以及在首都長安那長袖善舞的波斯舞姬。接着進入伊斯蘭時代，又是波斯的陶器和纖細畫。這些事件一樁一件地擁進我的知識之網，波斯這一名稱又以親切的音響，開始飛進耳鼓，不久它竟獲致了代表西亞名稱的重任。這種情事在我國恐怕不僅我倆人如此，即其他人士也定有同感。

事實上，波斯在中東地區的地位，無論在文化、政治和經濟各方面，也無論是古代和中世，一齊都是佔着很高的地位。而通過連結東西兩個世界的陸路與海路，又都有鉅大數額的貿易商品，輻湊到波斯境內，使這一國家獲得巨富。同時，自東西南北各方所傳來的文化，更都成了肥沃此地文化的材料，由此產生出豐富的波斯文化。

自公元前七世紀在波斯西北部成立了美太（或稱米底亞） Media帝國 (625-550B.C.) 之後，波斯即經常為西亞政治文化的中心。

接着美太的是一個大世界帝國阿鑿米泥朝波斯(前五五九——三三〇)，在其次為伯爾底亞帝國(前二四七——後二二六)，薩珊朝波斯帝國（二二六——六四二）成為代表西亞的國家，雖在七世紀之初被阿拉伯軍征服之後，仍未失掉它那中東文化代表者的風度，後來烏邁亞朝（六六一——七五〇）滅亡，阿巴斯朝（七五〇——一二五八）立，薩拉森帝國的中心，和政治、經濟、文化，一齊都轉移到波斯一地。而同時波斯方面，企圖脫離薩拉森帝國的羈絆而獨立的運動極強，自九世紀起嗣後，東北的科拉珊地區，便早已樹立了獨立政權。至於塔細爾朝（八二〇——八七二）、薩伐爾朝（八六七——九〇三）、薩曼朝（八七四——九九九）

，則全都是割據西北伊朗方面的地方王朝。

波斯之爲西亞的中心，雖在其後土耳其人的塞爾鳩克帝國（一〇五五——一一九四），蒙古人的伊爾汗國（一二五八——一三九三）以及鐵木兒帝國（一三六九——一五〇〇）時代，亦無任何變化，這些王朝雖然都以外族爲統治者，但文化上仍舊經常保持着阿墾米泥朝以來的波斯文化傳統，並未被征服者的文化所消滅。

十六世紀初所發生的波斯人薩伐威朝（一五〇二——一七三六），終於將自七世紀以來繼續掌握支配波斯的異民族，收歸波斯人手中，建立了一個繁榮的帝國。這一王朝繼續統治了二百餘年，滅亡於十八世紀前期，而由阿夫夏朝（一七三六——九四）和卡佳爾朝（一七七九——一九二三）等所繼承，自一九二五年起，改爲當前的巴哈列威朝，這是一個名實相符的波斯人王朝，它掙扎於諸多帝國主義侵略之下，經常保持着獨立，使具有古代傳統的西亞國家的名望，未致辱沒。

從這些歷史觀察，可見波斯是經常保持着它的一貫傳統的了。

波斯是東西世界的接觸點

當飛機接近德黑蘭時，山巔覆蓋着積雪的艾耳布士山脈 Elburz Mts.，在視野裏全面擴大起來。這道幅度寬廣的山脈，位於伊朗高原的西北部，呈東西走向，居於其中央部分的主峰德馬溫峰 Demavend Mt.，格外挺成錐形的優美姿態聳立在眼前。標高達五六七一公尺。

艾耳布士山脈的北面，降雨，生長着蒼翠的原始森林，並具有肥沃的農耕地和柔軟的裏海沿海地區，相反地，在山之陽却爲非常乾燥的地帶，愈往南則愈甚，中央部分則爲砂礫與岩石的卡威爾沙漠 Dasht-e Kavir。一個山脈竟能如此清楚地變化風土以及其他，眞令人發生可怕之感。

可是在艾耳布士山脈之南側，也到處有湧出高山冰雪所融化的冷水之處，這樣的土地便變成了綠洲，而隨綠洲的大小，則各有其都邑和農村。東部的麥什德 Meshed 、尼色浦爾 Nishapur，中部的沙魯德 Shahrud，西部的德黑蘭Tehran 和卡茲文 Kazvin 等，可說都是沿着艾耳布士山和與之相連

續的東北部複雜山脈之南麓的大城市。從中亞和阿富汗方面，通過伊朗高原前往美索不達米亞的古老隊商道路，駝鈴的響聲是沿着南麓綠洲行進的。

連接東西兩個世界的貿易道路，當然在艾耳布士山迤北也是有的。從中亞土庫曼共和國通往伊朗北方的道路，於通過謀夫和阿什卡巴德之後，進入伊朗北方的格爾干，由此再通過艾耳布士山脈北側與裏海之間，豐饒的馬占德蘭地方往西，而達高加索地方和西北伊朗的草地及山地。然後由這個高原地帶，則可前往高加索、黑海方面，或阿納托力亞（土耳其）以及底格里斯河的上游。經由這一大草原路線，也可把東西方種種商品與旺地交易起來。

在伊朗高原上，還另有一條大山脈，自西北走向東南。那就是艾耳布士山脈在西方的盡頭，從西北伊朗開始，在和美索不達米亞的國境上，非常寬廣而南下的札格洛斯山 Zagros Mts.。這條山脈更從波斯灣北側向東南伸展，到俾路芝方面，呈現出奇怪的山容。

在這些連山之間或山麓，還隨處有綠洲出現，從西北伊朗穿過此等綠洲道路，不久便走過東南伊朗的塞伊斯坦 Seistan 和俾路支，也可抵達巴基斯坦的印度河下流地方。公元前四世紀末，自世界征服者亞歷山大最後所到達的印度河流域起，引軍返國的道路，就是這裏。從南亞印度方面運來此間的某些物資，即通過這一路線，運往伊朗西北部，再越札格洛斯西行，而運抵美索不達米亞。

連繫東西方兩個世界的海路

在上節裏我已曾指出札格洛斯山地，是沿着波斯灣東南走向的。事實上確是如此，這山地的南麓，便是反映波斯蔚藍天空的波斯灣海水，由天空俯瞰波斯灣的色調，實在有一種令人無法形容的美麗，沿海岸的淺綜色海水，就宛如窺伺青色系統繪具箱一樣，它的色調逐漸加深，終於抵達爲深不見底的波斯藍色，更裝點了灣內的風景，這是安靜、深邃而引人的水色，如果於沉思中在這裏渡海，或將有於不知不覺中，希冀下水一行的可能。

可是一經上岸，那就令人有隔世之感了，猛暑和濕氣，像魔王一樣地侵襲着人體，波斯灣的暑氣眞是厲害。此處夏季在攝氏四〇度以上，高達五〇

度時，也不算希奇，而濕度之高低，又足給人類身心一種極大的打擊。

在此數年之間，英國的伊朗考古學研究所工作人員，曾從事於中世紀在波斯灣岸盛極一時的港埠西拉夫遺跡之調查，可是能够從事工作的期間，充其量不過是一、二月兩個月的時間而已。

但卽使在這樣酷熱氣候的波斯灣岸，古時海岸的繁榮舊址，還到處有其殘留的痕跡，自往昔卽享有盛名的海港，如上文所說英國調查團所發掘的西拉夫，扼波斯灣入口的荷莫茲島 Hormuz I.，或現在仍舊重要的沙塔阿拉伯河Shat-al-Arab河口的巴斯拉Basra 等皆是，小港此外尚多，這些地點都是自古以來東西貿易的基地，表示都曾有過非常繁盛的時期。

上文提到過的紅海岸愛札布 Aidhab 廢港也是一樣，對於追求利益之人，地上條件的惡劣，並算不了什麼，都可憑一股熱誠而予以征服。

在這種連結東西雙方之綠洲的古老城市，和消費自海上運來之物資的波斯灣岸古老港灣，剩有很多古代和、[illegible]跡。從此等地方曾發現種種富有興趣的遺物，其中也包含着很多我們所要追求的中國陶磁。

現在且就在伊朗地方所發現的中國陶磁，作一番追踪工夫。

波斯灣岸的遺跡

在古代和中世之時，經由海路進入波斯灣的途徑有二。其一是橫貫印度洋的航路，自印度南方的馬拉巴 Malabar 海岸出發，越過阿拉伯海，首先抵達阿拉伯半島南岸亞丁附近，由此沿南岸東北上，經阿曼入波斯灣，巡航灣岸諸港，乍見之下似屬迂廻路，可是據家島彥一氏的證明，來自印度方面的船隻，通過這一航路者，却意外地不少（註）。

註：家島彥一「關於印度洋通商史之研究」『Orient』十卷一、二號。同「唐末中國大食間的印度洋通商路」原載『歷史教育』十五卷五、六號。

第二是沿岸航路。自印度西南馬拉巴海岸出發之船隻，北上印度西海岸，而抵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河口。如在下文第七章所述，於現在喀拉蚩東方，有一個叫做班包爾港市的遺跡，此等地方應該是重

要的寄港地之一。

由此開航的船隻，順着海岸進入波斯灣，由此貿行在波斯灣北岸各港，裝卸貨物，並繼續前進。途中在荷莫茲島加西拉夫停靠，並駛抵底格里斯和幼發拉底河口。當年亞歷山大的軍隊自印度河口開返本國之際，其部將涅阿爾庫斯所率領的一軍，經由海路西向，即係經由這一沿岸的航路。

因此由東方開來的船隻，都是經由兩條海路，以進入波斯港口，故凡此等船隻靠岸之處，到處都發現有中世的中國陶器。

我們試由東方看起，離巴基斯坦國境不遠有一個古港梯茲 Tiz ，在它北方爲丹巴孤 Dambaghu ，在其附近則爲卡拉特伊遮姆西德，Qalat-i-Jamshid，進入內陸，在哈里爾路德溪谷Halil Rud 的吉路夫特 Jiruft 附近，則有斜利·達基阿奴斯 Shari-Daquianūs 等遺跡。

在此等荒涼的沙漠海岸和內陸，從那些微小又似乎爲人所遺忘的遺跡之中，檢拾起中國陶磁，而發出歡笑聲音者，乃享譽世界的印度學者、考古學家，且爲中亞探險家的斯坦因先生 Aurel Stein。

檢點了這些陶片的霍布遜氏 R.L. Hobson 謂丹巴孤發現的中國陶磁，爲十五世紀、亦即中國明代初期的白磁青花、斜利·達基阿奴斯所出土者，則恐係越州窯系陶磁，其他並含有似爲十世紀的青磁和青白磁等物，因此自唐末至宋初的中國陶磁，前往札格洛斯山脈北麓的斜利·達基阿奴斯者，即均由隊商所運輸（註一）。而自卡拉特伊遮姆西德所出土，多爲具有冰裂紋之白磁製品，斯坦因認爲這大概都是來自中國的輸入品（註二）。

註一：R. L. Hobson: Pottery Fragments from Southern Persia and the Northern Punjab—A .Stein: Archaeological Reconnaissances in North-Western India and the South-Eastern Iran.'Appendix A. London, 1937.

註二：斯坦因的前揭書，八六頁。

其次，即在波斯灣入口處，那有名的貿易港荷姆茲島的附近，於此島對岸的大陸上，從距離米拿布很近的卡拉屯Kalatun 海岸，有很多良質宋代陶磁片，與一枚宋代銅錢同時發現。發現人亦爲斯坦因氏，據他說，銅錢爲一一一一——一九年之物（

註）。這個年代相當於北宋徽宗政和及重和二代，因重和自一一一八年起至一一九年止，歷時不過二年，故此銅錢爲政和通寶之可能性極強。無論如何，由此所發現之中國陶磁，認定其爲十二世紀即南宋時代的作品，當無不妥。

註：A. Stein: Archaeological Reconnaissances in North-Western India and South-Eastern Iran, p. 183.

再循波斯灣西行，那裏有一個曾於九世紀中期到十三世紀船舶出入非常頻繁熱鬧的西拉夫 Siraf 港。眼前雖僅爲一位於塔溪利 Tahiri 海岸小部落之傍，寂寞無聞的遺跡，可是就從這遺跡之中，也發現了很明顯爲中國製造的若干陶磁片（註）。

註：斯坦因前揭書一八四頁。

關於西拉夫所出土的中國陶磁之性質，因英國伊朗考古學研究所，自一九六五年起，數年之間繼續不斷地發掘西拉夫遺址，由於發現了很多中國陶磁片，而愈加確實。本人於一九六六年拜訪研究所時，有幸獲睹由當地採集來的很多陶磁片，在大英博物館的品達威爾遜氏所蒐集的箱子裏，即有中國的越州窯磁和白磁。最奇怪的是在其中並未見有青磁，這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關於在波斯灣的海港發現中國陶磁之事，據中國陳萬里氏說，此外在波斯灣深處的巴斯拉，在其附近的商港烏勃拉Ubolla（以往的阿波羅高斯）、幼發拉底斯河口的奚拉 Hira 以及自荷姆茲方面小島上的基須 Kish 等遺跡，也曾發現過龍泉窯青磁破片（註），但其何所據而云然，未曾明言，引爲憾事。

註：陳萬里『中國青磁史略』上海，一九五六年，四四頁。

現在我雖已將現實上於波斯灣沿岸的許多發現了中國陶磁的遺跡地點，列舉了名字，可是若依據中世紀的記錄或能得更爲清晰的指證。

扼波斯灣入口處的重要港口荷姆斯，自古即爲波斯灣航路的重要據點，在中國史料中，它的名稱發見於稍晚的十五世紀之初，亦即在前文裏非洲項下，所說三寶太監鄭和所率明朝大海軍遠征印度之時。這隻大艦隊遠征南海達七次之多，第四次（一四一三——一五、永樂一一——一三年），第五次

（一四一七——一九、永樂一五——一七年），第六次（一四二一——二二、永樂一九——二〇年）等三回，都以忽魯謨斯（荷姆斯）爲最後目的地，由此可知荷姆斯港是如何重要了。

曾經追隨這一壯擧而從軍的費信，在其所著『星槎勝覽』中，記述十五世紀初荷姆斯的風土與居民的風俗習慣，隨後他又記載着在這一港口所作的貿易物品種類，其中列擧五色絹綢和種種香料、調味香料以及青白花磁器。據在正文後所附加的詩句青白花磁器記爲青花磁器（譯者按：據星槎勝覽紀錄彙編本文末，有「青花磁器」數語，附詩中則無此數字），故可知其所指者卽白磁青花也。運來忽魯謨斯的白磁青花，大槪爲數極夥。雖未見有青磁的文字，但青磁也必定在內了。

其次，關於西拉夫之事，在此前的十二——十三世紀的南宋時代，業經介紹於中國。見於南宋岳珂所著「桯史」（卷一一）之尸羅圍，南宋趙汝适所著「諸蕃志」卷上的施那幃，桑原騭藏氏均曾闡釋之爲卽係西拉夫的音譯（註）。

註：桑原騭藏『蒲壽庚事蹟』，岩波書店，一四一——一四二頁

因此可以想像出，中國商船這時也和西拉夫商人在東方的活動一樣，同此深入波斯灣的這一港口了。中國陶磁大概卽在這種情形下輸入此地，倘從當時海上貿易規模之大小來衡量，可以確定其數量一定相當鉅大。

沿絲道的各城市

現在把目光從中國陶磁分散在海岸的廢墟轉向內陸，這裏也有許多出土中國陶磁的地方。

我們先從中亞和阿富汗方面，看看由東到西通過美索不達米亞貿易道路的幹線。

經過阿富汗北部邊界西向的交通路線，當經過接近西部國境要地赫拉特 Herat 時，不久卽將接觸到伊朗境界，越過此地再往前行，很快卽行抵伊朗東北部的大都市麥什（赫）德 Mashhad（Meshed）。此處不僅是交通要衝，也是伊朗東部經濟中心地之一，在其街市中央，一座黃金淸眞寺的黃金圓頂，在艷陽下閃閃發光，予人以很深的印象。伊朗的伊斯蘭教屬於西阿派Shiah or Shiite，此地

是西阿派的兩大聖地之一。櫻柳迎着中亞的清風，枝葉莎莎作響，形成一個安靜的綠洲市街，雖然如此，但在黃金清眞寺的周圍，因有各方前來朝聖之人，而顯得非常熱鬧，販賣絨緞、米糧、布疋、寶石等貨物的大商店，市塵櫛比皆是。因爲西阿派聖地的戒律嚴，故異敎徒當然不准進入禮拜寺之中，卽攝攝影，原則上亦所不許，因此它的氣氛不知爲何總覺有些異常的緊張之感。

在此壯大華麗的清眞寺之旁，有相當美好的博物館。凡到此來訪之人，伊斯蘭時代的種種美術工藝品，自然盡收眼底，而在一個區劃之中也陳列着珍貴的中國陶磁。

那些陳列品，眞可稱做是氣派雄偉的中國陶磁完善之作，就中以元代龍泉窯青磁大鉢爲首，其他有明初和明中期的龍泉窯青磁，以及自明代迄清初的白磁青花之類。總之，令人具有龐大且品格高尚之感。尤其在器皿中心黏貼有雄壯龍文的明初青磁，繪有特色魚藻文之同一時期的白磁青花，均爲瑰麗之上品。此外如十六至十七世紀用靈獸唐草文裝點的白磁青花大盤，以及洋溢着西洋格調花草的十七世紀柏葉形白磁青花大盤等，也都紛然雜陳，發出異彩。

原來這一博物館，乃爲了展示駐蹕於麥什赫德之副王的蒐藏品，集中收藏於阿斯塔內・扣茲拉札威Astaneh Ghods Razavi 的寶物，而於一九四三年內方才開的館，該館中國陶磁之所以如此優異，其故在此，殆無疑義。中國陶磁被人重視到何種程度，此實爲一重要之佐證。

尼色浦爾的中國陶磁

尼色浦爾 Nishapur 是出土中國陶磁的重要地點。原來以尼色浦爾和麥什赫德爲中心的伊朗東北地方，眼前固爲伊朗領土，但從歷史上看，它乃是阿富汗西北部的赫拉特和巴爾夫、以及與其北方的土庫曼共和國的謀夫 Merv等，共同形成爲一個地區，稱之爲荷拉珊 Khurasan的地方。

由中亞或阿富汗方面通往美索不達米亞的主要貿易道路，自古卽經常通過荷拉珊地方，故此地無論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均富有活氣。不過也正因其如此，所以也時常遭遇到外來的劇烈侵略

。像中心都市尼色浦爾，便是幾度遭受殘酷命運的代表都市之一。

我們對尼色浦爾城市造訪了一番。接近伊朗和阿富汗兩國國境的麥什德，原爲回教聖地，由該處西行約一二〇公里，卽爲尼色浦爾市街。途中所看到的部落，不過七、八個，目之所及，幾乎均爲沙礫之荒野，但橫亘北方的雪山，極爲美觀。

我們找尋到的尼色浦爾市街，現在仍像是伊朗東北部的要衝，在其寬廣的主要街道左右，仍開着種種中世紀樣式的工商行號，交易卽在其中寂靜地進行。除伊朗人士外，土耳其人的面貌最爲顯眼，街市上所賣的絨緞，也是在紅地上黑線織成幾何圖案的土庫曼款式。四月清爽的和風，吹在綠洲城市寬廣的市街上。

現在如此繁盛的市街，其實也是自從十四——十五世紀以來就有的，在歷史上著名的舊城市，位於現市街東南五、六公里之處，業經成爲廢墟。這是由於成吉思汗軍隊的破壞，以及後來所發生之大地震的崩壞所造成的荒涼景象。

這一古老尼色浦爾城市遺蹟經被揭曉，乃開始於薩珊朝時代，至四三〇年代仍舊存在。它是色浦爾一世或二世所建設。自七世紀爲阿拉伯軍隊佔領以來，此地便成了荷拉珊總督的居城，於九世紀在此地建立了獨立政權的塔希爾朝（八二〇——七二）和沙發爾朝（八六七——九〇三）的時代，成爲首都，遺留下很多優美瑰麗的建築，進入十世紀後，薩滿朝（八七四——九九九）一經成立，此處遂又變成了總督的居住地。據當時曾經訪問過此地的伊本赫克爾等人之記錄，街市是由三哩四方，並有四個門的城壁所包圍，內部分爲四十二區。郊外亦有成排的房屋，隊商的鈴聲響徹遠近。

其後一〇三七年，色爾柱帝國之創立者托格里爾貝佔領尼色浦爾，以此地爲首都，遂成爲經濟文化之大中心，大的學校與圖書館接踵建立。僅就圖書館一項而言，據今所知，卽有十三所之多。位居中世世界之冠的數學家、詩人兼哲學家的歐瑪爾・卡耶姆Omar Khayyám(1050-1123)，卽誕生於此，並完成其偉大的工作。覆蓋他墳墓的清眞寺，嵌着幾何圖案彩色瓷磚的圓頂，光輝奪目，美麗至極。

可是這樣的尼色浦爾，於十二世紀中葉以後，

也曾被敵人的襲擊所困擾，十三世紀初又為成吉思汗大軍所蹂躪，遭受到毀滅性的打擊（一二二一）。其後雖然勉強復興，但於遢世紀的後半因又遭到再度強烈大地震的災害（一二六七、一二八〇），竟使一切建築化為塵土。

有一段長久歷史的故都，因此被迫放棄，現在於故都遺址之中，隨處有着伊斯蘭時代的城塞、市場、大禮拜寺和貴族的邸址。唯有薩珊朝的遺跡，不知為何，全無着落。

因為這一遺跡如此重要，故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於一九三六、三七、三九年，前後三次，從事極有興趣的發掘調查。調查集中於伊斯蘭時代的遺跡，發掘了自九世紀起迄十三世紀的城塞、市場、禮拜寺、學校、邸宅、隊商旅店，以及窯址等。尤其是九——十世紀的塔奚爾朝和薩滿朝時代的遺跡，被細心地檢點。終於弄清了當時尼色浦爾的各個家庭，牆壁上裝飾着壁畫，窗子上裝着有色玻璃。又發現主要建築物的地板，都施以紅、藍、青色的彩色，在公共澡堂用健筆描繪着人物像。除伊斯蘭教徒外，尚有很多景教派的基督徒和祆教教徒，更為引人興趣。同時，因此也對該城所使用的陶器和圓頂形窯的性質，有了瞭解，以活生生的圖案和色彩之美為特色的初期伊斯蘭陶器之實情，經此一舉而臻於明瞭（註）。

註：C. K. Wilkinson: The Iranian expedition, 1936. The Excavations at Nishapur, Section II of the Bulletin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Vol. XXXII, no. 2, 1937.
C.K. Wilkinson: Life in Early Nishapur. B.M.M.A., Vol. IX, no. 2, 1950.等。

由於大都會博物館的發掘，得悉這一遺跡為伊斯蘭時代遺物的寶庫，後來當地農民連年累月地實行盜掘。於是從此發現之遺物，乃充斥於德黑蘭古美術品市場。當一九六四年，我國人造訪此地時，盜掘之事，仍舊很盛。八雜市場的遺跡，充滿了坑穴，農民們挖掘有類水井的深穴，竟達四、五公尺，為的是尋找地板，和拋棄的陶器玻璃之屬，予人以深刻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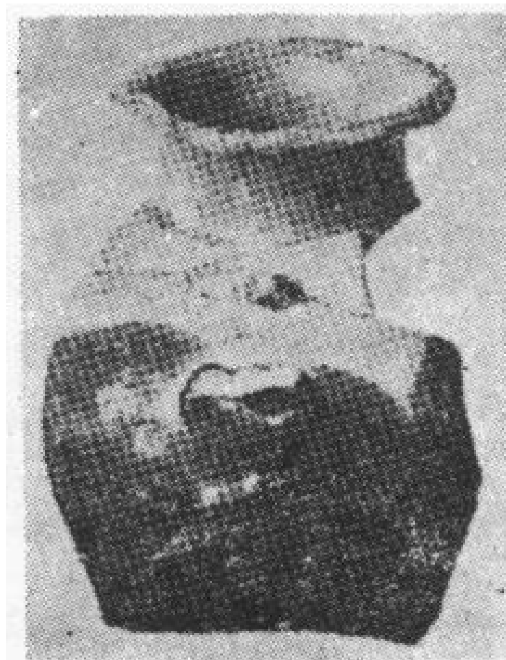
經大都會博物館如此這般發掘而得的物品，以及在盜掘品之中，發現了自九世紀的唐代起至十三

世紀宋代之間的中國陶磁。



尼色浦的盗掘風景

從尼色浦爾發掘出來的中國陶磁，現仍存放於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倉庫之中。本人曾於一九六四及六七兩年，造訪該博物館，幸經當時發掘的負責人威爾金森先生，當時管理伊斯蘭美術部主任格魯貝博士 Ernst T. Grube，以及阿納威先生和簡金絲小姐等的好意，准許前後兩次進入倉庫實地觀測照相。詳細情形有待於將來報告書出版時發表，總之，我在那裏所看到的東西計有：可認爲是唐朝萬年壺的一部分，邢州白磁壺一片，以及用暗褐色和綠色釉料而造成了大斑點花樣，並在黏貼花樣之上覆以黃釉，即所謂唐的長沙窯壺之上部（參看插圖），和晚唐越州窯深盌之一部；外側用深鏤彫蓮瓣文裝點的大盌殘片，以及具有弧狀梳齒痕的青白磁和青磁破片。



中國陶磁片

就中有一件，在質地上和唐白磁一樣地白而細膩，上面又塗着很容易發光的綠釉，還帶着附有高臺的陶製小盌破片，這件東西最爲引人興趣。和這件東西完全相同的破片，也曾發現於埃及的福斯塔特，無論在器形上、釉色上，甚至於兩者的質地之點，完全是中國的。實在說，像這樣的綠釉陶器，從其向來未曾從伊斯蘭陶器之中發現過的一點來推定，我認爲它乃是自晚唐到宋初的中國綠釉陶器。

此外，一件初期素樸的元代白磁青花盌的破片，做爲一件舊尼色浦爾末期輸入狀態的表徵，予人以印象。

在尼色浦爾的遺跡調查中，現實上雖所發掘出土者，盡屬破片，且爲數亦不甚多，但在種類上，却是越州窯、長沙窯、青磁、白磁、青白磁、和元代白磁青花等，一應俱全，尤其是用黏貼花樣所裝飾的長沙窯之細頸壺的上部，和畫有禽鳥的盤子之出土，確有注意之必要。在中國本土也未嘗發現的所謂長沙窯陶磁，如下文所述，却嘗發現於埃及的福斯塔特遺址和巴基斯坦的班包爾遺跡，自東方的爪哇島，也有相當多的出土品。這件事頗耐人深思，也許專門用做輸出的製法，可以成立。

據傳自尼色浦爾出土的完整品，也有幾件，它們都是在德黑蘭古董市場出現的東西，據我所知僅帶到日本者，也有三件之多。

第一個是越州窯磁的大碗，無論從它那寬寬地向左右張開的碗身形狀來說，或從那非同凡響的寬大高臺，以及它那獨特青褐色的釉子來說，都可斷定它一定是自九世紀後半起，到十世紀前半唐代晚期的製品，它是小山富士夫氏在德黑蘭所購的，德黑蘭則說是尼色浦爾所出土。

第二是石黑孝次郎氏從德黑蘭搬來，據說也是尼色浦爾出土的長沙窯小碟、碟心是用鐵釉畫上的花草圖樣，邊沿是鐵釉描繪的弧狀紋，並在其上覆以淡黃釉子，質地使用的是細緻的灰褐色陶土，它和上文所述由尼色浦爾遺跡出土的細頸壺的頭部和大碗的破片，是屬於同種的東西，我想，說它是九至十世紀的物品，是不會錯的。

第三個是小山富士夫氏所藏的白磁深盌，由尖銳的篦彫稜紋所裝飾。胎土色白而質細，盌口向外翹曲的形狀，也很整齊。據小山氏的想法，它是宋

代廣東西窯的製品。

× × ×

中世紀尼色浦爾人之愛好中國陶磁，由現在出土的陶磁片，已可據以說明，關連此一問題，白哈基 Muhammad ibn al Husain Baihaki曾於一〇五九年，富有興趣地寫道：

「荷拉珊總督伊沙 Ali ibn Isa 曾呈送哈利發哈倫、阿爾拉西特，向來未曾進過宮廷之珍貴的中國官窯陶磁二十件，和一般的中國陶磁兩千件」。

讀此，便可生動地瞭解到該有怎麼樣多的中國陶磁，運抵尼色浦爾，並從而可知尼人又是如何珍重它們了。這是阿巴斯朝盛期之事。中國陶磁運進曾爲荷拉珊中心的尼色浦爾，爲數竟如此之多，而在質量上却又如此優異。

在德黑蘭的國立考古博物館裏，陳列着附有說明發現自荷拉珊地方的南宋、元、明初等各時代的龍泉窯青磁大碗，以及完整的盤子，約有十件之多。尤其是南宋時代的有稜大碗，附有雕彫牡丹紋的青磁碗爲最優美。當第五次國際伊朗美術、考古學會，於一九六八年在德黑蘭召開時，我曾藉這個盛會向聽衆指明論述中國陶磁和伊斯蘭陶磁製作技法的類同性，故留有特別深刻之印象。

至於這些陶磁，究由荷拉珊地方的何處所發現雖不明瞭，但因爲想到它們是在伊朗，意者如非出自尼色浦爾與透斯，或即爲麥什德了。

艾爾布士山南麓的諸遺跡

沿着艾爾布士山脈 Elburz Mts. 南北麓通行的隊商路線前進，更向西前行，繼續探求中國陶磁的旅行。

位於艾布爾士山脈南麓的德黑蘭，現爲伊朗首都，在該地建都而成爲伊朗中心者，乃自十八世紀卡佳爾朝一七七九——一九二三以來之事，在其前，一個繁榮的城市，乃在距此南方約十公里之遙的雷城。

這一地方自古以來，適當東西、南北交通道路的幹線，故自新石器時代以還，卽有大的集落，進入歷史時代，公元前七世紀，美太方在這高原建設了統一國家（前六二五——五五〇），築成都市，定爲東方的要衝。

其後，時遷世易，王朝雖時有興亡，但這一地方在任何時代，均被重視。公元前二世紀所興起的巴爾的亞帝國，即建其首都阿爾沙基亞 Arsacia 於此，接着薩珊朝時代和阿巴斯朝時代，均不曾有任何變化，同爲重要地點。曾於阿巴斯朝時代的末期造訪過此地的伊本・郝克爾 Ibn Haukel，曾指出除巴格達之外，雷城是東方最華麗的都市，事實殆亦如此。

即在十一世紀的色爾柱帝國時代，這處也成了都市之一，拉給斯 Rhages 的名稱，遠播東西。

可是一進到十三世紀，決定命運的日子，終於降臨。那就是蒙古軍隊的侵入。一二二一年，這裏被成吉思汗的部將察貝 Chebe 徹底地蹂躪，十四世紀後半，再度被來自中亞的鐵木兒帝國大軍，作了最後的破壞。

現在來這裏弔古，祇見高約二十公尺的遺跡山丘，還矗立仍舊，在其最上層有被鐵木兒大軍所毀滅的當年舊市街，已成了一片巨大的廢墟。丘上一片凌亂，到處是斷垣殘壁，破爛地板和伊斯蘭時代的陶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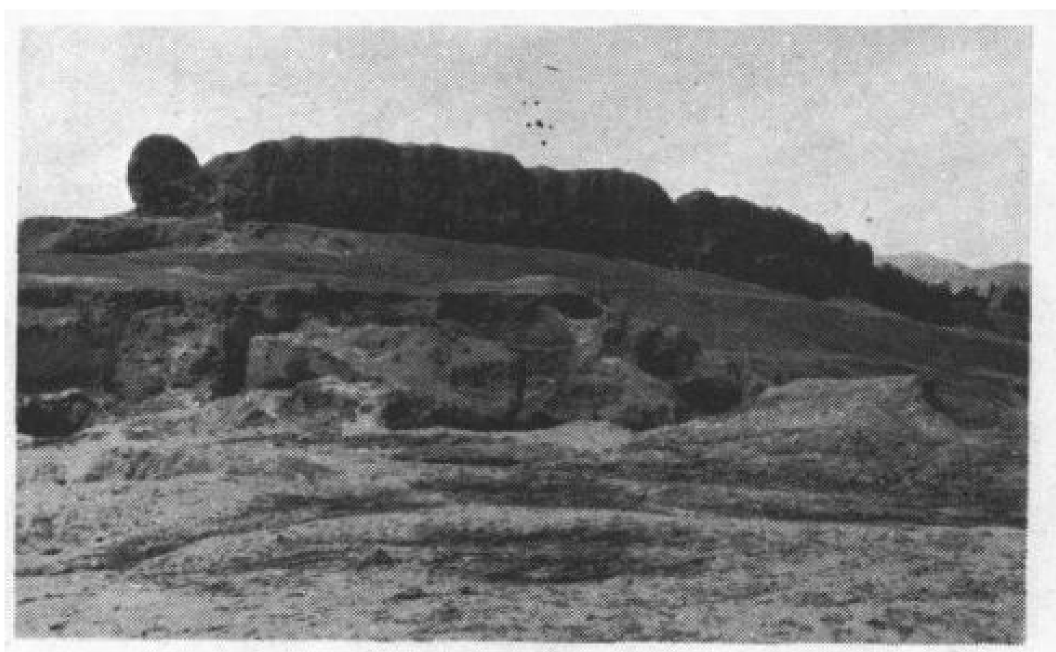
連接這廢墟西面的是恰修瑪阿里石頭山，在其附近有新石器時代的遺跡，人們可於其間以拾取在紅地或奶油色地上，畫有黑線或巧克力色圖紋的彩文土器破片爲樂。

由岩山南下，有一道自岩間滾滾流出的清冽泉水，在瀦入流水的池子裏，生有形如柳葉一樣的魚類，正翻着銀鱗游泳。廢墟是一個異常潔淨的環境。雷城地方，其所以能在長期間內，繼續成爲重要都邑，也未始與這樣豐滿的湧泉無關，在清泉近處岩壁之間，還有後世卡佳爾朝（一七七九——一九二三）國王的古式岩彫像，亦給人以印象。

一九三四、三五兩年，美國波士頓美術館和費城的賓州大學，對這一遺跡做了聯合發掘工作，結果由最上層的伊斯蘭時代遺跡之中，在多數伊斯蘭陶器裏面，發現有若干中國陶磁混雜在內。

遺跡的發掘報告雖然尚未付印，但一九六四年，本人承波士頓美術館之好意，曾對由雷城出土的中國陶磁片，作了一番調查。在寬廣的展覽高臺上，陳列着唐代後期越州窯的磁器破片——在細心繪有流利的刻線花紋，——另有元代龍泉窯青磁破片

，此外倫敦大英博物館，也收藏着雷城出土的南宋、元初的龍泉窯青磁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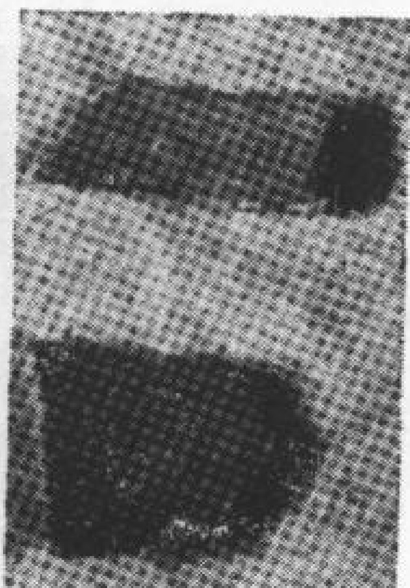
雷城遺跡

據小山富士夫氏說，在巴黎的基梅博物館備有「據傳爲雷城出土的菱花形唐朝白磁盤，配着邢州窯鐵繪的蝶浮出紋白磁盒子，疑似北宋東窯出品的青磁沙洲形大盌，和收藏明初白磁青花等優秀作品的玻璃櫥」（註一），又賓州大學據說亦有雷城出土的青白磁大盌（註二）。三杉隆敏氏也在其著作中說：基梅博物館也有據傳爲雷城出土的「唐代盃形白磁上帶有魚形浮彫的作品」（註三），總而言

中國陶磁片



左盌面



右盌裏

之，出土物品似乎種類很多。本人深以未曾在基梅看到此等古物為憾。

註一：小山富士夫「基梅博物館的元琺瑯釉白龍紋梅瓶」，『大和文華』，第三十九期二十八頁。

註二：小山富士夫「旅美雜感」，『東京國立博物館新聞』一二六期。

註三：三杉隆敏『尋求海的絲路』，創元社，昭和四三年。

倘此中基梅博物館由雷城出土的物品，全部悉屬確實，那就是說，在此地除曾經使用過唐朝越州窯磁之外，尚曾使用邢州的白磁盤子、盒子、以及酒盃等物了，這就足以說明，自九世紀以前起，中國陶磁是曾輸運到伊朗中央部分，興趣盎然，引人入勝。

當地愛好宋朝的青磁和青白磁，以及明朝的白磁青花，乃極為顯明之事。中東地區需要中國陶磁之大，於是乃愈趨明瞭。

讓我們再看看周邊地方的情形，離雷城西南一百五十公里處，有一城市曰沙威Saveh, Sava，該處也曾發現明代白磁青花破片。那是我們一行於一九六四年造訪沙威南郊中世的伊斯蘭陶窯址，和有名的瑪斯吉德・喬梅清眞寺Masjid Jome時的收穫。

沙威自十二世紀以來，不僅是一個地方都市，亦以使用良質陶土，生產優秀伊斯蘭陶器的地方而馳名，因此，中國陶磁之帶進此一地方，自亦無甚稀奇。

追尋起中國陶磁，前途可謂茫無際涯。伊朗高原中央的美麗舊都伊斯法罕 Isfahan，也有極爲大的中國陶磁收藏。

伊斯法罕是近世伊朗有光榮的帝國沙發威朝（一五〇二——一七三六）之首都，以被稱為大王阿巴斯（王一五八七——一六二九）時代為中心，曾接連建設了壯麗的宮殿和寺院。用種種阿拉伯式的錯綜圖飾裝點的清眞寺圓頂，以及牆壁的美麗樣式，甚至令人有筆舌難於形容之感，不看伊斯法罕，不要談伊朗，旅行指南裏的記載，並非誇張。

凡此種種都是以沙發威時代的所謂「伊斯法罕是世界的一半」的財富與權力為背景所建造。眼前仍舊存在的宮殿之一的契赫爾斯頓宮（四十柱宮）中，藏有明初的白磁青花和青磁的優良品，據三杉隆敏氏的調查，共有四十二件之多（註）。

註：三杉隆敏「尋求海的絲路」一五二頁。

這座故宮曾被使用爲小博物館，故其中的部分古物是經常陳列的，而呈波斯風格形狀的白磁青花水注和扁壺，以及繪畫着生動的蓮花紋的白磁青花大碗等，眞有令人神往，不忍遽予離去之感。

此等古物一度曾爲阿巴斯王的蒐集品，旋如下文所述，奉獻於伊朗西北部的阿爾德畢爾的靈廟，復於現王朝建立之後，移於德黑蘭，而將其一部分再度歸還伊斯法罕，歸返故里了。

阿巴斯大王卽曾從明朝時代的中國，邀請陶工三百人前來伊朗，使其仿製中國陶磁，製造白磁青花陶器之人。大王的蒐集，不獨足以顯示其鑑賞力之如何高超，也足以顯示波斯不愧爲一藝術之國。

到此，我們暫時離開艾耳布士南麓地帶，而在橫亘伊朗北面的札格洛斯山北麓，試爲搜尋中國陶磁之旅，在此地我們也找到了幾處掘出中國陶磁的遺跡。

其一是素以中世大詩人沙荻和法費茲的故鄉而知名的，且距伊朗西南部之「薔薇」的設拉子城Shiraz不遠的卡斯里‧阿布‧納思爾 Qasr-i-'Abu Nasr‧另一是設拉子南方的費爾札巴德 Firuzabad，第三個是耶拉姆地方的古都蘇莎 Susa。

卡斯里‧阿布‧納思爾爲大都會博物館曾經調查過的遺跡，看一下前面提到過的美術部主任格魯貝所贈送的照片，所有出土的六片中國陶磁片，任何一種似乎都屬於宋、元時代的青磁和白磁兩者。後者的費爾札巴德，是來自設拉子亞洲研究所古拉克氏的紀聞，據說那裏也有不少宋、元、明初的種種陶磁片。第三處蘇莎的陶片，乃法國考察團，於發掘蘇莎遺跡時所發現，據寇克蘭氏說，那是在白地上用鐵繪所描成的花草圖形。（註），寇氏雖對這僅有的一枚陶片，認爲或屬於唐代之物，但如此遽下斷語似尙不易。

註：R. Koechlin: La Céramique Musulmane de Suse an Musée de Louvre. Syria, 1928.

阿得畢爾的陶磁

關於伊朗的話，已說的很長。現在把艾爾布士山脈和札格洛斯山脈合起來，再看看形成這重疊的山岳地帶的伊朗西北部和中國陶磁的關係，以結束伊朗中國陶磁的講述。

伊朗西北是一個草原、山地、溪谷與湖水交錯，生活舒暢的高原地帶，過了北部的亞塞拜然，便是高加索，越過西面的札格洛斯山脈，即可通往安那托力亞（土耳其）和美索不達米亞。正因爲它具備這樣的地理條件，故自古以來，即有種種民族進入，經常更換統治者，在不同的時代裏，造成獨特的文化。

公元前一千年前後，曾在此地方北部盛極一時的烏拉爾圖青銅器文化，札格洛斯山中的陸里斯坦動物意匠文化，在裏海西南山岳地帶所發現的阿姆拉修初期金屬器及文化等，其工藝主要均以動物爲圖案之構想，且無不具有令人矚目的新鮮感。

在伊朗西北烏爾米亞 Urmia 大湖的南方，有一名爲塔克梯斯雷曼 Takht-i-Sulaiman 部落，因爲地處山間極爲不便，但此地却有自巴爾的亞時代起，到薩珊時代極爲重要的遺跡，該處曾由德國中東考古學研究所的瑙曼博士 Rudorf Naumann 連年繼續發掘。惟在伊斯蘭時代，似乎已經不成爲個大的部落。

一九六八年，當在德黑蘭舉行第五次國際伊朗美術考古學會議時，瑙曼博士曾告我從此遺跡出土了外面帶有稜形的中國青磁片，大概是南宋——元代的青磁。由此可知在此伊朗西北邊地，也有青磁輸入，其滲透度深廣，實足令人驚異。

至於與蘇聯接壤地不遠的阿得畢爾靈廟中所收藏的大量中國陶磁名品，尤足令人驚奇不置。

所謂阿得畢爾，也是佇立於伊朗西北高原的一個小城市。

從阿塞拜然地方的主邑大布里士 Tabriz ，向裏海沿岸國境上的城市阿斯特拉罕 Astrakhan 前進之途，再往東折，靠裏海行走途中，即爲阿得畢爾城 Ardebil。這條道路雖爲穿越高原、山地和溪谷之間的壞路，但抵阿得畢爾後，則爲高原盡頭，由此往裏海，要下九十九盤坡道。

這一城市始自薩珊朝時代，到烏邁耶朝時代，還曾成過亞塞拜然地方的首邑。更是於近代伊朗建立強盛波斯人國家的涉發威朝祖先涉飛艾丁 (Sheikh Ishaq Safi ed-Din ?-1334) 誕生的聖地。

正如這種歷史淵源所詳示，在這城市的廣場上建有謝克涉飛 (Sheikh Safi) 的靈廟，一座威勢堂堂的清眞寺，即以他的陵墓爲中心，建立起來。

涉發威王朝（一五〇二——一七三六）一經成

立，卽將此靈廟奉爲祖先的靈地，尤其在有名的阿巴斯大王（一五八七——一六二九）時，不僅大事增修，且捐獻了當時最爲珍重的中國陶磁一千一百六十餘件（一六一一年），將之收藏於建在清眞寺


陶得畢爾靈廟（採自Pope 氏原著）

一隅的中國陶磁蒐藏室（Chini-Khāneh）。

在其後的三百年，阿得畢爾的名聲，和在謝克涉飛靈廟所收藏的中國陶磁之璀璨而輝煌的異彩，同爲普世所熟知，成爲很多外國旅客觀光訪問的目


伊斯法罕清眞寺圓頂

標，不過此地密邇俄國邊界，却時時有遭受敵人侵略掠奪危險之虞。爲了防患於未然，且恐靈廟地處邊遠，容易失落，故自現王朝成立之後，除幾百件破損過甚者之外，其餘悉數移往德黑蘭考古博物館，特闢一室展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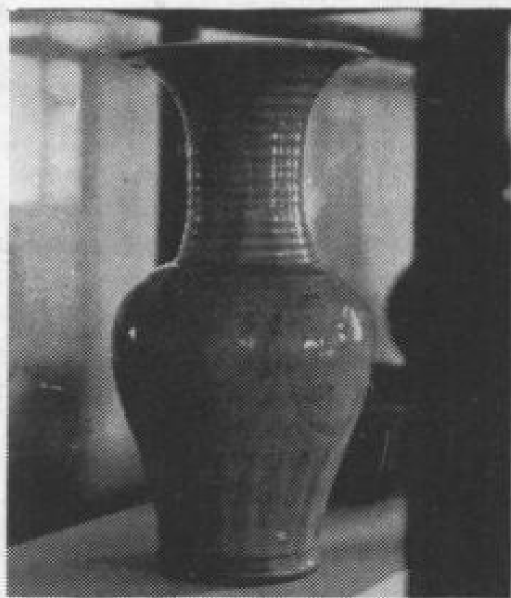
這是一件深得時宜的措施，這樣不僅確保了貴重品的安全，而前此必須前往邊界的阿得畢爾，方得一見或實行調查的優良中國磁器，很輕鬆地便可在德黑蘭從事欣賞。

阿得畢爾靈廟中的中國陶磁，咸屬阿巴斯大王的收藏品，眞可說是洋洋大觀，炫人心目，即使僅觀賞德黑蘭考古博物館一個房間所陳列的物品，也足以令人留連忘返，忘却時光之消逝。時代上自南宋起，經元而至明的前期，因爲阿巴斯大王的捐獻，是在一六一一年，故這種時代的起訖，自屬當然。

展覽品的種類有南宋和元代的龍泉窯青磁，南方白磁，元代的樞府窯磁、藍釉磁，貴重的元代白磁青花和明初白磁青花，益以元代、明初的珍貴無白青花和古五彩，以及戧金等。器形則有水注、梅瓶、大壺、小壺、扁壺、大碗、大盤等，種類繁多。尤其在器身上施以透雕的戧金水注，和有兩耳的角形扁壺，暨瓢形水注，以及帶有乳房形注口，名叫Kendy的水注等等，形狀既特殊，亦所罕見，其中有非常珍貴的元代白磁青花鉅大而優良的作品，即使一件，亦屬難得，而此處竟有三十七件之多，眞令人瞠目結舌，驚歎不置。

總之，此等收藏品，與有大王之稱的沙·阿巴斯的聲望地位恰如其分，不但器形堂堂，姿態端莊，而且色澤花樣，無不精美絕倫，令人頓有重壓之感。這可稱得起是帝王蒐集的標本了。其中之花紋，亦有爲在中東之外所未見者。此點雖頗與伊斯坦堡砲門宮博物館收藏品的性格相似，但在質的方面，阿得畢爾似有兄長資格的感覺。此地也有曾見之於伊斯坦堡的收藏品，且曾引爲問題的盌心黏貼花紋的鉢子。但福建省、廣東省一帶窯業，專爲輸出用而燒製的粗雜盤碗之類，則絕無一件羼雜其中。

不過，令人遺憾者是，這些磁器雖然如此優良





阿得畢爾的青磁（上）
白磁青光（下）

，不知爲何，不是這裏就是那裏，總有些小傷，也許是稍爲顯眼的擦傷，或者又有些是出了釁。從這種傷痕來看，似乎不少都像曾經使用過的樣子。

最引人發生興趣的是收藏者的標記。標記是用阿拉伯文字，阿巴斯的名字多用微細小點連起雕刻而成。文字被巧妙地組成方形，宛如印章一樣，隨着看法的不同，或也可認爲它是一種點綴。

無論從任何觀點上來說，祗就這當前由數百萬金元起到數千萬金元價值的物品而論，它也就值得參觀者的票價了。因爲從十三世紀到十五世紀，究竟有些什麼優良的中國陶磁，輸入到這裏，它們都將歷歷在目地呈現眼前了。

有關阿得畢爾靈廟的中國陶磁，華盛頓富立爾美術館的波普先生 (John Alexander Pope)，在其大著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rine. Washington, 1956. 裏，曾有一段卓越的研究，茲摘記於下：

中國陶磁之在伊朗西北部者，除此之外，大布里士的亞塞拜然博物館，亦有所展覽。該項展覽是以白磁青花爲首，其次是白磁、五彩

、青磁和釉裏紅等，元末明初的白磁青花大盤、梅瓶、大碗等，爭放異彩。

此等磁器，殆咸爲亞塞拜然地方的清眞寺或豪族邸宅之所藏，是以今後或仍將繼續發現。我們正以快愉的心情期待着。

又繼伊朗領亞塞拜然之後，俄領亞塞拜然地方諸遺跡，即卡巴拉、阿蘭、卡拉、古格養希城，及巴庫等地，據說也有精美的中國磁器出土。就中據說曾出土了一種通稱爲馬塔班的淺綠色磁器，這恐怕是明代龍泉窯的青磁。此等遺跡的發現均以中國所發行之『歷史研究』（一九五八年第二期）所發表的基濟氏（A.C.B. K[illegible]）以「中世紀時期阿塞拜然與中國的經濟和文化關係」爲題的論文爲根據（中文有寇瑟譯本），但可惜除了知道巴庫是瀕臨裏海的地方之外，此等遺跡究在何處，則無從查考了。

但無論如何，自高加索山脈南方的俄領亞塞拜然諸多遺跡之中，能發現中國明朝的青磁，實有注意之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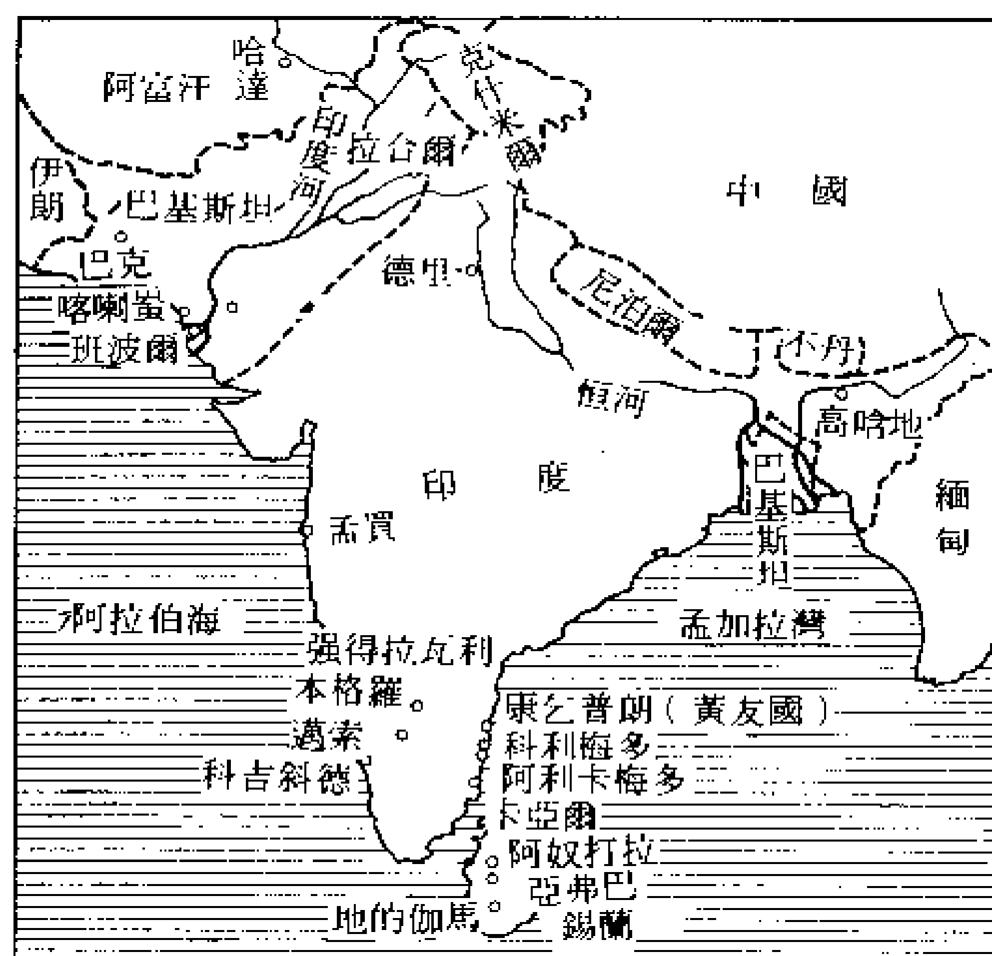
又自十七世紀中葉以降，清代磁器大量輸往中亞諸國一事，永貴的『回疆志』卷四，椿園七十一『西域聞見錄』卷三，哈薩克條下，均有說明，關於它的狀態，佐口透氏更於其所著，『俄國和亞洲草原（吉川弘文館、昭和四十一年）中，隨處涉及。



七、印度河口廢港訪問記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交通與文化的十字路



阿富汗無海而多山，北半部有四時積雪的興都庫什岩山，其間縱橫穿插着無數的深谷。七色眩目的岩石和水的對比，美得無法形容。南半部則到處是無

垠的沙漠和草原。聯繫東西方世界和南北地域的貿易道路，就在這種劇烈起伏之中，縱橫地擴展。

那麼，通過阿富汗的貿易道路，是從那裏到那裏的呢？從伊朗越過東方國境的道路，進入阿富汗，通過它的北邊，然後又分爲到東北方的中亞道路，和通往東南方巴基斯坦的道路。前者通往中亞的道路，要經過帕米爾和天山山麓而達到中國，後者就是越過蘇拉曼山脈 (Sulaiman Range) 以達巴基斯坦的道路，接着便抵達南亞寶庫的印度，又自伊朗東南行，經阿富汗南部，再沿阿拉伯海穿越俾路支，即可出至印度河的下游地帶。

相反地，則從中國或印度出發向西方的伊朗地方，或地中海岸旅行之人，則多先到阿富汗，然後再轉向西行。

在如此情形下的阿富汗地域，雖在目前仍難免有內陸國家之歎，可是在往昔它實處於連結往來於東西方貿易路上，隊商的輻輳地帶，物資的流通既極頻繁，同時，具有特色的文化，也隨着發生。此即所以有人把古代和中世的阿富汗譬作「文化的十字路」的原因。試看自中國前往印度之人，無論四世紀的求法僧法顯，或七世紀的玄奘三藏等，亦均係經過阿富汗而進入天竺。

中國的物資等項，很早便由此地經過，運往南、西南方，有許多考古學的事實，足資佐證。在首都喀布爾之北，有一名叫貝哥拉姆的遺跡，那裏有二世紀時貴霜王朝時代夏季離宮的遺址，是和犍陀羅（健馱邏）美術及大乘佛教關係很深的喀尼西卡王（約一四四——約一七三年）等人，避暑之地。從該處王

宮寶物庫中，曾發現大批當時被譽爲印度工藝之精華的精巧印度象牙細工，和良質而又豪華的羅馬玻璃器皿，以及青銅像等物，自其中也發現了中國漢代的漆器，因此，中國漢代的玉製刀裝具，也曾發現於貴霜時代都市遺跡之隣的巴基斯坦之塔克西拉。

漢代以後，因爲中國與中亞的關係與年俱增，故可說很多的中國產物，都運來了此地。因此，無疑中世以後的中國陶磁，也一定曾爲此地的王室和豪族之邸宅所使用，惟迄今仍無正式的研究報告論文，誠屬憾事。

現在試舉此地與中國陶磁結緣之事的兩個例子。其一爲斜里戈爾戈拉的廢墟，其二則爲在首都喀布爾之見聞。

這個叫斜里戈爾戈拉 (Shari-Ghorghora) 奇妙名稱的遺跡，位於阿富汗的中央、爲與都庫什山脈所包夾的巴米安 (Bamiyan) 盆地之中。

提起巴米安，任何人都會聯想到在盆地北側斷崖上所雕刻的無數岩窟寺院，以及在寺院羣東西兩方聳立的巨大大佛立像。西面那座鑿開岩壁而彫刻出來的大佛，高五十三公尺，位於東方的那座，則有三十五公尺高，無論何人看到了這種大得離譜的形像，也都要發出驚歎之聲吧。以我的身高來比，還達不到它的裾子。大佛的面部雖已被後來佔據此地的回教徒，弄得稀爛，但在頭上天井部分，尚僅有的一些殘留部分佛、菩薩、以及太陽神的壁畫，比較日本法隆寺的壁畫還要古老，由信仰所反映的美，眞値得讚歎。

所謂千里尋山不辭遠，此時此地，實在深感確屬不虛此行。「大唐西域記」的作者唐僧玄奘（據考該書係唐玄奘所譯——譯者），赴天竺取經途經此地，曾向大佛禮拜，據他的記述，當時大佛遍身塗有金色，可說是金光晃曜，寶飾煥爛。

以大佛和岩窟寺院聞名於世界的巴米安盆地，乃一在山巒重疊的興都庫什山中很少見的寬廣盆地，但在盆地中央却有一個呈圓錐形而不甚高的小丘，這是一個在所有的斜面上佈滿了頹壞廢屋的山丘，丘頂上寺院等尙模糊地剩有尖塔的形跡。循着環山的小路前進，在廢墟之中時見波斯陶器的破片，並偶有白骨的小片混雜其間。稍稍誇大其詞地說，

多少有些鬼氣森森之感。導遊人之所以不愛到此地，也是怕召來什麼不吉之感。

這一遺跡正是一二二一——二二年，被蒙古帝國成吉思汗所作雞犬不留式徹底破壞了的巴米安王之都城。當時巴國是國富兵強，國王對入侵的蒙軍，曾作激烈抵抗，成吉思汗的孫子在此喪命。成吉思汗聞報大怒，遂親率大軍屠城。所謂斜里戈爾戈拉，亦即妖怪之城的意思，它說明了當時虐殺的慘烈情景。

一九五六年五月，我在廢屋地板上，檢拾了散亂的波斯陶器。其中雖有阿拉伯格式用綠彩刻線文所裝點的美麗陶片，但遺憾地是並未發現中國陶磁。但六十年代之初，在查訪過遺跡的菊地三郎氏所蒐集的陶片之中，却發現了一塊青磁的小小斷片。它是十二——十三世紀時的龍泉窯青磁片。這證明阿富汗也有過青磁。我安心了。

我記得，當我造訪阿富汗時，該國的一位有地位的考古學家柯扎德（Ahmad Ali Kohzad）曾說：在巴米安附近，有一個也是被成吉思汗滅亡的斜里·周哈克（Shari Zohak）廢城，從那裏也曾發現過中國陶磁。不過出土物品究竟是何種類，且係何時代的出品，亦無所知，故對所說自屬將信將疑，但設如斜里·戈爾戈拉曾有青磁出土，則斜里周哈克亦有中國陶磁出現，自不足奇。

說到這裏，我想起了首都喀布爾一條大街上的一家商店之事。

喀布爾城多有由狹窄曲折的街道所夾峙，並由厚泥壁所建造的整列房屋遙相對立的道路。由於行人稀少，所以行走起來，祇有影子隨在身後。稍微繁盛的地點，在面對街道的小屋中，工匠們一方面遊目外觀，一方面做着手工。這是一個具有中世風格感覺頗強的城市，雖然如此，但沿着喀布爾河的一角，也有近代化的街道，陳列高級洋貨的櫥窗，也隨處可見。

在這條大路的街角，有一家大綢緞商，一進店內便可看到在紅色豪華的阿富汗絨緞類的背後，放着幾塊十四——十五世紀明代初期的青磁大盤。那是畫着微帶朽葉色的深青綠色的盤子，在盤底座裏，彫刻着用點連綴而成的阿拉伯文物主姓名。這是和伊朗阿得畢爾收藏的中國陶磁上所彫刻者，是同一性質的印章文字。阿富汗也同樣將所有者姓名彫刻於磁器之上。由此可見他們該是如何珍視中國陶磁了。這店裏所有的青磁大盤，或原爲喀布爾或其

附近之禮拜寺與豪富人家所有，因之可以推測出十四——五世紀時，青磁業經帶進此地，這是沒有疑問的。

我因爲尚須繼續長途旅行，所以雖想購買，也不能購買，眞使人一籌莫展，但卒爲當時旅居喀布爾的齋滕槙年所購得。其後的十三年，這宗青磁或已平安在日本定居了吧，我不禁期望還有相見的一天。

在阿富汗境內想仍有很多埋藏中國陶磁的遺跡。我衷心盼望它們能早一些重見天日。

從阿富汗到巴基斯坦

凌晨由喀布爾搭乘巴士出發，越過拉它伴德山隘口，由高原向東走下，不久便到了受羅畢（Sorobi）水庫。喀布爾河流下索羅畢溪谷，其後万景觀的確使人喜悅。從崖頂的道路俯瞰衝擊岩岸的激流，竟忘了時間與危險。少間進抵低地，河川和原野，都變成了穩靜的風景，山谷豁然開朗，草木的綠意增多。因爲在這一地區發現了很多具有魅力的塑造佛像，所以有名的哈達（Hadda）遺跡，也就在這裏。哈達離開公路很遠，到那裏必須從傑拉拉巴德（Jelalabad）折而往南。面對國境要衝傑拉拉巴德城市，夏季的炎熱，是世界有數的，一般都說它是與死神爲隣的地方。一個人在那裏祇能說稍微設法減輕些炎熱，但決無任何保證，因爲通風非常壞，無論怎樣也是一個熱地方。左近的哈達當然也是一個夏季難住的地方。

過了寬濶的傑拉拉巴德盆地，再前行不久，道路轉爲上坡，片刻之間即到了玆博隘口（Khyber Pass）。在上古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前後的時代，由中亞方面向印度河流域移動的印度阿利安人，以及公元前四世紀末遠征東方的亞歷山大等，和近代十九世紀中葉的阿富汗戰爭時，侵入此地的的英國軍隊，全都是由此歷史上有名的隘口通過。頂上的西側是阿富汗，東側則是巴基斯坦的大平原。

巴基斯坦的中國陶磁

巴基斯坦曾經是構成印度共和國的一部分，它是於一九四七年脫離印度而獨立的回教國家。也是東西兩巴基斯坦之間，相距很遠的國家。由印度河水沖洗而變成膏腴的土地，世界最古文明發生的地城之一（印度文明）。

談到巴基斯坦便會想起這般事情，總之，它是一個瀕臨阿拉伯海，擁有乾燥的南部喀喇蚩地區、草原的，且自古即付在歷史舞臺上登過場的北部白沙瓦、塔克西拉地區，在喀喇崑崙山脈的山腹有吉爾吉特地方，以及若干中心，無論在地理上或歷史上，都是變化孔多的南北細長之國。

是以無論專就那一地方看，其共同之點，即自南亞方面傳往西亞地方的出入口。故自公元前三千年紀的印度文明之時代起，即以此地爲中繼基地，南亞地方的種種物資盡都經此往西運送。棉布、寶石、香辛料等，自中世以後又加上了中國陶磁。

瀕臨阿拉伯海的喀喇蚩，是巴基斯坦的大門。這個港口雖然周圍爲不毛的沙漠所包圍，可是渡越印度洋的物資，無論來自東西，都要運至此地，再往腹地運轉，或再向波斯灣各港口運銷。

喀喇蚩的發達繁榮，還是近代的事，在中世紀也同此擔任過重要角色者，是同樣面對阿拉伯海、距喀喇蚩並不很遠的班波爾 (Banbhore) 廢港。

班波爾遺跡的中國陶磁

喀喇蚩的中心部分，雖然是高樓櫛比的近代都市，但走至郊外，放目遠眺，但見在一望無際的沙狀土地上，散亂地生長着灌木和矮草，完全是一片荒蕪的土地。但在許多地方仍可看到部落，隔些距離還有相當大的城市。

塔它 (Tatta) 是在喀喇蚩東方約一百一十多公里的一個有名的宗教都市，距離印度河很近，在巴基斯坦南部，是一個很少有的適於眺望附近的地方。那裏有印度和阿富汗樣式的壯麗寺院，和回教聖人的華麗墓廟等，朝聖者很多。

由和這樣城市聯絡的喀喇蚩——塔它街道的中間部分起，轉而向南之處，即是班波爾城遺跡的所在處。雖然說是很近，從喀喇蚩算起，也有六十四公里，其所以不使人感覺那末遠隔者，乃是因爲用大陸的標準來衡量的緣故。

站在這有遺跡的小丘中央部分遠望，南方有從阿拉伯海灣進來的噶洛小浦 (Gharo Creek) 相通，在越過對方濕地的遠方，阿拉伯海的青色，發着晦澀的光輝。無人居住的廢墟，令人感歎歷史的劇變，在烈日之下更頻生人類生命的貧困與苦悶之感。其中央部分之所以成爲較高的小丘，乃是因爲歷

次的重建，在長久期間佔用過的關係。

這一街市是於公元前後的貴霜時代開始，用做瀕臨阿拉伯海之海港的。挖開中央的小丘，發掘者便覺察到，貴霜時代的土層非常厚。

不過這一城市於八世紀之初，也曾被向東進展的伊斯蘭軍隊所佔領，並成為他們的據點。根據記錄，七一二年，伊斯蘭教徒莫罕默德．賓．卡西木 (Mohammed bin Qasim)，奪取了印度河口的重要海港迭巴爾 (Debar)，並將其納入伊斯蘭治下。據推測，此一廢墟，大概正是這一海港。

嗣後到了薩拉森帝國時代，隨着波斯灣、印度洋的貿易逐漸發達，這一海港遂成為扼阿拉伯海入口之商業和貿易上的重要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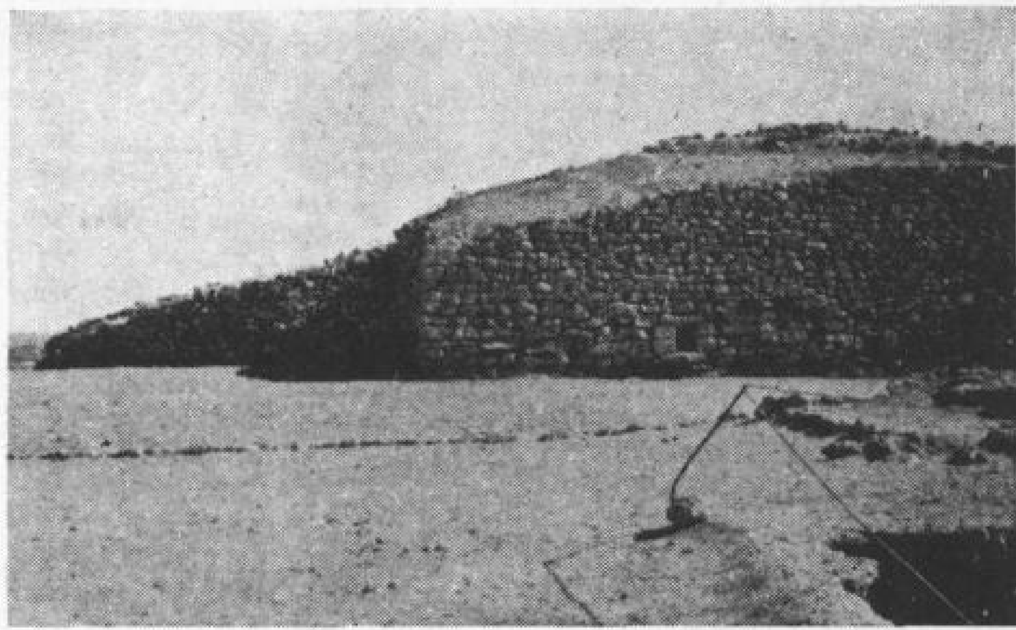
前面所說的中央小丘，對外方面是由帶有連續突起（雉堞）的牢固石築城牆所圍起，內部尚留有禮拜寺以及許多其他大建築物的痕跡。四壁的城門成升形，這是一座非常小心謹愼的堅固建構。瀕海方面的門，造成立卽可以通往海港停船場的樣子。

城牆的周圍有市街，使船能靠岸的海灣，引到市街之旁。在面對街道的一隅，有擺放許多染缸的染房遺址，這說明此處曾將特產的木棉類，染成種種顏色，向東西方的世界輸出。往來於南海的阿拉伯船員們，在此卸貨之後，暫行登岸，到繁華場所尋樂，然後再裝載新的商品，各奔東西。可是，這樣繁華的碼頭，十三世紀之後，遽呈衰退。究竟是政治情勢之變化使然呢？抑由於印度河口位置的變化而致此呢？當然後者也有可能。

巴基斯坦是回教國家。因此，它對在薩拉森帝國時代曾經完成了重要任務的這一遺跡，似乎不會不加重視。於是在獨立後的民族主義和伊斯蘭主義推波助瀾之下，自一九五八年以來，便開始着手了班波爾的發掘調查工作。發掘工作的負責人是以勘博士 (F.A. Khan) 為中心的巴基斯坦考古局的一些學者（註）。

註：F.A. Khan: Banbhore,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Recent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t Banbhore,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nd Museum, Revised ed., 19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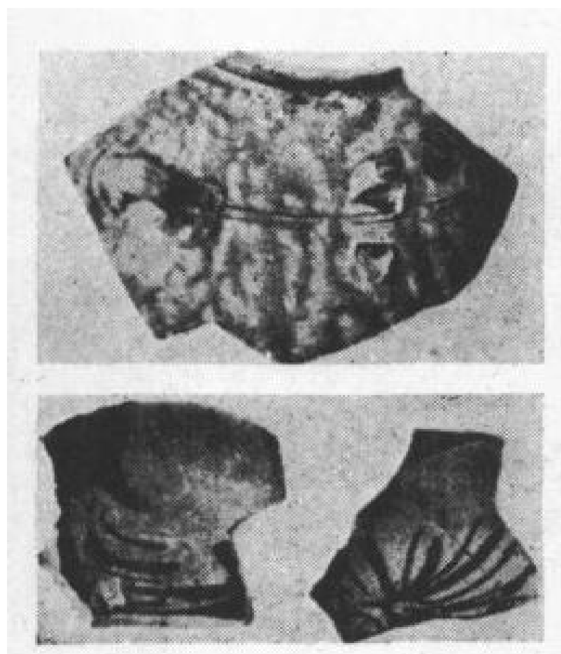
調查的結果，舉凡都市的情狀，歷史的實態，以及經濟活動的一面等等，無不臻於明瞭。而最足說明這段故事的出土物品之中，竟出現了大批的中國陶磁。



班波爾遺跡

從這裏發現的一羣中國陶磁，極耐人尋味。首先是晚唐越州窯磁的水注，由這件東西便足以說明九世紀時，此地早已有了中國陶磁。同時在湖南省長沙製造，於黃褐釉磁之上，用綠色畫着花樣的大碗破片之被發現，實屬稀罕（揷圖下方）。長沙窯在生產地的中國，是極少被人介紹的陶磁器（註），可是它却在中國以外的印尼，遼遠的埃及和伊朗發現。現在從班波爾出土了此等陶磁，證明了連繫印尼與伊朗之間，九世紀時代之陶磁所經行的道路，非常值得慶幸。此外，此地所說之長沙窯、乃與一般的中國陶磁多少有些不同的色調和設計，我們由此也可窺知這乃是專為輸出，而纔採取了這樣的方式。

註：「長沙瓦渣坪唐代窯址調查記」『文物』一九六〇年三期。「中國二千年之美」展覽會目錄、一九六五年。



出土的中國陶磁片

其次關於十——十三世紀宋代的陶磁，大致均無遺漏，數量與種類亦多。在那裏曾找到有線彫花樣的宋代初期越州窯磁破片，浮出美麗蓮瓣的華南白磁片，還有宋末——元初的龍泉窯青磁片。諸如此等種類的陶磁片，從中東的任何遺跡都有所發現，所以這祇能算是一般的狀態。此外，也曾找到過據推測或係廣東省方面所製做的飴釉四耳壺破片，與它同一種類的東西，我曾在紅海岸的愛札布遺跡檢拾過，一陣懷舊之感不禁湧上心頭。

遺物現在悉數陳列於喀喇蚩國立博物館，和班波爾的遺跡博物館，這些沉默的陶磁片，已經對我們說明了，實際上自九世紀時起，一直到這一城市的滅亡之時爲止，還仍然繼續有中國陶磁輸入。尤有進者，在接近印度河口的此一港灣，中國陶磁在其輸入過程上，必定有其種種不同的事體。在每一塊壞成了小片的陶磁之上，那種艱辛宛如記錄紙一樣，點點滴滴地滲透過來，打人胸臆。

運抵班波爾的東亞商品，更溯印度河而運往腹地，或逕運往阿拉伯海各沿岸地方。

布拉米那巴德

前面說過班波爾即在印度河河口附近。印度河是巴基斯坦的生命線。以它的流域爲中心，曾發生世界最古文明之一的印度文明，即在其後，也一直供應居住此地的無數人民以生命之水。不僅如此，這條河流也是連絡阿拉伯海和印度西部腹地的寬大道路。

溯印度河的河口而上，在其下游新德省的一部分，有一名爲那瓦普夏(Nawabshah)的縣分，布拉米那巴德(Brahminabad)城的遺跡，就在那裏，該處位於新德省政府所在地海德拉巴(Hyderabad)之東北約八十公里處，乃一邊境地區，它曾位踞印度河舊河道之畔，從七世紀到十一世紀，曾爲印度河的商業中心。但以一〇二〇年遭受大地震震災，而被完全摧毀，僅有若干小村殘留，是以自此城市遺跡之出土品，咸爲十一世紀前半以前之物，自無待申論。

此一遺跡因其具有如此特殊性質，故頗爲各方所矚目，早自十九世紀的一八五四年，即由貝拉西斯 A.F. Bellasis及李查遜 C. M. Richardson兩人所調查（註），以後，自此發現的多數陶磁片，都已送往大英博物館。據說在大英博物館中，則由當

時對中國陶磁之研究，具有最高權威之譽的霍布遜氏 R.L. Hobson 加以調查，自其中曾發現了中國青磁、白磁和褐釉陶磁之破片，給當時的學術界平添不少佳話。

霍布遜氏將那些陶磁片，根據器形、釉彩和素地等各點，共分為六種類型（註），這種分類方法，當前也有些不盡合適。但依照報告論文所揭載之照片看，其中似乎還包括着類似九世紀越州窯磁之破片。不管怎樣，以時代的幅度而論，大致是自九——十世紀的唐末、五代起，下迄十一世紀前半的宋初時代。

註：R.L. Hobson: Potsherds from Brahminabad (Transaction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1928-30).

因為我對此地出土的陶磁片並未親眼目睹，故亦無法確實指明，不過中國陶磁之運往距離海岸尚有段路程的城市，這在說明中國陶磁之擴散到此等腹地的路徑上，頗為貴重。在布拉米那巴德的中國陶磁之中，以班波爾港為中間轉運地，而送至此地者當不在少。

旁遮普和馬克蘭地方的中國陶磁

在巴基斯坦，更於印度河上游旁遮普地方的幾個處所，發現了十五世紀前後的明代白磁青花小片，它們是由斯坦因博士所採集（註）的。這些地點是擴散在鄰近印度河口的班波爾、溯此而上的布拉米那巴德、以及更在上游的旁遮普地方。

註：R.L. Hobson: Pottery Fragments from Southern Persia and the Northern Punjab (Aurel Stein: Archaeological Reconnaissances in North-Western India and South-Eastern Iran, Appendix A. London, 1937).

除了沿印度河向北伸展的路線之外，中國陶磁另外還有運往巴基斯坦西部俾路支地方面臨阿拉伯海的馬克蘭地方者。此亦值得一述。於一九二七年到二八年，曾經訪問過這一地方的斯坦因博士說，他曾在馬克蘭地方山裏的科魯瓦地區（Kolwa）之帕克（Pak）遺跡，找到一片中國陶磁片（註一），其後據傳又於一九三一年至三二年的調查旅行中

，從馬克蘭地區的幾處，發現了十世紀的青白磁（註二）。中國陶磁是沿着阿拉伯海沿岸，向西輸運，緊接着就運抵伊朗各港和內地。

因此，以班波爾為樞紐，而運至巴基斯坦的中國陶磁，至此之前又是經由那些地區，纔抵達此地的？這就要再查考一番印度和錫蘭了。

註一：A. Stein: An Archaeological Tour in Gedrosia (Memoirs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No. 43, Culcutta, 1931).

註二：R.L. Hobson: Pottery Fragments from Southern Persia and the Northern Punjāb.



八、南海的青磁

——由印度到錫蘭

在邁索州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進入了印度南部的史跡與美術意外優美的邁索州。邁索的風物清幽，使人心情爲之一暢。自十月初從德里出發以來，經馬迪亞布拉底修州、孟買州、海得拉巴州，一直南下，其間我的心靈不知有多少次，竟被印度深不可測的社會陰影所奪佔，同時也深被多種多樣的住民、複雜的人性、以及壯偉的自然與酷烈衝擊。因爲印度有悠久而變化無常的歷史波動，和承受其苦難的人們爲求存而流露的呻吟，凡此都深深印入我的腦際生。

弗毫無疑義，是像巖石一樣紮下了根的印度人自身的面貌，也是吸收了周圍種種地區之人的血液之怪奇巨像的影子。其中深深地沉潛着波斯的、中亞的、阿拉伯的、歐洲的、更加上西藏、蒙古、印尼，還有中國的影子。簡直是令人生畏的沉澱着的印度社會。當人們往下發掘，不知道究將出現何物的有趣社會。——也許有意想不到的珠玉和瓦礫一起出土。令人感覺到的是那樣一個世界。

這對於我們人來說，恰如隻身一人旅行於深不見底的沼澤世界之中，未來的每一個日子，都像無限期待的重複，強烈緊張的連續。在激烈的活動一天過後，寂靜的夜晚來臨，對翌日行將出現，但不能預測的事象，我以半喜半懼的心情就寢，置身於這種思索之中，不知不覺地由內心所發出的要求休息之聲，油然興起。

在這樣時機，湊巧由德干 Dekan 的海得拉巴走到了邁索 Mysore 州的首府邦加羅爾，洵屬幸運。

何以在此心情感到寬慰?這眞是一言難盡。第一、印度北方和德干高原的風物，實屬荒凉，而比較起來，南方邁索州的自然，綠色既多，又有稻田的風光，總覺充滿着閑靜的情景，另外也許是因爲，所以令人覺得平添幾許柔情。加之邦加羅爾城市提供給我做宿舍用的提普斯魯丹的故宮，爲一歷史的建築，它那特有的穩重與調和使然吧。然而尤使我心旌搖動者，莫如在此後一週多時間，陪同我作歷史和考古旅行的印度考古局駐邦加羅爾督導官納特拉江先生爲人的隨和。

我之所以不顧路途之遙遠，涉足於邁索州者，

也有幾種目的。其中之一，自然是要一訪一些享譽極高的歷史紀念物和博物館，但另一個目的乃在於查訪當時極端引起我興趣的印度南方之巨石建造物——dolmen 形墳墓和石圈 stonecircle，以及屹立的史前期紀念巨石 menhir 等——更加當時名聲遠播的大規模新石器時代遺跡 chandravalli 的狀態。

由邦加羅爾啓程的我們這一行人，首先西行，先訪察了當時尚少爲人所造訪的貝魯爾 Belur 和哈列畢德 Halebid。這些地點都是自十一世紀到十四世紀，在南印度繁榮一時的霍伊莎拉國的都城遺址，但如今業經成爲恬靜的偏僻鄉村之田野，廢墟縱橫，其中牆壁尚有畫滿生氣勃勃之神像的星形構造的印度教寺院，靜靜地倒在那裏。

我們之所以繞了這樣一個大彎，而走向貝魯爾者，因爲是要從該處入山，以便前往千德拉瓦里遺跡，但抵達貝魯爾一看，方知它是位於邁索州和海得拉巴州交界的非常不便之處，同時又因要配合納特拉江的時間關係，故未能前往。

進入邁索乃是其後的事。這一古都正如預想中的一樣，是一座具有風格，頗爲安靜的城市，也是印度人在自己生活之中建造起來的繁華都市。古昔的邁索王宮，現已改爲故宮博物院，其所陳列的王宮蒐藏品，豪華耀眼，令人驚異。不過其中有一件日本用緋色皮條穿的鎧甲雖好，惜在腰間懸掛了一隻手槍，用以代替了日本刀，令人失笑，這足可說明一般對日本的了解，僅祇於這種程度而已。

千德拉瓦里的中國陶磁

在邁索城裏另外還有一所博物館。它是州立考古學博物館，保管着千德拉瓦里遺跡出土的新石器時代遺物。這也正是我欲見而涉獵以求的。在該館用手撫摸石器和土器之時，忽然察覺到在一個角落的微暗之處，散亂地放着一些貼在骯髒臺紙之上的幾枚陶片和古錢。頓覺這對我是一種切身的東西。

迫走近仔細觀瞧，毫不含糊，那是宋代龍泉窯青磁的兩塊破片，和白磁片一枚——乍見之下，看像是磁州窯出品，但實際上乃是華南福建、廣東省地區之窯的白磁——益以被推想爲中國南部之製品的黑褐釉陶破片一枚，與經判讀爲北宋神宗（一〇六八——八六）時代的「元豐通寶」貨幣，都被打

在一堆了。同時，該博物館對此等遺物，並不知爲何物，僅做爲「不詳」之遺物，隨意棄置。

凝視出土地點，記載着的是千德拉瓦里遺跡。後來才知道，從千德拉瓦里還曾發現羅馬時代的貨幣。據此可知，千德拉瓦里還不單是做爲一個新石器時代的遺跡，極爲重要，卽在羅馬時代的古代，和十世紀以後的中世，也成了一塊緊要的土地。由此附近所出產的良質松綠石等寶石，將羅馬和中國等遠方的珍貴物品，招到這邊遠之區。



邁索的瑪哈拉加故宮博物館

千德拉瓦里和中國陶磁——這對一位長久期間延佇等待的友人，而且在一個意想不到的地點碰面的驚喜，眞使我雀躍萬分。這的確是一種發掘品。而且還和鑄有北宋元豐（一〇七八——八五）年號的貨幣，同時被發現。這大概是於宋代携至印度港口，再運到邁索州腹地的東西。

這就是撒拉森國的貿易商人，當其跨越東中國海、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等三個海洋從事活動之時，將龍泉窯青磁、華南各窯的白磁以及黑褐釉陶，由杭州、泉州等港裝船，運往南方各國銷售的證據。

在邁索與中世中國陶磁的遭遇，使我的心情至爲輕鬆。我已遠在埃及和東非海岸各城市，以及美索不達米亞、伊朗，更從巴基斯坦等國的遺跡，發現了早自九——一〇世紀的越州窯系之靑磁、白地

褐釉的長沙窯磁，也發現了十一——十三世紀的宋代青磁、白磁和青白磁。然在我直迄目前爲止的印度旅程之中，僅曾在孟買或海得拉巴的博物館中，見到過十四——十五世紀以後的青磁和白磁青花，再未能接觸到較此更爲古老時代的作品，深覺怪異。但現在竟不期邂逅到悉心尋求的十四——十五世紀以前的中國陶磁，眞令人喜出望外。

這種歡欣更在印南的繼續旅行中，於行抵科羅曼德海岸 Coromandel Coast 的邦地塞理 Pondicherry 地方時，收穫更爲豐碩。

科羅曼德海岸的中國青磁

任何人都知道在印南的科羅曼德海岸，有一個馬德拉斯城，這城確實像英國人的建築，成排莊重的紅磚建築物，襯托出它是一個極爲安定的城市。現因空運發達，雖然稍覺冷清，可是往昔却是一個聲名遠播的海港，如果屈指計算，現在仍可居五位之中。

由馬德拉斯沿海岸乘車南下，約六小時抵邦地塞理城。因曾長期爲法國殖民地，於一九五四年方歸還印度，當我於一九五五年終前往訪問時，仍有半數戴法式帽子的警官，與半數印人警官，擔任街市巡查工作。顯得寂靜的街市狀態，實屬漂亮，令人發生沾染了法蘭西香味的感覺。這和半固的有如倉庫之感的馬德拉斯，恰成爲對照的城市。

站立於從渺茫的印度洋上擁來的浪濤，濺滿白色飛沫的海岸，據說法國人也要想起故國比斯開灣的情景，發出一抹鄉愁。

由此約再南下二〇公里，在海岸近處有一阿里卡梅杜 Arikamedu 部落。是一個貧窮而落後的部落。自公元前一世紀後半的羅馬皇帝奧古斯都（前二十七——後十四）時起，到二世紀末，該處曾是羅馬人的居留地。如今其遺跡仍殘留於椰子林中。當時這一城市的名稱似爲波多克 Pódouké，沿河尙留有貧寒人家的遺跡，地板和牆壁的殘骸，仍可於河岸及溝瀆之間見之。附近一帶似全爲二千年前冒險的通商精神所凝集，迄今猶有生氣。聚集於此地的羅馬人，帶進銅、錫、玻璃和羅馬獨特的阿勒泰因陶器，以及葡萄酒等物，而由此地買進寶石、珍珠、象牙、龍目或胡椒、木棉等物，以之向羅馬領的東方和波斯輸出。



阿里卡梅杜河畔的遺跡

故造訪此處遺跡時，到處都可看到零亂的羅馬玻璃和裝飾品的材料，綠釉子陶片在地上扔着，遺留着用於染出口木棉的染缸。我們一方面檢拾此等遺物，同時也體會到，當時印度洋的貿易，該是何等旺盛。

此城卽在羅馬人撤退之後，由十二——十三世紀仍繼續爲一繁榮的海港，直至其後方形衰落。

進入本世紀後，此遺跡的獨特重要性，又重新成爲問題。故自三〇年代起，經常有邦地塞理的法國考古研究所人員，來此發掘（註一），戰後的一九四五年，更由惠勒博士R.E.M. Wheeler等，作了大規模的調查（註二）。

註一：P.Z. Pattabiramin: Les Fouilles d'Arikamedu (Podouké), Pondicherry, 1946.

註二：R.E.M. Wheeler, A. Gosh, Krishna Deva: Arikamedu, an Indo-Roman Trading Station on the East Coast of India. Ancient India, No. 2, 1946.

然自此奇怪的遺跡之最上層，除發現了羅馬時代的遺跡遺物之外，還發現了美麗而完整的宋代龍泉窯青磁大碗，它是由法國調查隊所發現。惟因該碗送交德里國立博物館展覽，故未得親眼目覩，殊爲遺憾。

可是，當我走進小型、但很整潔的法國圖書館附屬的邦地塞理博物館一看，在它的抽屜裏却有許多中國陶磁破片。蒙帕達畢拉明先生的好意，很親

切地許我調查，結果也發現了外側有稜的龍泉窯青磁深碗的破片，和小壺的一部分，青白磁盤的破片，或時代更可上溯至九——一〇世紀的越州窯磁盤破片（揷圖）。最爲難得的是，在這裏面還混雜着北宋末徽宗宣和年間（一一一九——一一二五）所鑄造的「宣和通寶」。據此以觀，此等物品大體上都可能是自北宋接連南宋的時代，亦卽十二——十三世也曾從上層和地表發現了十四片宋磁。此等破片均屬越州窯磁和龍泉窯青磁的破片和磁州窯的陶片，但因其與十一——十二世紀的喬拉期的銅幣，在共存狀態下出土（註），故其被帶進此港使用，亦應約在此一時代。復因其與法國調查隊所調查的結果一致，故深感興趣。

註：R.E.M. Wheeler: Arikamedu, pp. 91-92.

像這種陶片與宋錢同時出土的情景，恰和邁索州千德拉瓦里遺跡的情事相同。阿里卡梅杜也許因其曾爲羅馬人居留地，而繁榮一時的商港之關係，其生命一直延續到中世紀，中國商品也不斷地由此卸貨上岸。


邦地塞理博物館所藏阿里卡梅杜的

科里梅多的收穫

在邦地塞理附近發現中國陶磁之處，還不僅此一地點。邦地塞理西北方約一〇公里處的科里梅多

Korimedu 遺跡，也有宋代的陶磁片散落各地。

科里柯多是一個稍稍離開海岸的新石器時代遺跡，那裏有像血一樣濃的赤褐色土的臺地，由深而廣的浸蝕溝，縱橫地劃成段落。行走在臺地之上，到處都可在地面上看到火石質和玉髓質的細石器（如石刀石核之類）與蛤刄的磨製石器和赤褐色的土器片，它就是這樣一個地點。

一九五五年歲伊云暮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我在上述的法國博物館帕達畢拉明先生的導遊下，來此造訪，當我一方面檢拾地上的石器和土器，在紅土臺地上徘徊放浪時，不期注意到在地上扔着的中國宋、元時代的陶磁破片。我在歡樂聲中一一拾起，它們竟是十二——十三世紀南宋時代，浙江省或福建省何處的窯所燒製的枇杷色珠光靑磁式碗的斷片，以及塗淡青白釉、嚴整的壺之口頸部分（內面呈蛇腹形）。此外還有十四世紀以後於福建省、抑或爲廣東省方面所燒製之素朴的白磁靑花破片——在我前此發表的論文「中世的中東及在南亞的中國陶磁」（『東方』第六卷第四期）之中，就該三塊陶片寫爲「塗有灰靑色釉藥越州窯系統之壺的口緣部及珠花靑磁碗的斷片，宋胡錄的白磁靑花斷片」（六頁），其後經檢點之結果，擬改正如上。

科里柯多現雖已成荒廢之遺跡，但自其亦散在着古代鐵器等之點觀之，該處似亦曾爲一中世之部落。

中國宋、元時代之陶器，居然能在這種地方爲人們所使用，僅就此點便可知中國陶磁的散播，該是如何廣大，實遠超想像之外。

宋元時代的中國陶磁，此外，從流經馬德拉斯州南端梯內威里縣 Tinevelly，庫姆拉巴爾尼河口的卡亞爾 Kayal 地方亦有所發現（註）

註：R.E.M. Wheeler: Arikamedu, p. 91.

在印度發現十四世紀以前的中國陶磁之處，爲數尙不甚多。然甚至在印度南部此等邊遠地方，均能出土此等物品，倘如能有一鄭重其事的目的前往探訪，各方一定還會有更多的發現。

十四世紀以後的中國陶磁

至於十四世紀以後的中國陶磁，在印度則所見頗多。在印度東端阿薩姆州的首邑告哈提 Gauhati 的造訪中，於其州立博物館中見到在其整建市街時，從住宅之下掘出十四——十五世紀的幾隻龍泉窯

青磁大平碗，在稍微破損的原形下陳列着。

但若說到這一時代的作品，我們便不必專仰賴發掘品，因爲傳世品亦所在多有。據大英博物館東方部長巴西爾・格雷氏的報告，曾做過印度鐵路技師的加拿大人威廉卡民茲氏，自一八六四年起至八三年之間，蒐集了六百餘個上自十四世紀中葉起，下迄十七世紀的中國陶磁（主要爲青磁和白磁靑花），據說其中多數是曾在奥德地方 Oudh（現在的烏達爾，普拉第須州的東部地方）當過太守之人的收藏。格雷氏的論文也提到曾在加爾各答任律師之職的威廉氏 N. T. Williams 所蒐集的一百幾十個的中國陶磁，亦多爲摩夕達巴 Murshidabad（現爲孟加拉國之北部）太守之所收藏（註）

註：Basil Gray: The Export of Chinese Porcelain to India.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Dec., 1967.



印度所收藏的中國陶磁
（據巴西爾・格雷氏論文）

旅行於印度各地，隨處可接觸到蒙兀兒帝國時代之王與太守們的居城，都經改爲博物館，而發揮其新的使命，在這些博物館裏，可說一定有若干十四——十五世紀起，至十七——十八世紀的中國陶磁在陳列着。此等陶磁恐均爲該城主人當時收藏的一部分。在德干高原海得拉巴的尼札姆故宮博物館等處，於一陳列室中，竟充滿了此等陶磁，幾有令人生厭之感。

不獨故宮博物館如此。孟買的威爾士王子博物館Prince of Wales Museum，原來就是爲做博物

館而修建的壯麗建築物。它位近海岸，是一個聳立於滿布花壇和廣濶用地的英式房屋，非常引人喜愛。這一博物館以收藏蒙兀兒時代孟買派的印度繪畫和南亞紡織品，特爲有名，其中有一室，衆多的陶磁器類，擁擠在一櫃櫥之中。那些陶磁器以中國陶器爲主，此外又有栗田口一帶所燒的所謂薩摩的鮮艷物品。經過思考，分辨出這些中國陶磁，以十五世紀以後到十七世紀前半的明代青磁與白磁青花等二種，居於壓倒的多數。

印度自古以來，創爲經由海路做東西貿易的大中繼基地，貢獻極大。這從前文所述的阿里克梅杜遺跡，亦可窺見其實情，而且其重要性還日在增長之中。是以西部馬拉巴海岸的卡利刻特和圭隆兩港，都因由東方來此之中國客商，以及來自西方撒拉森的客商，而繁盛起來，一三四〇年左右曾有一位回教大旅行家伊本·巴拖達蒞臨此港，他在紀行裏很明白地指出，有載乘千餘人的中國大船渡海來此，又說中國陶磁在此交易，由此諸點，似均可藉以推定當時之情形。又據傳由馬拉巴海岸經常有發現中國銅錢之事（註），殆亦與此有關。

註：Yule and Cordier: Marco Polo, Vol Ⅱ p. 337.

同一時期，中國有「島夷誌略」一書，其中也說到卡利刻特和圭隆的繁榮情形，以及陶磁器之交易情事。而其實情，直到十五世紀初，鄭和率領偉大的海軍艦隊來此港口之後，纔向中國有了更詳細的報告。

十五世紀以後印度與中國陶磁的種種關係，一經追溯，便無不歷歷浮現在眼前。中國的貿易商們，將各種陶磁器分別運來此地，自然是爲了迎合印度王侯的嗜好。

在印度所能見到的十四——十五世紀以後的中國陶磁，幾乎均限於青磁及白磁青花，此點適足以說明當時印度貴族需求之方向。在青花之中，也有在中國所不能見到的、具有混合味道的特殊圖案的貨色。由此也可印證出印度人的癖好了。

旅遊印度，在如此思潮起伏的情形下，又平添了一層情趣。

在錫蘭（斯利蘭卡）

——從可倫坡往德地噶瑪

錫蘭島（現名斯利蘭卡）在印度洋上不但是貿易上的大中繼基地，在出土中國陶磁方面，也是令人難以忘懷的一片重要土地。

在具有阿里卡梅杜遺跡等印度科羅曼德海岸的彼方，有一個蓊鬱蒼翠的錫蘭島。該島古名獅子國，夙爲中國所熟知，自阿育王的古老時代起，即爲連結孟加拉灣和阿拉伯海的樞紐。東西兩方的來往船隻，都到該處停靠。

這種狀態直到中世仍舊未變，故由錫蘭發現十世紀以後的中國陶磁，自屬當然。我在錫蘭調查過的中國陶磁出土地，有以下幾個地方。

錫蘭京城可倫坡，是一個由椰子和芭蕉叢林、加以紅花覆蓋、果實豐富的南國，也許因爲它是個低地的關係，濕度高而暑氣凌人。雖在最涼爽的十二月和元月，被褥仍被汗水所濡濕。

不過，我們所關心的目標可倫坡博物館，院宇宏敞而房屋高大，以中國的陶磁器爲首，所陳列的種種物品，頗饒興趣。當中有一件十五世紀初，據傳由鄭和所率領的明朝海軍，戰勝並俘虜錫蘭王而在此地建立的漢文紀功碑。它雖屬珍貴，但文字磨滅，而不可辨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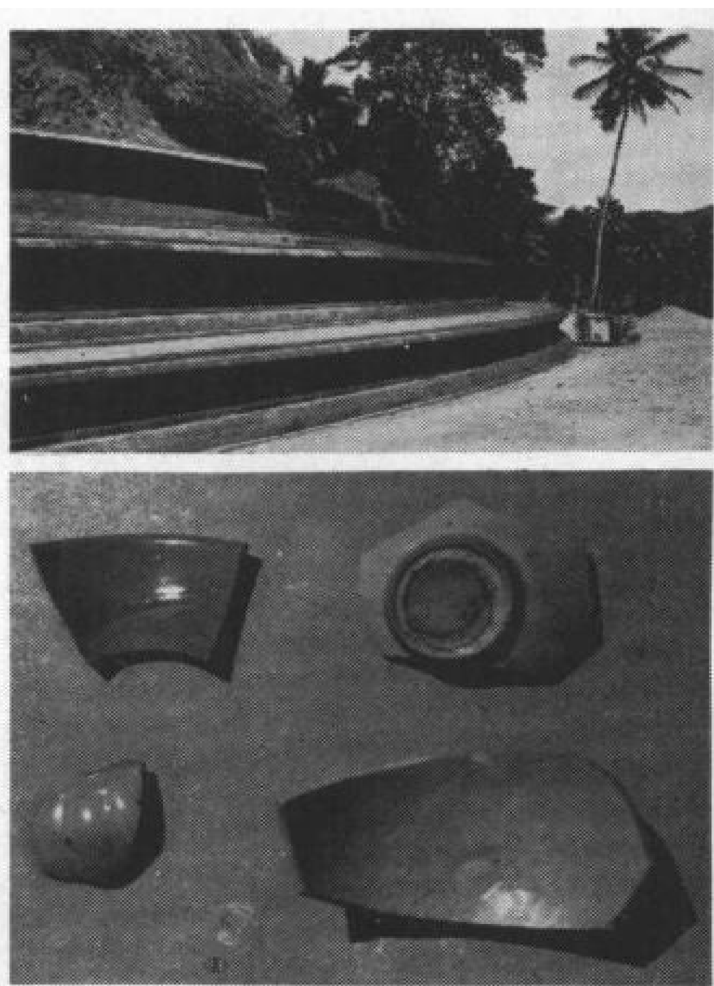
但一旦進入該島中央的廣大高原地帶，這種惱人的濕熱，立即消滅了大半，凉風爽快地陣陣吹過原始林的枝葉。位於可倫坡的錫蘭政府辦公廳，一到夏季便移往高原地帶的堪第 Kandy 之原因，即在於此。發現中國陶磁的遺跡，即爲這一高原地帶。

自可倫坡通往堪第的道路，於進入高原地帶之入口處，有一名爲克噶拉 Kegalla 的城市。從那裏更折而往南，經過田園與林木相連，八至一〇公里凸凹不平的道路，眼前便出現了德地噶瑪 Dädigama 小部落。這是一個不知經過了幾百年的古老部落，在那裏意外而孤單地聳立着一座大磚塔。據說它建於十一——十二世紀。在如此荒村竟有如此佛塔，頗能顯出佛教國錫蘭的面貌。

這座長年浸蝕於風雨之中的佛塔，自一九四七年起到一九五四年，因損傷過甚而從事修理，並藉機從事連年的調查，結果判明了其內部分爲十室（上部一室，下部九室），並由內部發現了水晶製的舍利壺，由黃金薄片壓製成的古拙可愛的小佛像，

以及其他格調高雅的青銅燈火器等物。

同時，由寶塔之外圍，又發現了很多宋朝的中國陶磁片。這些陶磁片，現在典藏於這一遺跡的附屬小陳列館，經調查，其中最古老的東西是十世紀前後越州窯系鉢子的一堆破片，接着便是十二——十三世紀的幾個美麗砧狀的龍泉窯青磁鉢的破片，以及清楚的青白磁可愛的柑子形小壺和四脚小香爐之一部分等等，一一陳列在眼前。另外還有中國南方福建、廣東一帶之窯所燒的飴釉四耳壺斷片（註）這完全是意外的收



德地嘎瑪寶塔及由其周圍所發現的中國陶磁片

註：此爲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九日筆者所親見。又關於此項之發掘報告書載於 S. Paranavitana: Report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Ceylon for 1947, 48, 49, 50, 51, 52, 53, 54. 及 Dădigama, Memoirs of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Ceylon, Vol. VII, 1955.

凡此十一——十三世紀的中國陶磁，殆均為奉獻於寶塔的物品，在錫蘭山中佛塔之前，能看到美麗的青磁斷片，頗與在埃及尼羅河畔接觸到中國陶磁的情景，有極為不同的親近感。不知獻納之人為錫蘭的信徒弟子，抑為從事貿易的中國佛門弟子了。

雅帕華的遺物

我因在德地噶瑪增長見識而獲得了力量，再在尋覓自雅帕華 Yapahuva 發現的中世中國陶磁的目標下，束裝更向高原的腹地進發。

雅帕華位於錫蘭北部的重要城市阿奴拉達普拉 Anuradhapura 之南方，約八〇公里處。附近有堅固的馬候城堡 Maho Fort，雅帕華的都市遺跡，則位於距該處四——五公里的東方，中央擁有一座巨大的岩山，在其廣濶的周圍，則由防禦的堡壘所環繞，錫蘭有很多這種形式的中世城市，以在峭壁懸崖上施以艷麗之壁畫而聞名的西基利亞城市遺跡，亦和它的情形一樣。此或為於遭受敵人攻擊時，據岩山以固守者。

對於雅帕華一地，於戰前的一九一一年，及戰後的一九四九年，曾作了兩次考古學上之調查，結果由此處發現了可觀的中國宋、元時代的陶磁，另外還有一三六四個年代相同的中國銅錢，同時出土（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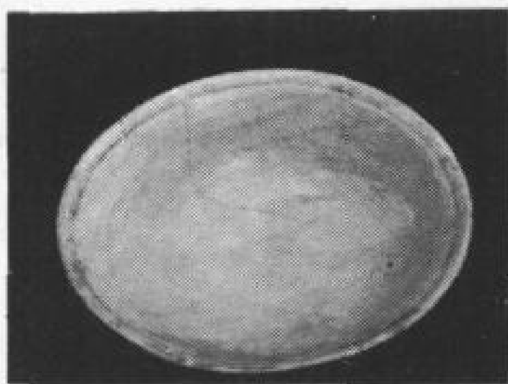
註：D. J. Devandra: Guide to Yapahuva Colombo, 1951.

在中國銅錢方面，是最初於一九一一年調查時，從南門遺跡中，發現了十二枚北、南宋貨幣，到一九四九年，又從現在佛寺前的東門附近，得到為數多得驚人的一三五二枚中國銅錢。在東亞以外地方，從一處而能發現如此衆多中國貨幣者，此外尚無所聞。而且，如屬海岸之港埠，自又當別論，此僅為一山中的城市耳。據我所見，此等錢幣幾乎悉為北宋及南宋時代之物，就中也有若干唐朝開元通寶，和一枚元代的至元通寶（一二四四——一九四）。顯然可以推測，此等貨幣乃於十二——十三世紀時所帶入。

自雅帕華出土的中國陶磁和銅錢，已移送上述之阿奴拉達普拉博物館，因為阿奴拉達普拉到十一世紀時，乃支配錫蘭島的大都會，壯麗的佛教遺跡櫛比相連，博物館的展覽品亦均為出類拔粹的上品

。欲研究錫蘭美術，尤其是有志研究佛教美術之人，無論如何，實有一遊此博物館之必要。


雅帕華的中國陶磁——青磁


白磁

看一下此處所收藏的雅帕華出土的中國陶磁，最顯眼的便是一隻外側有漂亮稜花的龍泉窯青磁鉢子。毫無疑義那是南宋時代十二世紀的作品，口徑二一公分，高九．三公分，形式至為合適而勻襯。它也可說是日本人最為欣賞的逸品。不才如我，曾在亞洲各處遨遊，所見有關龍泉窯青磁之出土品，至為繁夥，但在形式上和色調上，能像如此整潔的完品，尚屬少見。雖因長年埋藏土中，有些許風化之處，但在一見之下，仍令人之心靈深受感動。


青磁獅子狗的頭部

其次則為大小兩隻青白磁的鉢子，這也是值得一提的。這兩件東西雖然都有拼接之處，但仍具有完全形狀。大者口徑為二三公分，高七公分，薄薄的鉢面，確屬上品，它是宋代的青白磁決無疑問。

另一具用橄欖色青磁所製作的小獅子狗頭部，尤為逗人喜愛，牠的表情極為尖銳，原形頗有與日本古瀨戶獅子狗相似的感覺。祇是眼珠部分用黑的鐵釉描繪，故顯得活潑生動，極為好玩。

像這種獅子狗，究竟由何人自何處携至雅帕華來獻納的，令人發生種種聯想，其為命途多舛，自遠方移來錫蘭居住之成功的中國人麼?其為到西天

拜訪佛蹟的中國朝山之香客？聽說六世紀之初，中國的求道高僧法顯，曾在阿奴拉達普拉住過兩年，自然這種想像也要浮現在眼前了。不然，其或為搜羅異國奇珍異寶的雅帕華貴族，或大商人所帶來的麼？

其他還有福建省一帶窯業所製造的白磁片，以及宋三彩系完全綠釉的長壺等物。

此等陶磁悉屬十二——十三世紀的出品，與上述之中國古錢的年代相一致。自德地嗎瑪循路到雅帕華，可知從十世紀起到十二——十三世紀，中國陶磁已運到了錫蘭，並可知它們是由海港而運抵高原地帶的。而同時就存在有多數中國錢一事思之，也可推定那一定是將中國貨幣當做財寶而儲藏起來的。此實為具體說明此一時代中國貿易活動情況的最好證據。

此種狀態，其後仍在繼續發生。

當十五世紀之初，明朝海上大軍前後七次巡航印度洋，即所謂三寶太監鄭和下西洋遠征之際，錫蘭島始終為重要寄港之地，有時亦曾有化為戰場之事，故包括陶磁器在內的中國商品，自應有多數輸入此處。陳列於可倫坡博物館一室之內的十五世紀以後的青磁和青花之類，想即為當時之物，但對此尚未做詳細調查。

錫蘭似隨處尚多有待吾人尋求發掘之物品。倘能將收藏於可倫坡博物館具有越州窯磁風格的陶磁，查明其正確出土地點，自屬饒有趣味之事，對於此點，吾人自當偕同該國人士，搜尋歷史之寶。

九、在東南亞發現的中國陶磁

——以在菲律賓新發現者為中心

菲律賓發現中國陶磁

從菲律賓屬各島和緬甸、泰國、馬來西亞，以及印尼和婆羅洲各島，都有很多中國的、泰國的、和安南的陶磁被人發現，這從戰前曾調查菲島中世墳墓的哈佛大學江塞博士之報告（註一），以及於戰後發掘馬尼拉南方卡拉塔干半島海岸地帶之墓地的菲律賓國立博物館，福克斯博士之報告書（註二），可以知其經過，但親眼看見菲島所出土的中國陶磁，因其豐富的收穫而發出驚嘆之聲者，還是在一九六七年八月，造訪安阿爾坡密西根大學人類學博物館的時候。

註一：O.R.T. Jansé: An Expedition to Indo-China and the Philippines. H.J.A.S., Vol. VI., 1941.
O.R.T. Jansé; Note on Chinese Influences in the Philippines in Pre-Spanish Times, H.J.A.S., Vol. VIII. 1944-45.

註二：R. B. Fox: The Calatagan Excavations. Philippine Studies, Vol. 7, No. 3, 1959.

當時第七次國際東方學者會議方在密西根大學召開，我應同此參加學會的華盛頓富麗亞美術館長約翰鮑普先生之邀，前往該博物館參觀，我們的脚剛踏進門，卽率先看到裝飾門廳的元、明兩代的美麗青磁和青花。

相當大的壺、鉢、和盤子之類，都漫不經心地放置於幾座玻璃櫥中，其中具有極爲優越、帶有繪畫的作品。以有力的線條所畫成的雙龍大青花四耳壺，有處還帶蓋子陳列着，此種青花帶畫予人的感覺，極爲敏銳，在日本尚屬罕見，一見之下，驟覺發出異國情調的芬芳。這是從那裏弄到的呢？據說明書說，它們都是菲律賓羣島之蘇祿羣島、塞布島或民答那峨島等地的出土品。密西根大學於一九二〇年代，早已從事菲律賓羣島的考古學調查，並開始蒐集其陶磁器。不期我竟成了這些蒐集品的俘虜。

翌日又行外出。這次是造訪在該館四樓的歐格魯教授 Kamel Aga-Oglu 的研究室，那裏更叫人驚異。自元、明時代起，到清代的白磁青花，與青磁、白磁、黑磁及白磁五彩等，不僅研究室裏有，卽隔壁寬廣的收藏室的棹上和櫃櫥裏，也都裝得滿滿的。與宋、元、明時代之中國陶磁同時展出者，

尚有泰國的受科泰窯、和斯完噶洛克窯，或夾雜着安南的白磁和大量的白磁與五彩。

中國的青花之類的花樣，爲花鳥、鳥獸、龍、花卉、蔓草，以及幾何圖案等，它們和我們在日本常見的古青花花紋，無論在圖案上和趣味上，都不相同。總之，這裏的東西，泰半的花樣都是爲日本所未見的。青磁之類，也與日本收藏家之間所最珍重的種類差異，這裏的白磁，也和在日本所常見、由景德鎮所製造的產品，具有不同的素地。

爲什麼此地會有這麼多盡是前所未見之種類的東西？我在懷疑之餘，忽然興起了解開這一疑團的欲望。因爲歐格魯教授惠允隨意拍照任何一件，所以在心情緊張情形下儘先挑選了主要的東西從頭到尾拍起。

學會開會期間，鮑普館長說：次年的一九六八年三月，又將在馬尼拉召開研究東方陶磁的會議（Manila Trade Pottery Seminar），會中將研究以菲律賓爲首，普遍由東南亞各國所發現的各種中國陶磁，我當即接受了邀請。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九日，參加東方陶磁研究馬尼拉會議的我們這一行人，冒着呂宋島炎熱如夏的日晒，分乘巴士南下，到位於馬尼拉東南拉姑納大湖西側，八十餘公里的南方。由是再穿過珊堵庫路支市鎮，而進入庇那格巴亞南 Pinagbayanan 村的庇拉 Pila 部落，在強烈的陽光照射之下，有好多處正在發掘着中世的墓地，在馬尼拉名建築家洛克新氏指導下，指定它拿札斯爲發掘地點，是經過整然調查纔決定的，但由農民們在自己庭院中隨意挖掘者，到處都是狼籍不堪的洞穴，凌亂之至。

僅在一小地區便挖出了百餘座中世墳墓，在墓中人骨頭部之傍，首先露面的是菲律賓製的土器，在骸骨的脚下墊有十一世紀起至十四—五世紀（宋、元、明初」的中國陶磁，有時則以泰國，安南的陶磁爲副葬品。副葬者還不止此，有時還將大壺、小壺、盤子，和碗等，以各種各樣的組合陳放，至少有五、六件之多。即僅以中國陶磁而言，也可分爲青磁、白磁、青白磁、黑磁、及青花等種類。

僅此庇那格巴亞南一村，這樣以中國陶磁爲副葬的墓地，各方都有發現，即僅就目前業經分曉者，據說合起來也足有八・五公頃之多。這是一個非

常寬廣，和數量龐大的中國陶磁。而其中關於以洛克新財團名義所發掘之古墓及陶磁，則以 Rosa C.P. Tanazas: A Report on the Archaeology of the Locsin-University of San Carlos Excavation in Pila, Laguna.(Manila,1968) 的名義，刊有報告書。

諸如此類的墓地，還不僅止於此地有之，從菲律賓羣島的各島海岸地帶，業經發現一百多遺跡，馬尼拉市內，當興建珊塔阿納教會時，由二〇二座古墓之中，即有一五一三個從十世紀到十四－五世紀的中國陶磁，與安南陶磁、泰國陶磁以及其他所謂黑褐釉的磁器同時出土。

如前文所述，據菲律賓國立博物館福克斯博士，調查呂宋島西南部卡拉塔干半島各遺跡之報告，自該地的五〇五座墳墓之中，也獲得了十四－五世紀（元末、明朝前期）的中國陶磁四一一個，泰磁九六個，安南陶磁九個，所屬不明者四個，計共五二〇個外國陶磁（註）



庇那格巴亞南遺跡的發掘及中國陶磁



庇那格巴亞南遺跡出土的陶磁類

註：拙稿「菲律賓的卡拉塔干遺跡及元末明初之中國陶磁」，載於金關丈夫博士古稀紀念論文集『日本民族與南方文化』中。

因此種關係，於菲律賓羣島，且爲本世紀二〇年代以後所發現的中國陶磁，均爲菲律賓國立博物館、人類學研究所以及菲律賓大學等所收藏，然最



桑透斯收藏的越州窯中國陶磁

近馬克仕總統夫人等，和該國的政要與富豪，亦均競相蒐集。僅前文所說的建築家洛克新氏獨自一人，即蒐集了七千件以上，他的住宅地下室已成了富麗的美術館。他最近出版的 Leandro & Cecilia Locsin: Oriental Ceramics discovered in the Philippines. (1968) 巨册，即為使用自家的收藏品而作之適切的研究書。列入收藏家之林者，此外尚有桑透斯Arturo de Santos，耶利札爾德Manuel Elizalde，阿巴亞 Consuelo Abaya，雷迭斯瑪 Carmen Ledesma，阿廸斯J. M. Addis 等人。

所蒐集到的中國陶磁，上自九世紀的越州窯、越州系窯的陶磁，其中包括青磁、青白磁、白磁、白磁青花以及五彩等，時代則下迄十六—七世紀。就中也有為在日本向所未見者，如福建省窯所燒製的，在白磁上施以鐵的黑褐釉子的小點，或在面子上散滿了銅的辰砂釉子小點的小壺。這或可稱為「鐵飛白磁」或「辰砂飛白磁」吧，另有瓢形小瓶等，實在可愛極了。

現在若將全體蒐集家的東西輯錄起來，想立即可達四、五萬件以上。總之，一旦了解到這種現實，任何人都祇有感覺驚異的份了。

婆羅洲和印尼的蒐集品

中國陶磁在如此情形下被完整地發現，還不祇菲律賓一地而已。在其南方距離不遠的婆羅洲既是

如此，印尼諸島的情形，更完全相同。

我曾到北婆羅洲沙勞越之首都古晉的國立博物館一遊，從沙勞越河口諸遺跡，以及在考古學上有名的尼雅洞窟遺跡出土的中國陶磁，和安南、泰國的陶磁片，在寬大的辦公大樓的二樓上，滿滿地堆積如山。現正由穆爾夫人 Mrs. Eine Moore 熱心整理之中。這裏也是以九—十世紀之越州窯磁爲首，下迄十一世紀以後的青磁，白磁、青白磁、黑釉磁、以及十四世紀以後的白磁青花等堆積如山。其中祇有一個和菲律賓相同的「鐵飛白磁」小壺，引我注意。不過遺憾的是，遺跡的性質，似乎並不像菲律賓那樣清楚。在本館的一室裏，也陳列着各種各樣的中國陶磁，又自古墓出土中國陶磁的方式，都用模型展示，意趣橫生。

說起來有些奇怪，在中國人墳墓中遺骸的手足之下，都緊墊着白磁青花的盤子（見插圖）。從這地方所掘出的中國青花相當大的部分，恐均取自這些部位，又原住於婆羅洲的達亞克人的某一部族，將巨木立於墳墓上，以爲標誌（柱墓），在巨木之周圍，全面嵌進磁碗做爲裝飾（見本書 遺留在東非的中國陶瓷一章）。俗語說百里不同風，不期茶碗也竟有了這樣離奇古怪的使用方法。

關於沙勞越出土的中國陶磁，有種種不同的報告，但古晉博物館的 The Sarawak Museum Journal，似爲必須一讀的刊物。



在遺骸下副葬的中國陶磁
（古晉博物館）

自印尼諸島發現了大量中國以及泰國安南陶磁之事，已爲衆所週知之事實，此等物品已有很多帶往外國，日本自一九三五年前後，由岡野繁藏和山尾薰明氏等，搜集自爪哇、蘇門答臘，婆羅洲南部（卡里曼丹），西里伯斯等島出土的中國、泰、安

南，以及日本之陶磁器，一九四〇年在東京展覽會上，祇介紹岡野氏一人之蒐集品，卽達數千件之多，委實令人驚異（註）

註：岡野繁藏氏所蒐『荷蘭領東印度羣島遺存陶磁工藝品圖錄』一九四〇年。伊東忠太、鎌倉芳太郎『南海古陶磁』寶雲舍，一九三八年。

在中國陶磁方面，除青磁、白磁、青白磁、或青花、五彩等一般的東西之外，還有唐三彩的壺等，在我記憶之中，它們是否眞爲印尼之所出土，尙不無疑問。

目前在印尼，凡發現的中國陶磁，和泰國、安南陶磁，都收集於雅加達國立博物館，或個人收藏家之處，不過此處對於正確的出土地和發現的狀況，除了指係北婆羅洲之外，也是毫無所知。雅加達國立博物館的收藏，乃以德弗立內斯 E. W. van Orsoy de Fines 的數千件蒐集品爲主體，其中在唐末以後的中國陶磁之外，還陳列着自二世紀（後漢）起，下迄八世紀（唐代）的陶磁（註）。在目錄上雖都印着說是爪哇或爲蘇門達臘出土，但其出土地，還有一點令人不能相信之憾。假如所言正確無誤，則在古代東亞的貿易史和文化關係史上，勢將提供既大而新的問題。

註：E.W. van Orsoy de Fines: Gids voor de Keramische Verzameling. Batavia, 1949.

馬來半島出土的中國、泰國、安南陶磁，都集聚於新加坡大學和新加坡國立博物館（舊拉福路茲博物館）。

對歷史和文化的貢獻

如上所述，最近自東南亞各島發現了數量無限的中國陶磁，以及泰國、安南或高棉的陶器，其中很多的中國陶磁無論在素地、成形與繪畫的任何一點，與迄今爲止在中國、日本和歐美等地所收集到的東西，都迥然不同。其中不少是迄今尙未見過的種類，且其數量至爲龐大。

這些陶磁不管它們與人們的實際生活，關係是如何深切，但因其爲蒐集家所輕視之民窯，同時，也是輸出陶磁。因此它們正因爲是民窯的緣故，故從來很難被列入名品主義陶磁的硏究範圍之內，但實際上它們却是重要的文化遺產。

是以，一九六八年春有了馬尼拉東方陶磁硏究會議Manila Trade Pottery Seminar，這項會議便是以在東南亞、尤其是在菲律賓所發現之極爲豐富

的，自九世紀以來的中國民窯陶磁爲研究資料，並爲判明在中國陶磁史上，不知究竟而一向棄置不管的許多問題而召開。

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是：㈠自菲律賓發現之中國陶磁的實態，㈡中國陶磁貿易的起源，㈢宋、元、明初輸出陶磁的特徵及最多的種類，㈣由唐至清的南部中國窯場及其製品，㈤自此一地區所發現之儲器的性質，及其生產地與時代，㈥白磁青花之起源與發展，㈦安南陶磁與泰國陶磁之性質，㈧在世界各地發現之輸出用中國陶磁的方式等。

會議舉行時曾就各項問題熱烈討論。不過談起任何一項議題，都是一件了不起的問題。故就一切問題，都做成一個明白的結論，勢亦有所不能，但迄今多數的中國輸出陶磁，爲浙江省的龍泉窯青磁、和江西省景德鎭的青白磁與白磁青花的想法，已有了大的改變，同時並判明由福建省及廣東省之窯所製做者，實居其大半。又對白磁青花之起源，也不簡單地謂其卽始於景德鎭之製品，在認識上，勿寧對於福建、廣東兩省窯業之作品，認爲有予以較爲重視之必要。同時更淸楚地證明中國陶磁之輸出，早於中世時期，卽已自全亞洲擴及非洲東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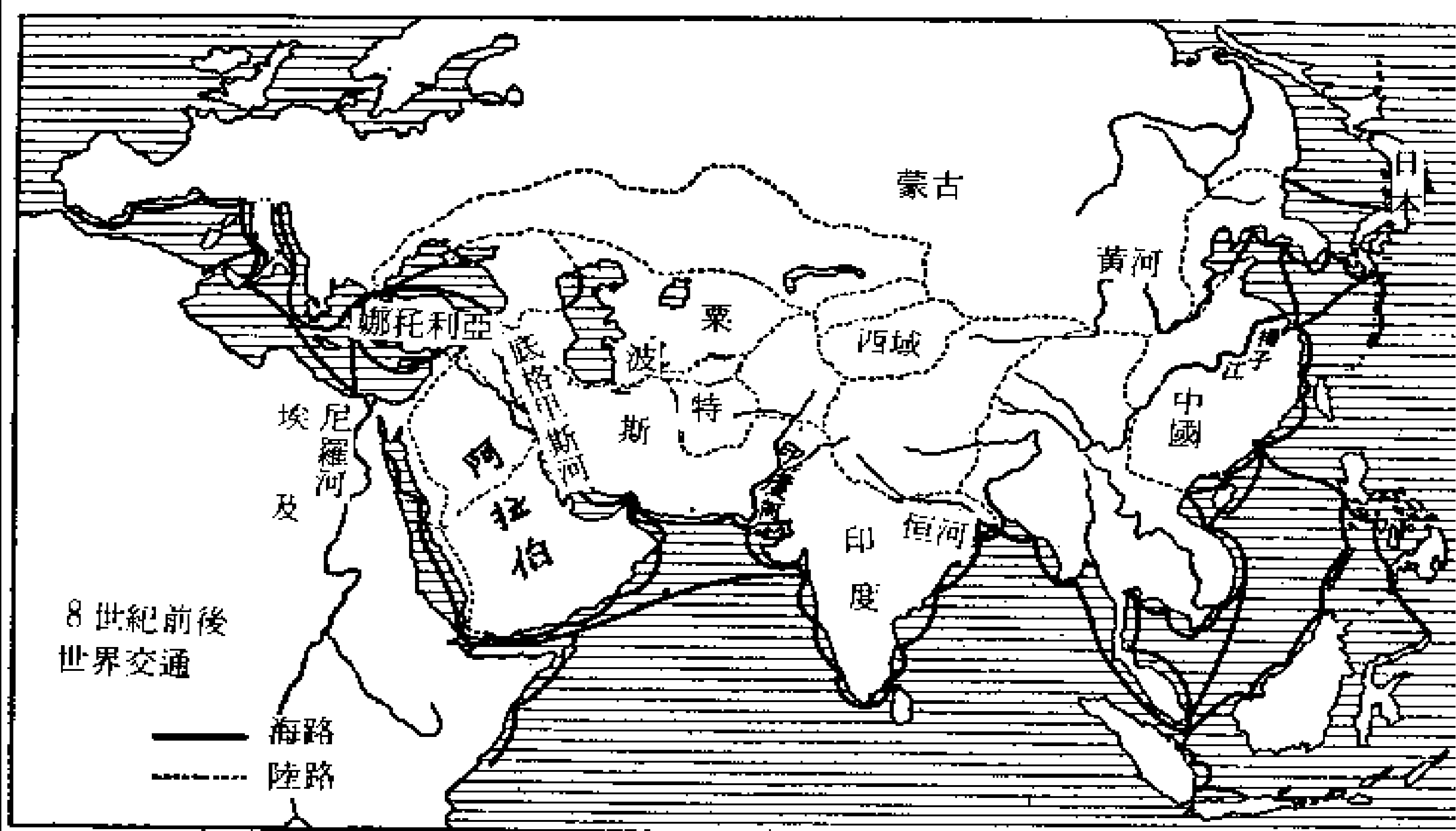
總之，自菲律賓、婆羅洲、西里伯斯、爪哇、蘇門答臘等在東南亞各地，發現之龐大數量的中國陶磁，不獨已就中國窯業的性質，及其歷史的發展狀態，予吾人以啓示，卽就陶磁器貿易之實態，及其對外國之影響，也透過遺物而顯示了深遠的興趣。中國陶磁之研究，業經脫出名品鑑賞之域，而逐漸登上美術史、東西文化關係史，更進而躍登世界貿易史之舞臺，而大顯身手，決非過言。對於廣義的歷史，是一偉大貢獻。

今後吾人對自東南亞各地區所發現的中國陶磁，泰國陶磁和安南陶磁，勢將予以不斷之注意。

十、陶磁路

——中世東西貿易之象徵




蒙古
日本
黃河
粟
西域
揚子江
中國
波
特
斯
娜托利亞
底格里斯河
埃及
尼羅河
阿拉伯
印度
恒河
8世紀前後
世界交通
海路
陸路

陶磁的破片，宛如做不完的夢境中之魔法鱗甲小片。在中東荒廢的城市遺址，或各方的古代窯業遺跡，到處都可看到它們姣小的手姿，寂靜地散落在地面，它們那種毫無虛飾、楚楚可憐的姿態，令人油然隨手拾起，秘藏在其中一部分的美，隨即輕快地開始歌唱，潛隱在其中的歷史，也輕盈地跳躍而出。

在中國陶磁破片之中，有由白而光滑之表面覆蓋的白磁，也有微白而帶青色之清楚的青白磁。有時在素朴的黃青色之中，也摻雜着刻有線彫花樣的越州窯磁。有的夾雜着靜如天青的青磁，有時也可看到具有野性難馴之感的黑褐釉磁。甚至也有在澄明的白色質地上，出現了鮮艷的天青色繪畫圖樣，與前者在眼中恰成對比的白磁青花，但也有很稀見的華麗五彩色繪，映入眼簾。

至於伊斯蘭的陶磁破片，更是千變萬化，色澤既極鮮豔，設計亦極富興趣，宛如鄉土玩具箱倒置起來。

也正因爲它們是破片，所以每一片都不是具有堂皇的面貌。它們不像完整品那種具有要拒人接近的傲慢神態，但卻有飛入任何人手中的平易近人態度，由它的親近感之中，我們可以感覺到不完整物品所具有的樂趣，和破片之美。故當我對拾起的陶片一經搭訕，立刻把自己也推展成爲如思想中的美妙姿態，那就是我所追求的理想形象，在完整品中無法找出的寬裕創造世界。稍微誇大點說，頗有與接觸到唐招提寺缺少臉部的木彫佛像、或希臘彫刻胸像時相通之感覺。我們之所以被陶磁器之破片所迷住，主要是因爲有這樣一種樂趣在內。

我對陶磁片之逐漸具有興趣，起初還不是爲了追逐這種樂趣。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當我在中國東北和蒙古地方，從事調查古代和中古城市遺蹟及居住遺址時，即已將它們當做考古學上之資料，而開始蒐集了。美的發現，還是在接觸它們期間，由湧現的愛情而發生，故實際上，乃是由於利用它們爲資料，而從事決定遺蹟之年代，或因確實判明陶磁器之性質以及窯業生產之實情，而和中國陶磁片發生了交往。

但與中國陶磁片的接觸愈深，隨後也就了解到這種可愛的存在，乃有其奧秘與範圍廣大的一面。這從中國以外各地遺蹟所發現之中國陶磁，最能察

知此種情形。

就整個來說，中國的陶磁從中國的近鄰日本、韓國、中南半島諸國開始，和菲律賓、印尼等東南亞各島，都有廣泛而大量的發現。

如果要求之於更遠的地方，那麼，南亞的印度、錫蘭固不必論，卽其以西的西亞全境，也都可包括在內。甚至非洲的東海岸，任何地方也咸處於有中國陶磁出土的狀況。至於在阿拉伯聯邦首都開羅附近的中世中國陶磁，數量之驚人豐富，與其質量之優美，都使世界的研究家為之震驚。何以在這樣遠隔之地，也有這樣多陶磁運來，令人實難想像。眼前雖尚未聞有自歐洲之十四——五世紀以前的遺蹟出土中國陶磁的新聞，但我想祇要在西西里島或西班牙搜尋一番，一定可以輕而易舉地達成目的。將來自這些土地上所獲得者，將不祇是中國陶磁，泰越陶磁也必將包括在內。

這種由外國所發現的中國陶磁，當然都是經由貿易而帶來的。由中國政府餽贈給外國君主貴人之禮品，自然也有，但為數當屬有限，雖然如此，在實際上，似乎也可視做貿易的一種形態。

因此，如對此等中國陶磁加以追踪，殆卽可瞭解中國與亞洲諸地區及地中海世界的貿易狀態——其為直接貿易抑間接貿易，又當別論——為如何了。這就是所謂東西關係的重要一面。

然中國陶磁所給與各個接受它的國家在工藝技術上的刺激，以及在美術上的影響，則較這方面的興趣為尤深。這便與所謂東西文化之交流問題有關了。

說到所謂東西關係，或東西文化交流一語，原為十九世紀末歐洲學者所說出，後來日本學者也起而附和，提出種種說法，說起來可算是後進國了。不過名目雖然漂亮，但比較起來在實際上並不那麼清楚。

這一問題或因其為首先由歐洲學者所提起，因此便多以西方文化對東方之影響，或卽出之以西洋文物東漸的形式、私見以為這總是由於近世東西世界的政治力量關係，自西向東傾斜，並因此而致西方文化東流的程度，佔據優勢的投影所致。

可是，主流果眞是經常祇「由西向東」的麼？當然不是這樣。縱令因時代之變遷，文化流向有強

弱之差，但兩個地區的文化與物資的流動，也不會是片面流通，而是互相交錯的。而從這裏便造出了普世都可通用的一種時代特徵。從古代到中世的中國絲織物貿易，和中世以後的陶磁器貿易，即爲顯示文物自東向西流動的適切例證。

成爲東西關係之中心者，原爲貿易，爲解決此項問題首先便要參與貿易關係的各國，對不能不出之以貿易的政治經濟事情與貿易實態，且因貿易的結果，各國在社會、經濟、文化所發生之變化與影響關係，就有儘先追求的必要。不過在近世研究國際貿易與國際關係時，任何國家都作此種追求，亦並非特殊珍奇之事。

但在研究古代和中世的東西關係與貿易方面，這樣的基本態度，並不太受重視，而大體上則多僅以貿易路線、貿易品目、或貿易方法之檢討爲對象。當然，有關貿易路線和貿易品目之研究，乃從事東西貿易之際，所絕對必要的一種手段，但僅僅靠它仍不能完全了解貿易問題的歷史意義，是以要想將歷史再度構成時，它並不能擔當很大的角色。古代、中世東西貿易之研究，其所以每易把每個地區或時代看成了一個漂亮的點綴品者，職是之故。

這雖爲與研究人員對歷史的想法及關心的方式問題有所關聯，但如出以同情的看法，因無充分的適當資料，故也可說祇能做到此種追求方式。

在這樣情形下，考古學上資料之活用，就方便而合適了。但卽屬在這種場合，倘資料在量與質的雙方，尚均未能有充分之發現，也難以達成目的。儘管中國的絲絹富有聲譽，然做爲遺物留給後世者，却極稀少，所以也無法派上用場，此僅爲其一例而已。

關於這一點，陶磁器雖壞而不腐，在遺跡中仍保持原形，故可成爲極可貴的資料。但此種陶磁器，因發現之數量極少，且如果不能掌握其全般的性質，則其價值也自然要稍形貶損。

在上述各章中，我曾敍述自八——九世紀唐代後期起，下迄十四——五世紀之元代、與明初的中國陶磁，從印度、錫蘭以西，東非以東各地約七十處以上的遺跡發現之事。但其中除埃及的福斯塔特之外，出土的中國陶磁片，爲數並不太多。

遭遇到這樣情形時怎麼辦呢？實際上陶磁片的

數量，縱屬無多，但由這些遺跡之狀態，以及自其中蒐集到的陶磁片之種類等，也可藉以找出中國陶磁輸出對象的擴展方向，所供給陶磁之種類，或從事貿易年代之幅度等項。但其所給予輸出對象各國之社會與文化的影響等，仍難能由各個遺跡之中，單獨斝獲。倘如能全體都順當地蒐集齊全，而作一番大觀，也許能够在某種程度上迫近基本的研究目標，但恐那仍不能說是充分的。

談到這裏，在第一章中所擧由埃及福斯塔特遺跡所出土的陶片，無論在量與質的任何一點上，都發揮了很大作用，它提供給我們思考基本問題的材料。

例如，從八——九世紀時起，至十五——六世紀時止，何以會有如此鉅大數量的優秀品，祇限於供給埃及？同時，它們又是如何爲人所使用，對埃及文化具有若何影響？對此等質問，它都能給予某種程度的有效回答。

現在我們隨意擧出些福斯塔特的陶磁片或可回答的事情。譬如先從中國內部問題來說，它總可以告訴我們，自唐末起，經宋、元兩代而至明代期間，中國陶磁之生產量，增加到了什麼程度，或生產技術有了若何向上發展，中國的經濟和貿易情事如何。其次，我們也可從而推測出，將中國陶磁運往遙遠的南亞、西亞、甚至還運送到東非的運輸手段之進步發達狀態，以及使此等工作成爲可能的中國、印度、撒拉森帝國等各國商業資本之蓄積與活動狀況。這在現實上都與聯繫中國及西亞、東非的海上貿易問題有所關連。

最後，埃及輸入並承受這些磁器的狀況，以及何以埃及竟購買如此大量、珍貴而高價的中國陶磁之問題，也將自然隨之而得到了解答。

關於此點，當我在第一章記述福斯塔特出土之元代青花，無論在質量兩方均屬卓越時，即曾簡單地說「元代青花即使在中國，價值也是非常之高的，可是竟在這遠隔重洋之處，從遺跡之中發現了如此大量的破片，這件事證明着當時的開羅市民，如不是相當富有，便是愛好珍奇，不然便是愛好中國製品，或因中國陶磁的利用價值極高，各點必居其中之一。不，這種出乎常情之事的產生，必係上列各種原因，兼而有之的結果。」這可說對全體輸入

中國陶磁器者，都可得而言之的吧。

關於此點我想再加添一個事例。當我們調査由福斯塔特出土之陶磁片時，在附近正從事於繼續發掘遺跡的美國研究中心的斯堪倫先生，便曾以中國陶磁之出土並非僅限於少數家屋，而是幾乎每幢房屋均有出土的話見告。因之，在福斯塔特地方，中國陶磁一定是在相當多的人家，都普爲使用。同時，由那一發掘隊所採集到的破片觀察，品質卓越的陶磁，爲數極多。

總之，當時開羅的財富和一般居民的生活水準，遠比我們想像者爲高。在天方夜譚等書中所看到的開羅之繁榮與財富情狀的傳說，可知其決非架空之談。

中國陶磁對埃及社會的影響，也爲另一件有趣之事。埃及自八、九世紀起至十五、六世紀時，接連輸入了不同性質的中國陶磁，故新類型的中國陶磁一經出現，在任何時代，都立卽有人起而仿造。唐三彩一經輸入，立卽出現了所謂埃及三彩（多彩彩文陶器），對白磁則有白釉陶器，對越州窯磁則有黃褐釉陶器，對青白磁則有青白釉陶器，對青磁則有青釉陶器，對於青花則出現了白地藍彩彩畫陶器。仿製品均屬陶器，然其中的青釉陶器和白地藍彩彩畫陶器等，如僅看照片，卽幾乎可與中國的青磁和青花亂眞。仿造陶器的數量，也委實過於龐大。

中國陶磁之所以被珍重，固然是由於它的品質精良，也是由於它的珍貴，而同時又有大批的仿造品出現，這種投合時勢之所好，大概完全由於中國風氣之流行，亦卽所謂中國時髦的新潮正湧至埃及所致。

像這種潮流，決不止埃及一國如此。在併行時代的波斯也是一樣。波斯在八——九世紀時，唐三彩及邢州白磁一經自中國輸入，立卽有人倣造出華麗的所謂波斯三彩（多彩彩文土器及多彩刻線文土器）和白釉藍彩陶器。不過，它們雖然基本上採取了中國陶磁的樣式，但亦並非完全依照原形，在任何種類中，它們都加入了波斯風格的手法，其所以如此，自然也是由於波斯有其強烈的文化傳統的關係。

但自十一世紀中葉開始，以美麗的中國青磁爲

中心的宋代陶磁，盛行輸入以來，波斯陶磁的樣相，也爲之一變，前此陶磁（初期波斯陶器）之華麗色彩，類似天馬行空那種花樣的風趣，完全擯而不用，搖身一變而成爲單色、尤其是青一色的世界。器皿形狀採用中國風格者亦多，茶碗、盤子、鉢子之類等等，甚至竟有可以魚目混珠，被人誤認爲中國所製者。這正是中國青磁的決定性的影響。

中國陶磁對波斯陶磁的影響，後來愈趨強烈，，然另方面，其間波斯陶器對中國陶磁所發生之影響，亦有加以傳述之必要。波斯的米奈陶器（花鳥彩畫陶器）對中國五彩的影響，前者的白釉藍彩陶器和後者的白磁青花、拉斯它類陶器（銅釉彩畫陶器）和釉裏紅的關係等等，在基本上也可說是技法由西向東的流傳。

無論怎樣，中國陶磁對波斯陶器的影響，果真如此強烈，則波斯地方（包括美索不達米亞）必定也已流行了中國風尚。敍利亞亦當與此相同。在陶磁器方面，中國風尚之流行，應已遮蓋了中東整個區域。

現在談一談海上貿易。

談到這裏，任何人的腦海裏都要浮現出一個大問題，那就是如此大量的陶磁，究竟用了什麼方法運到遙遠的中東地帶？

一般都說絲路是連結東西亞與地中海世界的貿易路線。那是一條由中國經中央亞細亞的沙漠和草原，或越過山脈而抵達波斯，然後再通往地中海岸的貿易通路。十九世紀末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所說「絲路」這一名稱，不知是否因爲它帶有羅曼蒂克的情調，總容易陷入唯有它纔是由古代到中世，東西貿易主要通道的錯覺。但是，實際上頻繁使用這條道路者，乃在七——八世紀，至八——九世紀以後海上交通道路，勿寧已成爲東西貿易的中心路線。中國陶磁之輸出，俄然轉爲興盛，的確始自唐末。

然則，連絡東西世界的海上貿易路線，成爲一般化的時期，是否起自八——九世紀？答案是：決非如此，事實上是在此很久以前的公元一世紀前後起，即已爲人旺盛地使用了。即使依據清晰的記錄，西方世界自公元一世紀前後起，已知利用吹向印度洋的季節風開闢了由埃及通往印度的海路（『耶留特拉海嚮導記』）（似即爲「愛利脫利亞海周航記」Periplus Maris Erythraei 見方豪著「中西交

通史」第一册二〇〇頁——譯者。）於是羅馬人在印度闢了若干居留地，便將彙集於此的商品運往羅馬。印度南部的科羅曼得海岸上的阿里卡梅杜遺跡，亦即居留地之一，當時似被稱爲泡兜刻（請參看「南海的青磁」一章）

另方面，在東方海上，自公元前二世紀起到一世紀，由中國東南部海岸出發，繞過中南半島和馬來半島，抵達印度東海岸的黃支國 Kañchi（即現在的康乞普朗 Conjeeveram），開闢了海上貿易道路（『前漢書地理志』）。由東亞及亞洲西南部和非洲東北部地方，雙方所伸展的海路，至印度而結成爲一體。

由於這種關係，羅馬的物資便繼續運到東亞。越南南部湄公河三角洲的奧庫頁歐 Oc-Eo 遺跡，爲自公元二世紀至七世紀時港市的舊址，從該處有二世紀中期據推想爲羅馬皇帝安托奈那、庇護的貨幣和金製品，與羅馬玻璃破片同時發現。又自中國廣州市郊外横枝岡的漢墓，找到了羅馬製的玻璃碗和其他物品。據一九六八年春余之親眼所見，自菲律賓的明多羅島，也曾有腓尼基玻璃風格的小長壺，和藍色羅馬玻璃碗出土（桑托士收藏集）（註）。

註：三上「西亞之工藝與日本」，載『東洋美術』第六卷（工藝）、朝日新聞社。

公元一六六年（後漢桓帝延熹九年），有自稱爲羅馬皇帝安托奈那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大秦王安敦）之使臣，來至中國，獻象牙、犀角、瑇瑁等物，爲有名之事實。這些都可說明東亞與地中海世界的連繫，已較爲密切。

海路一開，則中國之商品自然也會運往西方，。在印尼雅加達博物館中，陳列有中國漢代製作的綠釉陶器和黑釉陶器，並附有自爪哇島和蘇門答臘島出土的說明。實際上，它們是否真由印尼各島所發現，我還有不能百分之百地相信之處。自公元前二世紀末起，假如中國至印度的航路已開，則自爪哇和蘇門答臘出現二世紀時之中國陶器，亦並非不可思議。

這件事可由在泰國曼谷國立博物館所陳列，且自此處出土的戰國至漢代之帶鉤上所使用的玉製品，以及漢代的紫色玻璃玉等，而增加其確實性。此等物品殆無疑均爲漢代經海路帶至此地者。

紀錄與考古學上之資料，兩者均告訴我們，海上交通路已於公元前後，屢加使用。海路與絲路一

樣，早已爲重要之貿易道路了。

其後由於中國與西域各國之政治關係，愈趨錯綜複雜，故絲路也隨着發生了種種困難。與此幾呈對等的海上交通道路之重要性，日形增加。雖有種種事例可資說明此種情事，但限前無暇及此。

七世紀，撒拉森帝國成立於西方世界，從事貿易，海路之比重已增加了決定性的分量。撒拉森帝國商人是如何遙指財富與商品，自遠方航海來華，此自九世紀後半黃巢之亂時，聚居於前往南海出入口廣州一地之伊斯蘭教徒、基督教徒、波斯人以及猶太人，數逾十萬一事，實卽最好之雄辯。

這樣對海上貿易累積下來的意向，自九——十世紀時期起，更有了爆發性的發展，來自阿拉伯和印度方面的大船，舳艫相接，進入廣州、泉州、明州（寧波）、杭州等港，收購物資西歸，或爲中國的巨船，揚帆駛向南海。

這種海上貿易的發達，自與從此一時期開始的航海術之發達，以及造船術之進步，均有關係。進入十一——二世紀，中國已造成了可搭載由數百人到一千人的巨艦，在渡越重洋的航海上，使羅盤的應用也成爲可能。

諸如此類的事情，筆難盡述。總之，像這種海上交通之發達，對於既屬笨重、又易破損之陶磁器的輸出，較之從前容易多了。足以傳述此項史實的適切史料，也頗不缺乏，但目前則無暇列舉。

據此以觀，九——十世紀以後，縱令經由陸上交通道路，尙有幾許中國陶磁運往西方，但擔任普遍運往西方世界的主要任務，乃由海路所達成，實已洞若觀火。是以由最近之海港，再轉運至中東的內陸地帶各城市，自屬順理成章之事。其實，這不僅陶磁如此。由中國所出口的紡織品和其他商品，無疑都是在同樣狀態下進行的。

由東而西，由西而東，雙方經由貿易而發生的連繫，打破了中世各地域的孤立性，並成爲帶給各地域的時代共同性的一個重要的因素，乃是不爭的事實。陶磁可說是它的一個象徵。

無論如何，陶磁是投給中世東西世界的一縷粗的情絲。同時它也是使東西文化得以交流的一座橋樑，我願意把這條海路暫呼爲「陶磁路」。

×××　×××　×××

作者於正文之後，尙有後記一篇，因其所述研究經過，頗具啓發性，故亦信筆譯出，以饗讀者，並用示對作者辛勤耕耘之敬意。

×××　×××　×××

一九六四年，我與小山富士夫、長谷部樂爾、鈴木八司、松見守道、蓑豐等諸先生共同調查開羅郊外福斯塔特遺跡出土之陶片，在工作上應得之分，例應由阿拉伯聯合政府致送的一七六片由該遺跡出土之陶片，在過了五年後的今夏，方送到東京的出光美術館。

在調查埃及出土之中國陶磁時，我亦曾於一九六六年與松見守道、鈴木八司、上野佳也、重松和男、杉村棟諸先生共同參加，現在又看到由埃及遠路送來的中世中國和埃及的陶磁片，調查當時所發生的種種事情，以及由陶磁所引起的人際關係歷史的各種理路，一齊湧上心頭，感慨無量。

我之對中亞及西亞的歷史和考古學，具有深切的關心，已爲四十餘年前，就讀舊制高等學校（卽大學預料——譯者）以來之事，大學學生時代，已決定其爲畢生的工作。其後情事變化，如欲專門研究東北亞的古代暨中世史，則關心勢必擴展及於東方世界與西方世界之間的、廣義的接觸歷史，亦卽所謂東西關係的問題上。

當時顯露在眼前者，厥爲陶磁器問題，於是我決心通過陶磁器的貿易，以及它給予社會，文化的影響關係，將東西關係的實態研究清楚。

失去了在中國大陸工作場所的戰後，這種思念更爲強烈，在一偶然的機會，隨興之所至，對於運至中東地方中國陶磁的出處，做一番追跡工夫，但這時突然感覺到對於西亞陶器的實態，有些困難。在不得已情形下，乃開始了伊斯蘭陶器（卽所謂波斯陶器）的研究，終對它發生了興趣，歲月不居，倏忽已經過了二〇年的時光。

兩者的研究速度很遲緩，但總算有一部分經整理好，本書卽爲經友好之鼓勵而寫成者。老實說，尚待深入瞭解之事物尚多，此書不過僅爲研究過程中之一個里程碑而已。

東西貿易問題，卽使從世界史的本題來講，也是非常重要的，並且也是極富興趣的主題，青年才俊的研究家們，如果以滿幡精神專一心志來追求，則將來的收穫一定大有可觀。

關於此點，倘此書的讀者先生，有知南亞西亞有中國陶磁之出土地或其他事項者，務乞將地點狀況見示，實所感幸……。

三上次男於北鎌倉松岡不咸山室　一九六九年七月

附記

又於此書刊行後，繆承多位厚意教示，衷心至感。據水野清一先生見示，中國中世陶磁，曾自下列各遺跡出土。

伊朗——荷莫茲島、及自其對岸之米那布古城址和米那布的卡列、薩拉灣等三處，有明代青磁、青花、白磁、青白磁、五彩、瑠璃釉等陶磁片出土（吉田光邦、小山喜平「西亞之技術」，京都大學、一九六六年、二九三——三一五頁）。

阿富汗——自巴爾克附近之鐵佩、札爾噶蘭，曾出土元代的青花（大盤底之一部分）和青白磁（水野清一「埃巴克和卡什米爾—斯瑪斯特」京都大學、一九六二年、五六頁及一三五圖之1、2）。